文 言

白　話

大衆話

雜　論

禁習文言與強令讀經

汪懋祖

近聞湖南廣東等省當局，強令中小學習經；而報載教育部通令糾正，並禁止小學誦習文言。各走一端，因思想上之衝突，造成教育上之棼亂。苟不研究其本源，以折衷至當，則一反一覆之間，兒童，社會，及民族前途，同受其弊。此不佞所深憂，謹不揣固陋，與當世司教育之柄者一衡之。

（一）思想問題

小學讀經，固非合理，禁絕文言，似乎近于感情作用。竊謂初級小學自以全用白話教材為宜。而五六年級，應參教文言，不特為升學及社會應用所需，即對于不升學者，亦不當絕其研習文言之機會也。初級中學國文科文言教材　以限于課程標準，分量至薄。青年因長久誦習語體，潛移默化，而就為所謂時代作品；即平易之

古文，涵正當之思想，每摒棄不觀，獨于現代文藝之詭譎，刻畫，與新奇刺激，多孜孜不釋手，雖檢查禁閱不能絕也。其結果則習爲浪漫，爲纖巧刻薄，馴至甘墮于流浪的生活。所謂現代作品，就文藝本身而論，未嘗不足恣肆自遣；孰知其禍乃至于此，保舊之士，惆于此種現象，以爲拔本塞源之方，在使學生讀經；故讀經運動，實爲禁止文言之反動。夫讀經固違背兒童生活，然以少數人私見，而禁習文言，與以少數人之私見而强令兒童讀經，其謬則一。

或曰：「子所論者，乃選材問題，而非語體之咎。」曰然。惟文字之道，其可保存流傳，堪爲模範者，必經長久之選擇，有公認的價值，而不爲時間性所拘束。吾國所謂現代語體文，乃新文化運動之產品，而其運動之意義，在于發揮個人主義，毀滅禮教，打倒威權，暗示鬥爭，今則變本加厲，徒求感情之奔放，無復理智之制馭，青年浸淫日久，則必有更新奇之作品，方得讀之而快意，若禮義廉恥，忠孝仁愛之說，彼等直視爲土苴，不足以發興趣而解煩悶。孟子洪水猛獸之說，覩于今而益信，

（二）教材問題

江蘇教育廳爲改進國文教學，曾請十數有名教員，編定國文教程，復竭十數教員之力，編成當代國文一書，聆其標題，以爲時人作品，觀其篇目，乃知爲中學國文教科書也。就所選文言文觀之，除爲「週期單元」所限，深淺不能合度外，各篇內容尚鮮可嘗議。獨其所選白話文，則駁雜殊甚。擇其平正者言之，如離家的一年，此文列入初中第六學期第六週，按其內容，似適于第一學期第一週講讀，尚須刪其冗蔓，今列作第六學期精讀之文，可見白話文選材之窮乏。近來文字，往往以歐化爲時髦，佶屈不可理解，須假想爲英文而意會之，始能得其趣味。使學生童而習之，其困難幾同讀經，而語調奇變，幾非中國人矣。教育部一再令禁小學講習文言，并初中各科教科書，除國文一小部分外，不得以文言編輯。而兩次修訂標準，文言文分量愈削愈少，勢將驅逐文言于中學課程之外，而盡代之以白話，使十數年後，文言文絕跡，移風易俗，莫善於此矣。宜有人主張高中全用語體，以爲必如此則

教育普及，社會進步，不意民族意識，從此牿亡。昔梁任公先生擬定最低限度書目，有四書，左傳，史記等二十七種，謂「以上各書，無論學礦學工程，皆須一讀，若并此未讀，眞不能認爲中國人」。以任公天才之高 所望未免過奢，又其書不屬于學校教育。惟讀書習慣，必自中學養成，吾只望初中能畢讀孟子，高中能讀論語，學庸以及左傳，史記，詩經，國策，莊子，荀子，韓非子等選本，作爲正課，而輔以各家文選 及現代文藝，作爲課外讀物，然而何可得耶？

初中國文教材，本非枯瘠，惟以限制文言，斯窮且濫矣。白話教材，最適用于民衆教育，乃至今尙無一適當之讀本，所謂文藝作品，去通俗甚遠，彼主張語體者，何不盡心于民衆讀物，而必限制中學用文言，此又不佞之所未解也。

（三）教學問題

學習文言與學習語體，孰難孰易，必經心理專家之長于文字者，作長期的測驗

研究，殊未可一語武斷。大抵白話文長于描寫物態，發抒柔情，文言文便于敘事，說理，議論，應用，而壯烈之節，激昂之氣，尤有資于文言，若以白話表之，則易失之狂暴，無所裁節。故二者各有其用，欲卓然成一作家，則所資于天才與功力，正復相同。如吾言之果不謬也，則白話文 佳者，要爲文藝之一部。而教育目的，決非造就多數文藝作家與欣賞小說文藝者。而吾常聞文藝家之言，惟純文藝方有教育價值，文藝首重結構技巧，不限思想，夫以之談文藝則可，以之談教學斷乎不可，此其觀念之必須糾正者一也。

兒童初習語文，必資于直觀及想像，故貓戲狗語，足以喚發興趣。唯施之于五六齡之兒童則可，若兒童實際經驗，既已超過，則利用此種想像者，反而遏塞其想像力。今若以此老鼠請客，黃狗開會等故事，施之於八歲之兒童，除非含有寓言意味，則兒童猶將嗤之以鼻。而吾國談鬼說狐之書，汗牛充棟，亦可選編以爲教材。今教者嗜喜濫用想像，不體經驗，自以爲于兒童心理深有得也。孰知差以毫釐，謬以千

里。惟初級小學國語教材，自以合于兒童經驗及口語爲尙，高級必進以淺易之文言，若猶以兒童中心爲白話童話之護符，猶察秋毫而不見輿薪。此其觀念之必須糾正者二也。國文教學有三事焉，曰練習，曰思想，曰欣賞。而所以能發人情趣，鼓舞志氣者，尤必資于誦讀，吾幼讀纏綿悱惻，或悲壯激楚之文，輒爲泣下沾襟，何也，聲與心通，有不期然而自然者。故佳文必須朗誦，詩必須朗吟。今學校每不主朗誦，謂其妨害他人作業，而教室內除教員講解，學生幾無暇朗讀，即在講授之餘，學生亦唯枯坐默誦，生趣索然。聞某省有督學視察學校，見教室內合聲朗誦，率爲糾正，致教員拂袖而去，意非「文盲」者流，決不鹵莽至此。此其觀念必須糾正者三也。教授文言是否妨礙算學之進步，抑另有原因，此爲極嚴重之問題，如發現文言與算學之相關成反比，則可毅然取消文言，卽語體文亦可減至極少。算學固爲科學之基礎，而今尙有持練心之說者。歐州自十八世紀至十九世紀中葉，練心主義盛行，古文字與算學並重，是則文言之嚴整，正有助于算學之練習。余固不信此說也。

諸君毋以國文成績勝于算學爲滿意。考試之成績，尚須觀其題目，如去年會考江蘇高中題爲「國難期間青年應有之責任」，他省初中試題有「暑假期內之生活」，或「求學的經驗」等等，凡日報副刊，學生什志，時有此項題意之發揮，而紀念週演講以及演說競賽，亦常用此項論題，學生已耳熟能詳，如考試曳白，或幷白話不物能發揮，則學校可以盡閉，豈僅勝讀文言而已哉。余昔學習理工，凡微積分，高等理，力學，水力學，無弗習。每夜解答習題率至十一時。又曾爲數理化教員矣，至今觀察算學教學，雖教科書略加改良，而教法尚未脫二十年前之窠臼。昔時學生，雖每班不過十餘人，故黑板練習，可以同時並行，而教師爲之一一訂正焉。又吾輩入學早，多已國文清通，歷史具有常識，故入中學後得傾其全力於英文算學，遠入高等學校，又傾注於數理化，直以國文科爲休息調節之地，而無所用心。今初中課目增繁，幾舉人世各種學術之基礎，盡納之於三年之中。食且不能下嚥，安得消化。故師資，教法，課程，不加改良，而謂文言有礙算學，實爲學科上之一大誣案也。

（四）社會需要問題

文化愈進，生事愈繁，是有以簡馭繁之工具與方法。文言爲口語之符號，所謂一字傳神，最能描寫文言之便利。凡自然科學之各種符號與公式，皆可作文言觀，若一一以語言描述之，則學術又安得進步。社會應用，亦復如是。今初中學生因喜習白話，所作信札多累贅不通。往往一言可以說明者，而十數語不能達意，商界多不信任而好私塾，雖尙有思想習慣，未能滿意，亦以所學國文及算術，不切實用，尙須重習故也。猶憶年前敎部召開課程會議，有攘臂起爭高中全用語體文者，以「如之何」與「怎麽樣」爲例，以較其難易，今請以此二詞付之默寫測驗。予卽自試，草寫「如之何」三字，時間一秒半，草寫「怎麽樣」三字需二秒半，時間相差六秒。文言之省便，毋待嘵嘵，乃必舍輕便之利器；用粗笨之工具，吾不知其何說也。或謂學習文言，當較白話費力，曰然。但略加努力，以後之受用，必且倍蓰。若徒崇拜自然主義，而以白話爲自然，則算術亦毋須學，因算術運用抽象觀念，更有

難於文言，祇教以心算與手指計數，則更合於自然矣。

嗚呼！文字商品化，足使文化阻塞，道德墮落。字數既有定價，往往一字三千字足以發揮者，必多至二三萬言，而收益可以十倍。今教科書亦成商品，各局爭銷，常生糾紛。社會人士本不滿此種貓言禽語之教本，當局乃一舉恢復讀經，焚書之禍，不難見於今日，非文字商品化階之厲耶？

（五）學制課程問題

余近作「中學制度之檢討與改進」一文，以高初中課程之臃腫，學生既不勝重負，程度即不得不低降。初中科目十五種，（童子軍訓練尚不在內）其中必須有充分時間自修者，可分為國文英文算學自然史地五組，每組自修至少一時，共五時，加上課六時，此外尚有習字圖畫之補充，書寫生活日記，或整理筆記等等，約二小時，是每生每日工作，至少十三小時。益以課外活動訓練，愈足增其疲勞。故近年優良中學，每歲退學休學留級者甚多，其幸能拾級而升，至高中會考及格，則已患高

度之汎觀，而神經衰弱，或心臟不健全 恆居十之六七，英勢活潑之氣，消磨殆盡，欲望其担任救國大任，不亦難乎？余按桑戴克學習曲線，自十四歲後，學習能力，始加速，至二十二歲達最高度。是初中課程之繁多，與學生學習能力太不相適，須使課程簡單化或增長年限，始得循序漸進之益，而決非易文言爲語體，即足以提高科學之程度也。

讀了「禁習文言與强令讀經」以後

龍啓昌

「文言語體和讀經不讀經的問題，至今還沒有結論，」這誠然是我國教育界的不幸的事。然而又怎樣去找到結論呢？關於學術問題的探討，最好能去除感情，純取客觀的態度。汪懋祖先生在本刊發表的原著，雖有爲「保舊之士張目」之嫌，然而與研因先生在各報反駁的文字亦太以感情「還其廢尖了」。我們還是從社會事實

上去觀察討論才是：

（一）社會問題　我們相信教育問題決不能離了社會而獨立。譬如最近大家提倡生產教育，然而倘若社會經濟社會制度沒有同時並進的解決的辦法，提倡生產的結果，依然是破產。工專農專等等學校，不就是從前的職業學校麼？然而結果又在那裏？所以教育問題實即是社會的整個問題，文言與語體之爭當然也不能例外。汪先生以「以簡馭繁」爲社會需要的立足點，吳先生則以爲「應顧到學習過程」，兩方都有充分的理由。我這裏所謂的社會問題　倒不是這些問題，而是社會對於文言語體的態度的問題。凡百事情先要能改變社會的態度，這實是最難的一件工作。我們試看社會上對於文言語體的態度如何？報紙影響於社會心理者最大，應能提倡語體才好。其他如官場的文告，來往的公事，雖是加上了新式標點，內容依然是文言。初級小學畢業的學生看了，恐怕都不易懂得。這倒還不必去說他，就在教育界本身也還有種種矛盾的現象。日前看見報上載江蘇省會考試題議決一律用文言，現在國

內各大學的考試，及考試院舉辦的考試，更非用文言文不可，試問讀了六年白話的小學生，讀了六年一半白話一半文言的中學生，怎樣能應付得過去。從前人「十年窗下，僅能通文。」無怪乎現在的中學生甚而小學生，你不教他文言，他還要求你要教他文言。這都是事實。中學大學入學試驗的影響於學生心理與態度，比了行政機關的一紙號令，或文人的兩三篇文字，不知要大多少，所以我的意思，是我們既是認定了語體爲提高國民文化的輕便工具，我們應當再請政府來澈底的革一下命，否則雖是十年百年也還沒有結果。凡百事業改革的不澈底，最難收到成效；然而語體文本身是否已能達於健全之境，是否已有了典型的作品，讓我們在下文再討論。

（二）教材問題　要正社會觀聽，語體文自身的問題，是最爲重要。語體文選材之難，其流弊之大，誠一如汪先生所言，內容充實，記敘抒情平正易讀的小品散文實在太少，有之，誠如汪先生所說：「往往以歐化爲時髦，佶屈不可理解。」這也難

怪，語體文自提倡到現在也不過十多年，語體文文學能樹立了基礎，語體文方易於推行，這是早有人提議過的。所以我的主張是爲提高大衆文化計。語體文是非推行不可的，然而爲學校敎材計 應趕速創造語體文學，使他標準化，典型化，這樣靑年學子才易於適從，汪先生所說的，「徒求感情 奔放，無復理智之制馭，」種種危險，也自然可免除了。

(三)學習問題　關於文言與語體學習的難易問題，汪吳二先生都說倘待心理專家作長期的測驗研究，實則現任中央大學敎育學院院長艾險舟先生，在民十五的時候，受中華敎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的委託，已經做過一個實驗，他的結論裏面說：「文言文是否被打倒，白話文能否取而代之，在文字學家方面，其爭論已甚囂塵上，不容科學家置喙於其間，科學家亦豈敢妄參末議。惟本節第二條（文言文程度之分別，較白話文明顯，）稍涉袒護文言文之嫌疑，將來難免主張白話文者質問；然我輩之客觀硏究，事實俱在，固非信口雌黃者可比也。夫閱書，用白話文爲一種工具

，用文言文亦爲一種工具。二年級之白話文程度，旣相等於三年級，亦有超過之者，而文言文程度，則當加高；是一種工具已漸完整，他種工具尚須磨治。假使文言文不能完全推翻，則小學期內應當磨治第一種工具之時，而中學期應爲磨治第二種工具之時」。這是艾先生根據實驗結果所下的論斷，當然非信口雌黃者所可比擬。艾先生在民國廿一年的時候又做了一個「中學國文理解程度之研究」（原文載中華教育界第二十卷第七期，另有專刊。）他的結果無論高初中兩方面，白話均有理解較易及速率較高的趨勢，但文言與白話的相關很高。可惜這樣科學的實驗研究很少，尙不能作爲我們下結論的充分的依據，希望心理專家能繼續的研究。照普通的觀察，文言文是要比語體文難學些；尤其在發表方面，語體文比文言文容易得多。吳先生所說：「從前靑年作文言信，必翻尺牘，現在作語體文信，則要說甚麽便寫什麽。」倒都是事實。至於何者爲文言所長，何者爲語體所長，這是文字本身的問題，語體文學如能成功了，倒可不必顧慮。汪先生以語體文不能朗誦爲病，這是過慮

。真正好的語體文何嘗不可朗誦。否則英文爲什麼也能朗誦呢？這是習慣問題。至若教部以妨礙數理科學之進步而爲嚴禁文言之口實，實是不很合理的。會考統計以數理成績爲最劣，而國語爲最優，這種結論，是否可靠，還是疑問。因爲在考試的方法上，以及試卷評閱的標準上，還有許多問題呢。在普通學校裏數理科教員的分數，總是緊些，國文教員的分數總是寬些。在舊法考試缺乏客觀分數的標準下的成績又怎樣算得住呢？在教學上文言語體誠然有很多的問題，然而倒不在以上種種；而是在因語體文材料的難找，連帶的就不容易引起學生的興趣。在中學裏面，平正的語體文，學生一讀即已明瞭，再無庸教師爲之指導，其深奧的學術文字，學生又很難領會，不感什麼興味。凡此種種，從事國語教學的教師們，都能知道，不必再細細的陳述了。這種種問題的解決，怕非單獨教育界所能爲力。

(四)課程問題　在汪先生的論文裏，末了提出課程問題一節，却是極堪注意的一件事。關於現行中學規程，李日剛先生曾爲析論極詳，（原文載中大校風第九十

三期至九十六期）「我在這裏不必再多說了。規程裏規定初中學生每日上課及在校自習為八小時，高中學生每日上課及在校自習為十小時。這實是做不通的事。課外什麼運動什麼作業都沒有了，簡直是書本的奴隸吧了。現在一般青年身體之孱弱，我們是引為隱憂的，應急謀補救才好。至於以科學程度的低落，而要歸罪於文言，實是太寃了。要提高科學程度，還要請執政者在課程上着想。照現在的情形，怕非但科學不得提高，連文學也不得提高的。科學提高了，怕已戕害了青年的身心。

最後還要表明本人的意見。語體文在小學裏的地位，當然毫無異議。不過應當怎樣也能使社會尊重語體文，廣為推行，一切報章公文一律改過，（怕因為用了語體，幅篇太不經濟，所以不容易。）尤其是中學大學的入學試驗也要能提倡，（這是一個重要問題）否則一部分人提倡語體，又有一部分人在那裏提倡文言，以致青年無所適從了，至於語體文學的本身，應當早日自謀健全，自求標準化。對於文言文又怎樣呢？當然是決不能偏廢的。因為這是幾千年來我中華民族文化之所維繫，

幷且有他的優美的特質。至於小學亦欲參用，其最平易淺近者，偶選讀若干篇，自亦無妨，不過要初中畢讀孟子似乎太早些。中學時代猶以選讀各體文爲宜，天資聰慧者，因選讀而引起研習原書的興趣，自然更好。在高中三年中若要規定讀畢若干部，自亦無不可，不過所要顧到的就是課程上允許不允許。現在規程中已把高中的分科制取消了，這實是大背青年心理的事。否則文科的學生可以多讀幾部，理科的學生可以少讀幾部，極有伸縮的餘地。

末了我要特別聲明的，汪吳二先生都是教育界的前輩，決不願開罪於任何一方。不過以平日教學感想所及，略貢管見吧了，願與同志們再從長商討之。

小學讀經與學習文言文

余景陶

民國以來，讀經問題，以政治力量根本打銷，文言文在晚近亦以政治力量而逐

漸排除於學校課程以外，但在國人心理上，則此二問題正方興而未艾，如廣東湖南等省通令中小學讀經即其一證也。關心教育之人，應虛心理解對方之觀點，然後得知問題之所在，而設法解決之，勿以守舊落伍等籠統名辭一口罵倒壓倒之。罵倒壓倒，究不足以解決問題，更無補於教育。

今日學校課程，最不能滿人意者。莫過於國文，或國語一科，自學生之觀點言之，國文一科不僅練習文字之技能而已，學生童而習之，精神上受其薰染者，實至深且厚。今日中小學之國文教本果足以養成學生之高尚精神或健全心態乎？某書店所出小學國語教本，中有一課云：「寫字用毛筆，什麼毛，羊毛，；什麼羊，山羊，什麼山。青山，什麼青，石板青：：」。又有一課云：「張家的羊觸倒了桑家的牆，桑家的牆壓死了張家的羊，張家要桑家賠羊，桑家要張家賠牆　：：」。其餘戲話爲言了無意義者，不一而足。如此教材編入教本之內，深印於兒童心意之中，縱有興趣主義，兒童中心主義，千百美名辭以相維護，不佞亦不得不認爲戕賊兒童之生

命。舊日讀「人之初，性本善」，當時雖不能盡解，而事後回想，究不無甚深之意義存焉。縱令所解者僅有一部份，而得其片言隻字，如「可以人，不如物」，「幼不學，老何爲」之類，卽已受用無窮。今日之教本，似若易解矣，但不知解此又復何用耳？兒童智力發達後，回想其幼時之所學，尚有足以爲其人生之指南者否乎？教育家徒重形式而不重實質，其所教成之人，勢必心中空洞無物，一入人生大海，茫茫無所依據，眞不知有若干悲劇從此而生矣。「師乎師乎！童子之命！」吾願教育家，一一復斯言。

自社會之觀點言之，國文一科應凝結本國文化之精英以養成富有民族精神之國民。全國國民皆具有此固有精神，然後易於團結，離心力始不至於擴大。假使有一上帝降臨中國，能斬絕歷史的支配力，嗟咄之間，移植西洋精神或東洋精神或烏托邦精神於全體中國人心之中，而不至發生騷亂渙散之虞，則不佞願亦忱接受之。無如歷史不死，四萬萬人之心情習態非可以少數人之意想而隨便擺佈者。故立國必須

國民具有共通之精神，而此共通之精神又勢必依據固有之文化以建設之。國文教本者，文化建設之一種基礎也。余非謂固有文化，已是應有盡有，而了無缺憾。其不適用於今日者，當淘汰之；其不具備而為今日所需要者，當增益之；其已具備而又為今日之所需用者，則當發揚之，以此為教材之依據可矣。而十餘年來，有一種謬見支配教育。即時代已變，無所用於師古，疑古則是，師古則非。不知古之與今固有差異，而自古迄今，亦有不變者在。如水能溺人，火能焚人，此自然法則亘古如斯者一也。如飲食男女，富貴利達，人性之基本慾望古今人如出一轍者又一也。主僕父子夫婦兄弟朋友，此人間的基本關係，古今人皆無以自外者，從而如何調適此等關係，而使其相安相得之原理原則，亦古人今人所無甚出入者又一也。是故謂今日有異於古代則可，謂今日絕異於古代則不可。人類的智慧，以歷史的積累而增高。自謂予智，擯先民之經驗心得而弗顧，亦非求進步之良法也。故國文教材，決不當擯絕古代材料，而純取今人之製作。

國文爲學生之精神資糧，於學生之心態品格所關至鉅，非純淨瑩澈含至理而無流弊之作品，不得用作教材。有史以來，文章著作，已汗牛充棟，而今日之報紙雜誌，更是一日之出品，累月不足以盡讀。若任意選取教材，東抄西割，殊背擷取精英之原則。學校教育之企圖，本在以最短的時間，傳授文化上最要之精華。故國文教材，應取第一流作家第一等重要之文字以爲之，所謂第一等重要之文字又依何種標準以考驗之乎？則看其文字之影響是否能超出時空之制限而深入乎人人心目之中而已。是爲國文選材之最高原則。

欲覓取第一等文字，當然須於經籍中求之。依舊日之眼光言之，「經史百家雜抄」，當然爲接近理想之國文教本。就今日之情形言之，其中可以損去者尚多，而應當加入者亦復不少。今日之讀經問題，已不是讀各種整部經書之問題，乃是從經史子集四部中如何發抉其精華以編爲教本之問題。不佞所言，止於教本，教本以外，當然於經籍仍應儘量涉獵。從前兒童所讀，率爲經典，今日之教科書，取昔日之

經典而代之。理應皆有深厚之意義含於其中，不應掉以輕心，出以浮薄之辭。縱在小學教科書，其課文，亦應有所依據，或節錄經籍，或翻譯經籍，至其不得不出於創作者，亦必依據於科學的眞理，而又甚切於人生實用者，若「貓跑狗跳」之類，雖爲眞理，而無大補於人生之受用者，亦在擯棄之列。今日教育界爲「教育即生活」之說所籠罩，而充分注意於兒童之心理。須知截取成人階段而特別注意之，不復念及其兒童階段，固屬謬誤。反之，截取兒童之現階段，而特別注意之，以致忽視其未來，其爲有背於教育眞諦，亦復無二。故選取教材，應以終身之受用爲標準，而如何表出教材則當以兒童之心理爲依據。

或謂讀經籍，則必須讀文言，讀文言則有礙於科學程度之提高。讀經籍誠然須讀文言，謂文言即有礙於科學之提高，則莫測其所依據。或以爲讀文言則國文教學時數必須增多，亦未必然，今日之國語內容既多無深意之可闡發，教師之所講授者，最多限於形式之推敲而已，否則江海河漢，莫知其縱談之所及也。故今日之國語

教學時間，至少有二分之一歸於浪費。以此浪費之時間專教國文即足用矣，並不必增加鐘點。且今人喜爲語體文與文言文之爭。但依不佞之見言之，則誠不知語體文與文言文之嚴格界限究竟安在。謂語體文不避口語則可，謂語體文全爲口語，則未必然。况文言亦可成爲口語，文言並非死物？例如：「豈有此理」：本口語中之所恆有，等於白話之「那有這個道理」。但一字一義，實爲極簡潔之文言。國文之教學，當然應以口語爲起點，嗣後隨年級之增高，而益增其文言性。蓋不解文言，微特不能追及中國文化之寶藏，並且不能爲一中國人也。誠以中國人的生活上隨處皆有使用文言之必要。例如公所高懸之「游客止步」，電車高懸之「乘客注意」，乃至公園之「游覽須知」，電影院之「請勿鼓掌」，皆非完全不解文言者之所能了解。口語繁複而文言簡單，避繁就簡乃人之恆情。毋論打電報者不肯費錢打白話報，即寫揭示者亦不肯費事而書「請不要拍手掌」，「坐車的客人要留心」，「游玩的客人停止脚步」……矣。故文言文之了解，爲生活上之所必要。就句法言之，中國人的

口語實嫌呆笨，不及文言變化之多。無論寫何種書籍，欲不用文言文句法之結構，殆爲不可能，故欲有閱書之能力，亦非學習文言文不可。依不佞之意，小學一二三年級應以白話爲主，而逐次增加其文言的單辭。第四年級即宜學習文言文句法。用科學方法教授句法，一年工夫，準可熟練而無疑。其升學者，可繼續學習，其不升學者，亦聊堪應用。不解文言文眞不能爲一健全的中國人。

小學國語教材之疑問

柳詒徵

僕不諳教育，亦不能白話文學，故今日學校所授之教材，未敢妄加評論。然偶聞兒童誦習學校所教授之書，或一時瀏覽所及，竊疑此等教材，是否爲吾國今日教育兒童所必須，及以此等教材教授兒童，其效果何在，當代教育家必有能深明其故者。爰略舉之，以質所疑，直在求教，非敢有所建議。蓋今世盛倡懷疑學說。讀古書

者，動輒加以懷疑；一若古書皆可疑，今書絕無可疑者。故欲以疑古之精神，移之于疑今耳。

所疑之書，不勝縷舉。姑就現在通用之教本，略舉數種：

一，世界書局印行教育部審定新課標準教科書，吳研因編著國語新讀本，自初小一年級上學期至初小四年級下學期。又朱翊新編輯小學高級學生國語讀本，初小自十九版至三十一版據廿二年本。高小自初版至三版亦廿二年本。

一，商務印書館印行新課程標準適用：復興國語教材書，沈百英沈秉廉編著，自初小第一冊至高小第四冊，廿二年初版。

一，中華書局印行教育部及大學院審定新中華國語讀本，王祖廉黎錦暉等著，自初小第一冊至高小第四冊，自九版至一四三版據廿一年本。

以下簡稱世界本，商務本，中華本。

教育家之編纂教科書也，以合於兒童心理為主，以便於設計為得，以故烏言

獸語，充滿書中，茲姑不論。論其違反時代性與引起兒童卑劣凶暴之性質者。如：

世界本第六冊第十七課，三個聰明的笨人，「差役說好，第一個聰明的笨人找到了。就不由分說把他抓到衙門裏去，……差役聽了連忙說，現在小的找到第三個聰明的笨人了……差役把膝一屈說，小的不敢說。」

又第十八課妖人和妖法，「縣官上堂了…他把驚堂木一拍，高聲說，你是個妖人，於是縣官叫差役把妖人大打一頓，把妖物和妖圖也都燒了。」僕誠愚昧，不知今日中華民國何以要教兒童學習差役不由分說抓人，何以要學自稱小的，何以要學差役把膝一屈，何以要學縣官把驚堂木一拍，何以要學縣官叫差役把人大打一頓，此等讀本，設計時固可使兒童欣然有味。然其影響於純潔清白之兒童腦海者何如？斯誠百思不得其解也。又如：

世界本第七冊第二課鑄鍼的老祖宗「天主教徒因為他的言論有許多和聖經不合

，說他違反聖經，應該嚴辦，竟把他抓到教會裏去拷打。」兒童學會懸官教差役抓人打一頓，又學會天主教徒抓人到教會裏去拷打，是何說歟？豈吾國現有天主教人如此行爲歟？卽使此課意在敎兒童知天主教徒之黑暗，與反對科學家之發明之不合，然其正意未能說明，而反面之惡影響甚大。西洋新教徒或以此語使其國人反對舊教，吾國人不必學也。且如拷打字面，是否爲小學兒童所必學？倘意教育國民，必須使所識之字皆爲其所必須。假令國民終身不識拷字，亦無礙其生活也。又如：

：世界本高小第一冊第六課保護鼻子的妙計「古時候有個國王非常暴虐，一天他要經過某城，城裏的人民得着這個消息，都很恐慌。因爲國王若到城內，護從的飲食，都要他們供給他，他們寶愛的東西，國王看見了也要奪去，于是他們召集了羣衆，討論阻止國王進城的辦法，一個聰明的人提議說，我們最好伐取林中的大樹，把那些樹幹樹枝橫架在路上，使國王不得進城。羣衆聽了都拍手贊成。」

國王要進城了，見大小各路都不通行，只得改道而去。臨走的時候對一個鄉人

說你去對城裏的人說，我遲早要派兵隊入城，把他們的鼻子一律割去。有一個少年說，我們既然用智慧阻止國王進城，還該用智慧保護我們的鼻子。我想國王派兵隊來先要捕捉聰明的人，所以我們只要扮作愚笨的人就行了。國王回到宮中，心裏很不愉快，立刻派了一隊强悍的兵士騎了快馬趕到那個城去實踐他的話。……軍官忍不住笑說，笨奴，……軍官呵叱道，你掮了板門做甚麼？……國王聽了軍官的話，立刻赦免那全城的人民，沒有割去他們的鼻子。」

國王應學歟？割鼻應學歟？羣衆使國王不得進城應學歟？扮作笨　保護鼻子應學歟？罵人笨奴應學歟；軍官呵叱應學歟；國王受欺赦免人割鼻應學歟？僕以爲不但割鼻等殘忍之事，不可以告兒童，卽罵人口吻，亦不應載之教科書中。而諸書此類粗鄙凶暴之話，觸目皆是。如：

世界本第四冊第二十一課木屐兒，「木屐兒的父親追上來，大聲說，打死你這小東西」。

又第六冊第二十一課濟南血中敵人「你這小子倒也厲害，好，你滾罷。軍官說，你們過來把這小東西也裝在麻袋裏，同丟到海裏去」。

商務本第七冊第三十九課富翁和鄉人，「站起來唱道，半碗也沒有的，快別多說，快給我滾開。」

中華本高小第二冊第二十二課小雀兒，「你這不是好東西的人，你為什麼要害我呀」。

兒童讀書，未必能貫徹全章之意，往往斷章取義，隨口流露。此等粗暴罵人之語，何必寫在教科書中。吾意小兒雖不讀此書，亦能為此等罵人之語。再見書中有之，直認為此學校老師所背教，於是摩仿練習，遇不懌時，衝口而出矣。僕固不解國語，然妄意所貴於教育者，乃在使國民習為粗鄙之言者，因學教育而改造為大方溫雅之詞令。非謂固有之語言程度已好，第須編教科書者，執筆寫出，使兒童紉口耳之所常道常聞，能現之于楮墨也。今人不務改進語言，反以降低語言為事，僕

誠私心痛之」

凶暴粗鄙之外，又有愚笨及欺詐兩類，此亦因引起興味之故，務使兒童發笑，遂常以此等事教之，然亦有兒童雖愚，亦不至笨至此極者，列之教科書中，不知有何關係？如：

商務本初小教科書：「媽媽叫相成去買六個銅圓的酒，六個銅圓的油。相成問媽媽，那六個銅圓買酒，那六個銅圓買油。媽媽說，隨便好了。相成又問媽媽，那一隻碗買酒，那一隻碗買油，媽媽說，隨便好了。相成又問媽媽，先買酒呢，還是先買油？媽媽說，隨便好了。相成又問媽媽，那一隻手拿酒那一隻手拿油，媽媽說，你太笨了，我和你一同去買罷。」

此不過買油酒碗等字之練習耳。而使用思於此等不成問題之事。且誦習一篇，徒耗口目之力何爲者？諸書所載愚笨之事至夥，姑以此爲例，不暇一一錄之也。

欺詐之事，則如前舉以智慧保護身子一課，即教兒童以欺詐也。又如：

商務本第七冊第二十三課一隻盲目的龜，「烏龜聽了這話，假裝驚惶的樣子，哀求說，我生平最怕的是水，請你們不要把我拋到河裏去咧。狐狸說，老東西，你怕淹死嗎？偏要請你到河裏去淹。狐狸把烏龜拋到河裏去，烏龜昂起頭來，笑着說，哈哈！中我的計了。河是我的家鄉」。

中華本高小第四冊二十五課車中，「車夫低聲答道，我，我，我怕你殺我呀。測量師說，哈哈，我是誑你的，我並沒有手槍，來！我們走罷。」

僕亦不解國民教育何以要使之說誑欺人。豈以誑騙爲能，始足啓發兒童智力乎。

愚蠢欺詐之外，又有若干虛妄迷信之語，如：

世界本第三冊第八課夢中人「一小寫真，坐雲船，二小寶善，坐雲船，三小愛美，坐雲船，四夢裏遊玩月宮，仙兎仙女仙童……」等等，語長不備錄。

中華本第六冊第二十三冊月宮，「相傳上古時候，十日同出，禾苗都晒枯了，

有個大力士，射中了九日，有九個金烏，落在地下，天氣就溫和了，大力士得了長生仙丹，他的妻名叫嫦娥，偷吃了逃到空中，遇着仙宮裏搗藥的玉兎，引到月宮裏去了，月宮裏有一棵桂樹高五百丈，有個仙人，夜夜斫這桂樹，隨斫隨長，月中黑影就是仙人斫樹的影子」。

又第二十四課「摘外國傳說，古時有個樵夫，他的妻要他斫柴，預備日曜日煮飯，他很懶惰，走到山裏睡着了，到了日曜日醒來，斫了一捆柴，背着回去，忽然空中有聲喝道，把柴放下來，樵夫說，這柴是我斫的，讓我背回去吧，空中說你睡夠嗎，日曜日斫的柴不許背回去，樵夫說，體恤我吧，沒有柴，我妻不能煮飯，空中說，你不放下柴來，你就永遠背着啦，樵夫正在為難，忽然身體升到月宮裏去了。月宮裏的人說，你在這裏永遠斫柴吧。」此雖中外相傳之故事，然亦非國民所必須知，其他各書中仙人仙女之類，更無足論矣。

[illegible]之不知意思何在，如：中華本第一冊三十六葉，「

大黃狗吃肉，吃完了就走，小黑狗瞪瞪眼，小白狗也瞪瞪眼」。

商務本第五册第三十七課騾子和駝子，「駝子打騾子，騾子打駝子」；「小學第一年何必須識一瞪字，何必知瞪瞪眼之語，至駝子騾子相打何關于教育，此皆不可解者，如：

世界本第四册二十一課木屐兒「一，踢小皮球，黃民生只得走了，但是他永遠不忘記這一回事。二，打小朋友，華民權只得跑開，但是他也永遠不忘記這一回事」。

木屐兒之欺黃民生華民權，豈是永遠不忘這一回事所可了者。以此教育國民，徒長他國凶燄，而使吾國國民頹喪，自幼即屈服於異族兒童。外此則欲示國恥，實假張其他國之國威，而增加兒童恐慌之心。例如：世界本第六册第二十三課租界裏「我們飛過黃浦」看見許多外國的砲船，我們飛近租界，看見許多外國人布置的鐵絲網小砲台。我們不知道這些東西是預備威嚇誰的，不免心驚胆戰流出一把汗來，我們飛到一處地方，站在馬路邊的電桿木上張望只見那馬路又平又闊，路旁排著

許多高大的市房，開著許多富麗的商店，堆著許多精美的洋貨。路上往來着許多汽車電車，走着許多男女老少，還有許多外國的巡捕軍隊往來巡查，我們不知道這個中國地方，爲什麼有這些外國軍警，心裏又不免暗暗地吃驚，我們再看那些軍隊身上著背快槍，腰間纏着子彈，個個威風十足，神氣非凡。我看了便想起那年從公共租界出發，用飛機大砲轟炸閘北江灣吳淞，燒燬學校民房，殺死小孩婦女等的故事來，心裏嚇得了不得，再也不敢停留」。

是否欲使兒童自幼即留此恐怖之影響，畏其威而慕其盛。

中華本第八冊第十八課祖母的談話，「……那時候各門功課一樣也沒有，而且要讀過四五年才講解，塾師又多嚴厲，背誦不熟，還要打手心，所以小孩子多要逃學；那時候女子都纏足，纏足的時候，要把骨頭折斷，痛的了不得。我記得我和你們祖父結婚，甚麼下聘哪，過禮哪，送嫁裝哪，鬧了許多時候。結婚那一天，我坐在花轎裏，長輩吩咐我要嚶嚶的哭，到了男家磕了無數的頭，疲乏不堪，第二三

天，又碰了許多頭，我四十三歲時，法國爲爭安南與我國開戰，我們住在福州，驚惶的了不得，有一天晚上，有人說我國海軍開砲轟敵艦，法國大將孤拔被我們打死了，後來又傳說孤拔不是打死的，是氣死的，是眞是假，我們無從判斷」。

直使小兒厭惡吾國從來習慣，無一優點可言，而中法之戰不述馮子材等可信之勝利，轉述孤拔死于何故之疑問，此令人喪氣，至于正式詔示國民者，如：

世界本第八冊第廿九冊課革命之路，「……所以我想爲民衆的利益，打倒一切欺騙民衆壓迫民衆的偶像與惡魔，建立一個政治經濟完全平等的社會，這是國家的出路」。

中華本第八冊第三十八課德國孀婦的談話，「……貴國只須政治修明，教育普及，實業發達，交通便利，兵備而不用，人不敢犯我，挽回已喪的權利。收回已失的土地，儘夠了。切勿有他種野心自召侮辱」。

又皆是浮泛不切之談，而對內則打倒一切，對外則不敢有野心，免召侮辱，嗚

呼！吾國教育家所以教育吾小國民者如此，吾更何言。

教育二字，殊未易言，雖以博物小端，亦必具有開物成務之閎識，寓以牖民覺世之深心，而後可使全國兒童在幼稚時間，已確立任重致遠爲大國民之基礎，矧以今日國難如此嚴重，學校中一日一時皆不可使之猥褻，若徒剿襲他國課本，或小說家之寓言，參以吾國報紙老生常談，加以市井無賴口吻，以致養成國民輕劣心習，舉炎黃神聖之胄裔，悉葬墜于重淵，其禍之烈，殆尤甚于敵國外患，此小學教科書之所以當注意也。惟僕自知不通教育，所言容或皆無當，尚冀海內大雅君子，不以小學教科書爲無足輕重之事，稍節心力，一一讀之，則于僕之所疑，或可加以解釋，或更加以評論。則國民幸甚。小學兒童幸甚。

關小學參用文言與初中畢讀孟子及指斥語體文諸說

吳研因

文言語體和讀經的問題，至今還沒有結論，這實在是我國教育界的不幸！

但是某氏長北京教育部的時候，欲恢復小學文言而不得；袁世凱做皇帝的時候，政事堂主張高小必讀經而未果；張勳張宗昌之徒，也曾竭力提倡尊孔讀經，結果也只有一點兒的聲浪而到底難以實行。

就湖南廣東而論：據我視察所及，及教育當局見告，何鍵先生並沒有强令學校讀經　廣東有陳濟棠先生主張學校讀經之議，但據廣東教育廳報告，也屬子虛烏有。

歷史告訴我們，主張小學用文言和讀經的，正如「無邊落木蕭蕭下」；事實告訴我們，現在有力者也並沒有主張小學必用文言或必須讀經。所以我們站在教育界的人，倒也十分定心，並不怕「焚書之禍，不難見於今日」！

時至今日，我們所怕的，不是教育界以外「篤舊之士」的反對聲；倒是號稱教育界名宿的筆尖兒。要是教育界的名宿，到現在還逞其筆尖為「篤舊之士」張目，那就够驚駭了。

最近讀到教育界名宿汪典存先生在「時代公論」所發表的高論，主張小學高級必參用文言文，初中則應畢讀孟子。我覺得雖似調和新舊，並非極端，但也恐影響所及，波瀾以興；所以不得不加以辯正。

汪先生主張的理由是：小學參教文言，「不特為升學及社會應用所需，即對於不升學，亦可不絕其研習文言之機會」。初中畢讀孟子的理由，未明白說明。但大概也是在正人心，並養成讀作習慣之意。汪先生不滿意的是教育部最近的禁小學習文言及不許初中強令讀經二令，他以為是乃「造成教育棼亂之源」，只有他自己的主張才「折衷至當」。

現在我們先研究教育部令，牠說明小學習文言初中強令讀經，實都是加重學生負担。所謂加重負担，本不是無根之言。此次部派視察各省教育，見內地高小有兼習文言，初中有強令(學校當局之令)讀經而成績實在不佳的。算學理化……無論矣，就是作文成績，高小弄得不文不白，初中也弄得非古非今，成了一個「四不象」

的形態，教育部同人以為欲免此弊，不得不有此令，我們以為部令是有為而發的，決非「無的放矢」，「徒逞臆說」。

次論汪先生的主張：

一，就小學高級參用文言論，我們以為小學高級如參教少許古人不用典故的寫景，敍事，詩歌，范石湖的田園雜興，及木蘭辭等，以助兒童讀書趣味，原也無所不可（這些詩歌，有許多人仍把牠歸入白話詩文內）如必參教之乎者也的敍事說理等文，實在是治絲益棼，而不得益的辦法。因為小學生年齡既幼，識字未多，文理未順，語體文剛才弄慣，又猝然參習文言，這不是「徒亂人意」嗎？初中入學考試，照部令本不許考文言文，不習文言，於升學並無妨礙。社會應用語體文也日見其廣，報紙體的文言記載，本和語體文接近，小學也還可以看得，對於社會應用，實也不生問題。至于畢業後研習文言一節，我們以為普通人本不必個個去鑽在故紙堆中。有異秉的，他也自然會自己去研習，用不到我們替他担憂。再以事實來說，小

學不讀文言，已十多年，我們的子女輩，在小學未習文言，也已有在高中或大學畢業，並且立身於社會的了。他們的古書或者讀得少些，至於升學或應用，則實在並未發生障礙，此等事實，誰得否認呢？

二，就初中畢讀孟子論

我們因為初中確可選讀孟子的菁華，但是決不可從頭至尾畢讀。孟子上有許多理論，固可供青年修養之用，但也有許多已不合時代潮流，讀了反足以腐腦，或者好為大言不願勞力，以文章論，孟子之文固很流暢，足以增進青年讀作能力，但也有許多節短瑣屑無甚結構，且不重要的章節。要是不加選擇而畢讀　那也徒費工夫，大背經濟原則。以汪先生的聰明，回想在中學時倘且「直以國文科為休息調節之地而無所用心」，不得不「傾其全力於英文算學……理化」，則可知普通學生，要畢讀孟子，一定會妨礙數理的傾注了，初中科目，初中課程標準委員（汪先生也是其一）會擬定　「科目繁多」既一時不易減少，而又要學生畢讀孟子，豈不更減

輕了數理等的傾注嗎？汪先生爲了語體文有「打倒權威」的危險，但是孟子的學說，也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隨各人的意見和解說不同的。孟子倡民貴君輕之說，即爲明太祖所不喜，而且反對暴君污吏，主張井田，經界最力，安見讀了孟子，就會一輩子不想「打倒權威」呢？漢以來，君主借尊經忠君之說，維持權威，但是君主的權威，今又何在？

汪先生的主張，和我們的主張，原也相差無幾。我們主張小學高級可參教古詩歌，初中可選讀孟子，與汪先生主張小學高級必參教文言，應畢讀孟子，其間相去不過「可」與「必」「選」與「畢」而已。本也無足深駁，不必斷斷與爭。但汪先生的指斥語體文諸說，卻關係太大了，更令人不能默爾而息。茲再條闢其說如次：

一，汪先生說「禁習文言乃少數人之私見。」其實不能算少數了，以教育行政者言，前北京教育部，前大學院，今教育部，不知經過了多少部次長和部員。多數主張禁止小學習文言文，皇皇明令，非少數人所得而包辦，以課程標準言，也不知

經過了多少教育界人士之研討，到底主張小學不教文言文，第一次全國教育會議，也多數決議小學應用白話文，……這可見並不是少數人的私見。

二，汪先生說「現代白話文土苴禮義廉恥忠孝仁愛之說，青年讀之，信爲洪水猛獸」。其實蔣委員長的演辭，中央黨部的宣傳文說，黨國元老以及當今名流的論文，爲報章雜誌所爭傳的，自來有不少語體文的作品，試問是洪水猛獸否？就以文藝作品而論，左傾的既在禁止之列，刊載於中央日報的所謂「民族文藝」也多數是語體文能說絕土苴禮義廉恥忠孝仁愛嗎？或者汪先生要說這些多「不足以發興趣而解煩悶」，所以學生不喜讀，所喜讀的，却爲彼而非此，那麼我要問：要是小學中學都讀文言文「彼」就可以無人閱讀嗎？我們幼時純讀文言，但何以也酷嗜紅樓水滸……等語體文作品，不問社會如何，「彼」何自而生？乃欲因此提倡文言以正思想，我恐雖讀文言實也不能「塗民耳目」。況且充汪先生之說，文言不但應參讀，語體文實應禁讀。何以又主張只參教文言而不與洪水猛獸的「浸淫日永」於

小學生呢？

三，汪先生說「初中因限讀文言文，故教材「斯窮且濫」」。如上之說，演說詞，宣傳文，論文……何不可取為教材，而乃至于「斯窮且濫」，「誰之咎歟？」

四，汪先生說「今人以兒童中心為白話童話之護符，實不知兒童心理」。現在多數高小的教科書，實絕少取及童話，不知以童話為護符者，到底是誰？專讀語體文，不加重兒童的負担，這當然較合於兒童生活，照汪先生所說，白話不盡合兒童心理，但是「高級必讀淺易文言」即盡合兒童心理嗎？根據甚麼「長期的測驗研究」呢？

五，汪先生說「學習文言與學習語體，孰難孰易，必經心理專家之長於文字者，作長期的測驗研究，殊未可一語武斷」。當然心理專家之長於文字者，迄今還未有測驗研究報告。但是據我們的觀察，並證之汪先生的主張，實也可以斷定文言難習，語體易學了。當小學讀文言文時代，除教科書外，無他物可供兒童閱讀。及改

讀語體文，兒童讀物卽如雨後春筍，十年間出版至三四千種，銷行至數千萬冊，此可見文言難習語體易學之一斑。從前青年作文言信，必翻尺牘，現在作語體文信，則要說甚麼便寫甚麼，郵政局的生意也增加了，這也是語體文易於文言文的證據，且也不必旁徵博引，汪先生主張初小用語體文，高小不過參用文言，並說「學習文言當較白話費力」，這不也就是語體文易習的結論嗎？

六，汪先生說「文言一字傳神，白話則往往數十語不能達意，雖學文言較費力，而以後學用，必且倍蓰」。教育固當注意結果，但也應顧到過程。「十年窗下，僅乃通文」，此十年工夫，豈能不算在經濟的眼內？況且寫文言文十九不通，做白話文，隨意可造：這也是事實。在科舉時代，所謂童生專習文言的，十年窗下，到底有幾個人是通順的？以江陰論，「督學」所駐，考生綦多，千人投考，通順的實在不過百六。讀文言的結果，這也可想而知了。汪先生做過中學校長，中學一定注重文言的，試問高中畢業生，能夠以文言一字傳神，得文言的受用的十人之中，究

有幾人？過程既很困難，結果又不易佳，何論效用與否？

七，汪先生慨嘆教科書商品化，貓言禽語，是召焚書之禍，我不知究竟商品化召禍呢，還是貓言禽語召禍？或者商品化與貓言禽語兩合則召禍。據汪先生所說，含有寓言意味的老鼠請客，狗開會等故事，可以施之於八歲的兒童，那麼貓言禽語，在所不禁。果教育界名宿而能倡此說，則社會人士自可翕然，何禍足召？否則也不看看教科書的貓言禽語，到底有否寓意？便說「濫用想像，不體經驗」則所謂「推波助瀾」，無怪教育的門外漢，要盲目地深惡痛疾了。至于教科書的商品化，在自由競爭的買賣之下，誠所難免；要是制度稍改，我想其風也可稍戢。况且教科書的商品化和用貓言禽語，實在與文言文白話是兩個問題。文言教科書未必不可加入貓言禽語為材料，也未嘗不可商品化。「吾國談神說鬼之書汗牛充棟，干寶搜神，聊齋志異：：豈非都屬文言？商品化之書，實也五車可載，由來已久，科舉時代的大題文府，小題文府，民十前，各種文言教科書，豈非都已商品化？就以經書而論，

左氏傳不少談神說鬼之文。十三經也多眞僞訛正之辨，豈能以貓言禽語及商品化編怪白話教科書呢？要是白話教科書足以啓焚書之禍，那麽文言教科書以及一切古書豈非多足以啓焚書之禍？我還有一種極端的主張，焚書之禍卽重見於今日，也不必由我而先自遷就，改白話爲文言。因爲書的性質或一種主張如非的，焚了也不足惜；如是的，焚了更咎不在我。秦始皇焚書，難道是書自己闖出來的禍嗎？

總之：汪先生的主張，還似乎脚踏在教育界上，雖稍偏而仍舊不失爲一家之言。汪先生的指斥語體文，則似乎越出教育界以外，不特有自相矛盾之處，且好像爲「偏舊之士」張目。教育界以外「偏舊之士」的攻擊，本不足畏，獨教育界自身的內訌，則誠可畏之至！以名宿如汪先生，在教育界素負盛名，而竟發爲此言，「偏舊之士」拿到了，必更振振有辭，以相反對，李斯執荀卿之說以成秦始皇的倒行逆施，那麽焚書之禍，非啓自白話文，實啓自汪先生之說了，在汪先生豈願負此責任？

我久不發表意見了，實在也沒有工夫發表，因爲重視汪先生之說，不覺斷斷爭辯。修辭不當之處，未及訂正，萬請汪先生原諒，並請全國教育界諸君指教。

中小學文言運動

汪懋祖

近讀吳研因先生駁部人在本刊發表之「禁習文言與強令讀經」一文，多似是而非之談，並挾部令以自固，竊恐眞理不彰，不得不更嚴辭闢之。

（一）吳先生以文言白話之爭，至今尚未結束，嘆爲教育界之不幸，不得不深惜吳先生之少見多怪。吾以爲文言文一日不絕響，則此項問題便自一日存在，舉例證之：

一、歐洲自宗教革命，倡行白話文，至今四百餘年而古典文仍爲中學課程之要素，或分組修習，或列作選科，而中學初級，即注重語文訓練。

二、歐戰時，各國教育頗多革新。一九二三年六月，法國教育總長M. Leon Bérard提出中學課程改造計劃，以拉丁文及希臘文改爲通習科目（法國中學共七年，前期四年，向分古文今文兩組）。自第一年級起，教授拉丁文，第三年級起，教授希臘文，非拉丁希臘文及法語及格，不得應學位考試，（法國Baccalaureat爲中學畢業學位）。

三、英國自工黨執政，新制中學頗稱發達，不習古文，學者恆慮古典失墜，特組織學會，提倡古典的修養。

四、美國教育上之研究及創造，自多新異。而反對之聲浪，所在多有。茲在留學筆記中，擇摘二節如下：

1. 一九一九年九月，轉學哈佛大學，旁聽文學教授Babbitt先生課。離哈佛時，至其家請益，先生爲余講人文主義之重要。及握手告別，先生丁寧相囑，宜多信孔子，勿信杜威。

去一九二四年三月，隨克觀瀾先生赴紐約省城，參觀省教育局及省立圖書館，局館長 Wyner 談教育，據氏之意見，現在美國教育已失教育之真義。若教育之真義，必於古典中求之。蓋氏亦人文主義之信徒，意見不免稍偏也。

以上事例，不勝枚舉。吳先生不與「教育界以外偏頗之士」，而獨以余文為可懼，為「足可驚駭」，先生過矣。真理之探討，愈辯愈明，際茲時會，猶有人焉，討論此項問題，即為教育進步之徵，尚為可喜，而何懼之有？而吳先生以為「內訌」，固矣。

抑有進者，吾國文言與白話相差之程度，決不如西洋古文與近代語相距之遠，倘未可相提並論。而各國學者，孜孜焉雕古典之失墜是憂，乃吾國教育界希望文言之典籍，如「無邊落木蕭蕭下」，異矣。

（二）十餘年前，所謂新文化運動，課其成績，不過語體文在學校課程上有地位，他無有也。而當年一般主張白話者，所以箝制對方口實，殆不外二式：一則尋

章摘句　吹毛求疵，或爲無理的謾罵，或以尖刻之筆鋒，極譏笑之能事。二則不辯是非，任舉一二惡例，以相壓制，使人不屑與辯，詡詡然自以爲成功矣。吳先生之論辯，似習沿用以上第二方式，請進而研究之：

吳先生引用袁世凱做皇帝，主張尊孔讀經，張勳張宗昌之徒，亦主張尊孔讀經，務使做皇帝復辟與尊孔讀經，聯爲一體，造成機械可怕之聯想。以吳氏之邏輯推之，則凡今日主張尊孔讀經者，皆袁世凱張勳之流，故急急否認陳濟棠何健等之主張者，以爲引起反感，而歸其過於學校當局，其用心可謂巧而苦矣。殊不知天下良法美制，爲惡人假借，或良法美制之下，偶生惡果，其例不少概見。必謂此法此制，當予剷除，充斯義也以往，則李自成亦曾舉行考試，而考試制度即不能復用。民國初年，[illegible]大總統令有云：

「使中華民族爲大仁大智大勇之國民，則必於忠孝節義植其基，於智識技能求其用，尚武以備軍人資格，務實以儆末俗虛浮，矢其忠誠，以愛國爲前提，苦其心

志，以儆官爲大戒。厚於責己，恥不若人」，此語出於袁世凱，凡後之爲此言者，皆爲袁世凱。且吾國歷史文物，皆爲封建時代之所遺，宜如「無邊落木蕭蕭下」而不足顧惜，則毋怪今日學生頭腦混沌，黑白莫辨，又安望科學之進步。以如此思想啓示學生，所關尤鉅，非僅白話與文言之爭爲矣。

(三)吳先生以禁習文言非少數人之私見，歷舉「前教育部，前大學院，今教育部，經過多少部長次長和部員多數之主張　禁止小學習文言文，皇皇命令，非少數人所得而包辦」，不知此即少數人之明證。以部令論，則吾人服務教育界，自應服從。若猶標榜「行政學術化」，則不佞殊未敢緘默。況全部部員，決非與吳先生一鼻孔出氣，惟前次長劉君大白主張白話最力，創造人話(白話)鬼話(文言)等怪詞，以箝制衆口。當是時，吳先生固得大申其志，然劉君則已朽矣，而文言文不與之俱朽。今部長王君學問淵博，惟術業有專攻，致力任遠大，對於吾人所爭辯者，或未必有濃厚之興趣。竊所望於王氏者，在能糾正前人之缺失，如謂皇皇明令未可輕更

，則部令之修改或撤消者，亦不知凡幾矣。若依訛襲謬，坐視其滔滔日趨下流，吾為此懼。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更也人皆仰之，個人如斯，政府宜然。今教部諸公，苟不背文人學士之言論，請一察職業界之需要，定可知余言之非「無的放矢」。

吳先生以讀經之令，出自學校校長。試問今日小學校長，誰復知經。又誰敢違背功令，而違犯大部之申禁？讀經決非惡事，似毋庸諱言。時至今日，使各省當局如何陳龍之主張尊孔讀經，可謂豪傑之士矣。

以上就吳先生論辯之態度及其論據，加以討論。以下就中小學國語教材，根據吳先生之主張，再加論列。教育者，決非「教育界」的教育，全國關心教育者，幸注意焉。

（四）初級小學適用語體教材固矣，而爲鳥獸語以及神仙荒誕之故事，與大部提倡科學之宗旨未相符，所衍可以兒童興趣解釋之。故小學一年級不妨參用，以喚

發學習之動機，顧引用此項教材，必深涵啓發的性質，至指事名物固亦無取乎此。若貓，狗，雞，羊，吃飯，穿衣，說話，遊戲，充塞篇章，徒以引逗兒童之笑樂，此之謂稚氣的興趣，杜威亦嘗斥其非矣。寓言教材，自可不避物語，而態度必須莊重。若「花貓」亦稱先生，則兒童思想，即爲此種滑稽性所蒙蔽，不暇推索其眞趣。近有友人之子，在某小學一年級，一日該級講授「妖怪吃人」故事，令兩兒童至另一室內裝扮妖怪，師率全班兒童往驅妖怪，則有兒童駭怖而啼者。此課之目的，欲養成「無畏」的精神。但兒童本不知有所謂妖怪，乃故施以可怕的刺激，以引起恐怖的本能，而結果與目的適得其反。豈教育之道應如是乎？

近偶檢得某局出版初小國語新讀本第四冊第十四課，抄錄如下：

三隻小松鼠

（一）看衣裳

有三隻小松鼠，一隻叫紅尾巴，一隻叫藍眼睛，一隻叫黃小毛。他們知道兒童

節快到了，商量穿了甚麼衣裳，到學校裏去開會。

紅尾巴拿出一件紅大衣來，嘆口氣說：「我常常穿紅大衣，眞是討厭，我想揀別種顏色」。藍眼睛拿出一件藍外套來，也搖搖頭說，「這藍外套我也穿膩了，最好換別的顏色」。黃小毛拿出一件黃旗袍來，也說：「我也討厭這黃旗袍，能換別種顏色最好」。

紅尾巴說：「我們去問蝴蝶姑娘，他穿的衣裳的顏色最好，也許他會告訴我們怎麼換顏色的法子。」藍眼睛黃小毛都說：「很好很好！」他們商量定了，就到蝴蝶家裏去找蝴蝶姑娘。

（二）換顏色

三隻松鼠，找到蝴蝶姑娘，和蝴蝶姑娘商量換顏色的法子。

蝴蝶想了半天，拍著翅膀說：有啦：樹林後面有幾個池，你們拿衣裳去洗洗看，也許會變顏色的」。

他們聽了，就去找池，找到三個池，一個是黃水池，一個是紅水池，一個是藍水池。

三隻松鼠拿自己的衣裳去洗，紅尾巴的紅大衣，放在黃水池裏洗，藍眼睛的藍外套，放在紅水池裏洗，黃小毛的黃旗袍，放在藍水池裏洗。

不滿五分鐘，他們就把衣裳拿起來絞乾，紅尾巴一看，跳起來說：「哦！真變了，我的紅大衣變成橙皮色的顏色的大衣了！」藍眼睛也很奇怪，翹着尾巴說：「看哪，我的藍外套也變了，是紫顏色，多麼美麗啊！」黃小毛看看自己的旗袍，也說：「你們看，不是也變了麼？這是綠顏色。」

大家看了都很高興。

（三）改名字

兒童節那一天，三隻小松鼠，穿了美麗的衣裳，到學校裏來開會，紅尾巴穿的是橙色大衣，藍眼睛穿的是紫色外套，黃小毛穿的是綠色旗袍。

小朋友們看見他們，都好像不認識，大家說：「這三位姑娘穿的衣裳真美麗啊！」

敘發的時候：三隻小松鼠把衣裳變換顏色的事情告訴小朋友們。……

此課要義，除鑑別色彩及說明配色合色之理外，未知其能起何觀感。夫一兒童節，從兒童自身說法，方能見得真切，何必造出紅尾巴綠眼睛之怪物，換衣赴會聚餐，若今日時髦教本，一若各種智識，必出諸各種動物之口，斯亦奇矣。美國固亦有一派竭力誇張神話物語之價值，是謂浪漫派。浪漫派教本之在我國，乃不見其為浪漫，積非可以成是，孔子所以惡紫之奪朱也。

（五）杜威主張「教育即生活」，而深斥「預備生活」，此義常被誤解。以致過分重視兒童生活，而漠然於其將來之需要。其實杜威「教育即生活」一義中，何嘗不含有「預備」之意。其所反對者為完全站在成人的立場以教兒童，惜杜老對於「預備生活」一義，指斥過當，以致流弊滋大，非始料所及也，各國義務教育年期較

長，「尚可從容注重兒童生活。若吾國則義教四年，尚不可及，則在此四年之中，似宜多顧「預備」。凡社會需要應所重視，鄉村環境尤當體察，今教本多重都市兒童生活，已非合理。而社會上稀用之字，反多見諸於第一冊，如某局教本第十課及十一課：

老母雞　喔喔喔

小小雞　嘰嘰嘰

「喔」「嘰」二字，一生用得幾次，而必先使之認識耶。余觀此類教本，在低年級，即語體文亦須改造，方能合用

社會上反對物話教本，余初以為文人學士之言，不足為憑，故亦置之不理。迨去年下鄉考察，始知此項教本，農村中反對之聲更普，而皆趨私塾讀書之有用。日前本市社會局召集職業指導會議，有農工商代表列席，僉主小學高級必須教授文言，並有贊成私塾者。以教育眼光察之，自不能過於遷就環境。然興學三十年來，私

孰非惟不卽淘汰，且有方興未艾之勢，是亦足資猛省者。此吾文之所以作也。

（六）與先生謂初中國文教材，並不枯瘠。歷舉「蔣委員長，中央黨部，黨國元老之演說辭，宣傳文，或論文，凡雜誌報章所爭傳的，不少語體文的作品」，無不可以作爲教材。誠然，不佞主中學時，每見上項文章，立卽選付印刷，分發講授，如蔣委員長告全國學生書等，使誦全校。惟論文偏於專門，學生不易瞭解，宣傳辭過於冗長，可閱覽而不便精讀。至如精警之作，如汪精衞先生題曉課圖，革命的勇氣，及執信的人格諸作，自當選爲教材。但此項文字甚少，而初中三年，每週以兩篇爲率，一年至少八十篇，並須顧及文體結構，而且於民族精神，倫理美感，理智，體育，政治，社交多方興趣，皆須顧及。若按照部頒課程標準，而向雜誌報章選擇材料，恐富有教學經驗者，亦歎其窮乏，而一年級教材尤甚。

近稍翻閱初中國文教本，其在一二年級尤爲駁雜，有翻譯之文，有冗長佶屈之作。而水滸景陽崗一節，幾無不選入。此文描寫武松打虎，栩栩如生，以文藝論，

固自可喜。但其中有一句「我却怕甚麽鳥？」教師講至此語，試問如何表出？不使自嘆頭腦陳腐，則退一步言，就令有女生在前，亦可無所避忌，惟國語教學除技術之外，尚含有修養及提高語言之作用，必須注意。而此篇乃普遍精習，幾視爲國文之寶典。此吾所謂窮且濫也。

（七）吳先生謂高小「如婺教之乎者也的敘事說理等文，實在「治絲益棼」，「徒亂人意」。吾所謂高小文言，當如歐陽修養魚記，薛福成觀巴黎油畫記之類，多選抒情記敘淸淺有味之文，並非周誥殷盤佶屈聱牙之文。其實以文而論，此類文字，已是白話，不過腔調不同。若吳先生能承認此點，則彼此意見，無甚出入，又何事爭辯耶？

吳先生恐「之乎者也」糾纏，以致「治絲益棼」，不知「嗎底啊呀吶呢的」，是否更增教學之困難，倘初中全教文言，而以語體文爲課外讀物（初中課程應如何修訂使之簡單化，見拙著中國制度之檢討與改進，此處不詳述），則三年以內，即

天資稍鈍者余敢必其清通。今因白話教材多於文言，誠如吳先生所謂「四不象」，工具不能運用，又安能稍窺較深之文籍？前年中政校招生，國文試題有下列一段文字，試加標點，并譯成語體：

高帝創業，日不暇給，孝惠享國又淺……

多數試卷標點爲：

高帝創業曰：「不暇給孝」，惠享國又淺，……

高帝創業曰：「不暇給孝惠，「享國又淺……

凡此皆有事實可證，非「嚮壁虛造」也。

（八）吳先生徵引科舉時代江陰考生千人中通者不過百人，其例恐非盡確。蓋科舉之文無論八股或策論，皆有一種體制，另成一種技術，又限於定額，不取者非可目爲不通。僅有文才卓犖而一生不第者，故不足以爲例也。學習文言固較尋常語言稍難，但其努力之程度，決不如吳先生之甚，而應用上之省力，則閱者作者以及

印工省校經濟。若用耳不用目，因無須文言，若須用目，則文言尚矣。因文言爲語體之縮寫，語言注重音義，而文言于音義之外，尙有形可察，例如說：「這一個學生或是那一個學生」，文言只須「此生或彼生」，即已明瞭，其省力爲何如？此僅就工具言之，已無待辯論。矧猶有先民精神所寄，必欲如掃落葉，則不佞宜力教育，斷不敢附和雷同。

要之文字之墮落，如無關於民族之墮落，不佞何必斷斷焉？今日國事萬端，教育問題亦萬端，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余識其小者而已。又以秉性率直，一時興會所至，恐不免開罪他人，惟吳先生與教部諸公，諒其苦心，是非得失，付諸公論，從此勿復置辯矣。

讀汪文「中小學文言運動」後的聲明

吳研因

貴報所載汪典存先生的中小學文言運動一文，前半篇論點很難捉摸，後半篇也

並未駁倒我的小學不必教文言，語體文本身不能斥爲破壞思想等主張。所以我不想再發言了，但是有幾點不能不說明的。

一，外國人對於中國文化，正如中國人對於自己的文化一樣，有許外人崇拜中國的古董，同時也有許多人以中國的古董爲非。以文字論，杜威，孟祿就說中國的文字太難學，應當改造。國聯教育考察團也建議中國的文字應當研究改良，同時還有一班別有心肝的外國人，一味迎合或放任舊社會，所以也往往鼓勵中國人讀經尊孔並且尊重中國的學究先生（香港就是如此）。在他們看來，保存中國的「國粹」，正和保存中國的迷信，鴉片烟，小脚……一樣。我們實不可引以爲榮，汪先生引美國哈佛大學教授的主張，自然又和這班別有心肝的人不可同日而語。

二，我們固然不能「以人廢言」，袁世凱張勳張宗昌之徒，人雖可鄙，言或可稱。但教育新興的時候，一班明達的讀書人（？）主張開辦學堂，而不識字的貴宋儒，卻偏擁護「四書五經」，三字經千字文也在他們擁護之列。斥學堂爲洋學堂，

攘臂怒目，欲得之而甘心，其心固未可厚非，其愚實深可憐憫；況且袁張之徒，提倡尊孔讀經，原與他們的「帝制」「復辟」等目的，有連帶的作用；不特其愚已甚，其心實尤可誅。

三，何鍵陳濟棠輩，雖曾提倡尊孔，確未強令學校讀經，要是不信，請通函到湖南廣東去問一問便知。再不然看看教育部視察湖南教育報告和粵教廳覆教育部的呈文，也可以證明此說。

四，提倡小學用語體文，發端於北京教育部，禁止小學用文言文，令出自前大學院，申令小學不能用文言文，以加重學生負擔，是教育部最近的公文，實與劉大白先生無涉，鄙人「馬前小卒」，更無能為力。汪先生以為部令應服從，請勿因劉先生和鄙人之故，而就表示不服。

五，小學國語教科書，編輯不能盡善，取材不能盡當，無庸諱言。但論用字，我們終身用貓字，而貓字，為中外教科書所通有，形容聲音的喵唦等字，當然最

好不用。但在兒童字彙中，如無他字可代，爲行文之故，實也不妨偶一用之。至松鼠換衣的故事，旣有辨色和配色的自然目的，當然不必再顧其他，因爲小學教材的目的，往往單純而並不複雜的，況且摭拾一二字或一二課課文，目爲今教科書全體病，這也不是我們所應取的態度。

六，職業界主張文言，這是囿於舊習的緣故。我們不能因我們的母親主張替孫女纏小脚，而便犧牲自己的女兒，也不能因多數老百姓主張應有「真命天子」出世，而便歡迎溥儀回鑾，或請袁世凱復活。因爲舊社會歡迎私塾，主張文言的緣故，而便自認爲新教育失敗，這正似因爲有人希望皇帝登極而便自認爲共和失敗一樣。

我已說過汪先生的主張並不極端，而命題措辭却好像是一個極端派，希望汪先生如再發議論時請先自認定立場，再看淸對方的論點，然後立言，否則枝枝節節，打了一百年的筆墨官司，打到老死，恐怕也不明白自己到底是爲著甚麽一回事的。

最後聲明，這只是一個說明，不是甚麽辯論，願與汪先生付之一笑。

「此生或彼生」

白道

『此生或彼生』。

現在寫出這樣五個字來，問問讀者：是什麼意思？

倘使在『申報』上，見過汪懋祖先生的文章，『……例如說「這一個學生或是那一個學生」，文言文只須「此生或彼生」即已明瞭，其省力爲何如？……』的，那就也許能夠想到，這就是『這一個學生或是那一個學生』的意思。否則，那回答恐怕就要遲疑。因爲這五個字 至少還可以有兩種解釋：（一）這一個秀才或是那一個秀才（生員）；（二）這一世或是未來的別一世。

文言比起白話來，有時的確字數少，然而那意義也比較的含糊。我們看文言文，往往不但不能增益我們的智識，並且須使我們已有的智識，給牠注解補足。待到

翻成精密的白話之後，這才算是懂得了。如果一徑就用白話，即使多寫了幾個字，但對於讀者，『其省力為何如』？

我就用主張文言的汪懋祖先生所舉的文言的例子，證明了文言的不中用了。

「敢問如何表出？」

梁韻松

六月廿一日在申報教育新聞專載裏，讀到汪懋祖先生一篇文章，題目叫「中小學文言運動」，裏面有一段話是這樣的：

「近稍翻閱初中國文教本，其在一二年級尤為複雜，有翻譯之文，有冗長佶屈之作；而水滸景陽崗一節，幾無不選入。此文描寫武松打虎，栩栩如生。以文藝論，固自可喜，但其中有一句：『我卻怕甚麼鳥？』教師講至此語，敢問如何表出？不佞自歎頭腦陳舊，則退一步言，就令有女生在前，亦可無所避忌……」

文言運動家所做的這一段文言文，除了「以文藝論」四字頗覺費解之外，其餘大概還容易看懂。牠把為甚麼要提倡文言文的真道理講出來了。

如果汪懋祖先生在廣東，他這樣顧慮可以減輕許多，因為廣東的中等學校是跟私塾一樣，男女分班講授的。不過我也明白汪懋祖先生底雅意，他是說即使無女生在前，這話也是不宜表出的。這一層極是。

汪懋祖先生雖然非常客氣，自謙說頭腦陳舊，其實就是陳舊一點，敢問有甚麼要緊，在這世界裏，難道新一點就佔便宜麼？比方我雖不敢稱舊，但對這樣一個「聱牙之文」，也自歎無法表出。

假使無法表出，按下不表何如？記得兒時問大人，「嬰兒從甚麼地方鑽出來」的時候，所得的答案往往一巴掌，或毫不負責的扯謊，不足為奇。不過怕的是中等學生常愛鬧風潮，教師對學生既沒有施用體罰私刑的特權，把鳥字解作飛禽又不大對勁。

所有的國文教本幾乎都有景陽崗這一節，那除了埋怨教科書編輯者白費精神時間紙張油墨之外，難道就束手無策？人不能束手無策的。

我提議男孩子一出世，就把生殖器割掉；女孩子一出世，就把子宮挖去。等到將來長大，真說「我却怕甚麼鳥？」能在教室裏洽洽意意地公然表出，就讓他們讀淫書，三角小說，看裸體照片也不在乎。讓沒有機會受教育的野孩子們讀看水滸而自行墮落好了。

關於文言文

徐懋庸

我的一個朋友，在上海一個女校當教員，敎的是高中三年級的國文，有一晚，他拿了一疊學生的作文簿來，說是因爲太忙，要我幫他改一下。

高中三年級的女生，在上海，至少已是十七八歲的摩登女郎，有的定該是寫情

書的聖手了。我懷着一種近於好奇的心情，很高興地接過三十多本簿子，想看看這些卷子的主人們的手筆。在揭開封面以前，我幻想着，裏面有的是和她們的身段一般玲瓏的思想，和她們的裝束一般豔麗的詞藻：摩登女郎的文章一定是富於清新的現代味的。

然而，眞所謂「不看猶可」，看完了三十幾本簿子之後，我是感到異常的「幻滅」了。

三十多個高中三年級的女生的文章沒有一篇的造句是通達的，沒有一篇的立意是妥當的。字數呢，最長的還不滿五百，雖然是這樣短的文章，改起來却異常費力，有幾篇簡直只配完全塗掉。

這是怎麽一回事呢？我馬上就明白了，原來是教學文言文的結果。我翻徧三十本簿子，裏面的每篇都是用不通的文言寫的。

我不禁要替這三十多個摩登女郎呼冤。然而我又知道現在在學校中同樣地受着

文言文的毒害的學生，决不止這三十多個。文言文這僵屍，已「重來」到許多學校，大肆活動了。和這同時，有許多在雜誌報章上撰文的作家，也有意或無意地傾向文言文，或全以文言文撰稿，或在白話文中夾雜許多文言的句子去。

以上這兩種事實，不是偶然發生的，研究起來，二者的原因其實是一個：在於社會的現狀。現在有一個反對文言文的運動正在開始了。但反對者的論證，若徒從文言白話本身的優劣上出發，那是必至成爲無濟於事的常談的。反對的第一步，必須指出目前事實的社會的原因。

在這裏，我不能將那原因詳細地指陳。因爲在上面談的是女學生，我就將女人的纏足來作個比喻。纏足的起源，大概可有兩說；一說是婦女成爲奴隸之後，男子卽用種種方法加以拘束；纏足卽拘束的手段之一。自從解放的口號喊出之後，中國女子確有許多留了天足，但因留了天足究竟太自由了，所以人們又給她們穿上高跟皮鞋，使她們走路時仍然一步一扭，和纏了足一樣。

第二說，則如Plehanov在藝術論中所云，是富裕　妖嬈們，因為無勞動之必要，不把時間看重，所以特地把自己的步行拘束起來，當做是媚惑的樣子，而和貧窮的因而從事勞動的女子們的走相故意表示相反。這是所謂「對立的根源」說。

這兩說都是合於事實的，但深究起來，原因也只是一個。就是某一時代的社會狀態使然。在那狀態中的社會的支配者，為限制被支配者的起見，不但加以拘束，且將那拘束的狀態故意認為高貴美麗而使人自願地去就範。

今日的學校之所以教學文言文，就是拘束學生的思想的自由活動。這是很容易奏效的。至於有些作家，則因身處富裕悠閑的階級，做的是吟風弄月的文章，他們的生活決定他們的作品的題材，他們的作品的題材，決定他們的作品的形式，所以他們愛寫文言文。然而也有一類，則自知思想淺腐，用白話直抒胸臆，易致[illegible]，所以故意用文言作文，使他的思想披上一件不甚顯明的外衣，免得十分惹眼。

為什麼許多學校要拘束學生的思想呢？為什麼吟風弄月的作家又被重視的呢？

為什麼有的作家會這樣怕事的呢？我以為這其間必有共通的社會的原因，但是我並不能詳細地明白地指出。誰能夠指出呢？指出了原因，使大衆認識，反對文言文的運動這纔不至落空。

看教育部所訂的課程標準 專重文言文是不許的。那些違反教育部的法令的學校，是要受處分的，這不待我來說。我只希望許多的作家，若非不得已，不要有意地再用文言撰稿，因為這是無意地替某種不良的傾向推波助瀾。

否則本來的青年的頭腦，都將成為冬烘，和有人推測高跟鞋流行的結果，將來全國女人的腳趾都和小腿成一直綫一樣。

文言的前途

稜•磨•

近來又有人因學生學文言結果陷於不通，向提倡文言者抗議了。我斷言：這抗

議是無效的！提倡者原來就不要文章，尤其是能表白自己的意思的文章，僅僅以注重文言文爲使人非讀古書不可的手段而已。

白話文如果僅僅走到胡適所提倡的地步爲止，一方面儘管寫白話文，一方面仍不忘那一束大而無當的最低國學書目，文言文也許不再起來。然而白話文起了胡適所意想不到的效力，白話文不僅改變了文章的形式，而且改變了文章內容，這內容不必與古書發生關係，於是那最低書目完全被拋擲到最低之外。

在五四時代反對白話文和在今日提倡文言文的人，是不相同的：前者決不容認白話，後者只要人能寫四書五經式的白話文，一定能夠容認。只因爲要寫白話的人寫四書五經式的文章，決不可能，於是仍只有提倡文言。他們也知道復興文言文並不可能，但他們以爲至少可以勉強人讀一點古書。

直接提倡讀經的時代的不能再來，可以使我們無須多抱悲觀，間接的辦法能收多少效果，實在是疑問。格格不相入的意見，就讀熟也不能佔有腦中的一角。誰也

不再願意爲了文章去銘經鑄史。

學生的文言文的不通，不僅是文言不好，更大的理由是他們無話可說。我看見過一些作文題目，都根本是就教能寫通的文言文的去寫，也勢必寫得不通的。而事實上我們也早已有了許多煌煌大文作例。

就是那些煌煌大文，事實上也再受不到像古代的高文典冊樣的重視，因之除煌煌大文外仍得借重白話文作其輔助。這一點，又證明直接使人由古文去求古道已不可能，終有一天間接提倡失敗 就要再加一個間接，把古書翻成白話。

所以，現在對白話文實在無須担憂。他們終有一天更聰明而利用白話文的，至於白話文被利用後是不是另有可担憂處呢？那也不見得有，白話的女兒經還不是和文言的女誡一樣地不能在現在維持其勢力。

兩種錯覺

曹聚仁

汪懋祖先生論「禁習文言與強令讀經，」覺得一般青年寫作程度低落，非讀文言做文言不可。汪先生雖說是教育家，於國文教學一道到底是外行：不獨行，簡直隔靴搔癢，一無是處。

一般關心教育的人，常有兩種錯覺：有的忘記了自己從前的寫作程度，以為現代青年的寫作程度格外低落。有的忘記了寫作文言的不通成分，以為一應不通成分都由習白話文而來。我姑且退一步，承認一般的寫作程度低落，白話文的不通成分比文言文更多，而汪先生應負的責任更加重起來。各地中等學校校長聘請國文教員，偏向於舊的大都聘請所謂「宿儒」，偏向於新的大都聘請所謂「作家」。以宿儒來講解現代國文教本，他能講些什麼，不但不能講解莫泊桑月夜那類名著，即赫胥

黎天演論，亦瞠目不知所解。可是說到古書，又知道得有限，經學但瀏朱註，史學惟知左傳：修辭學，文章學，更是門外漢。這類私塾冬烘坯子，會指示青年以語文的正確智識與寫作技術嗎？至於吹得肥皂泡般美麗的作家，只是聲名洋溢於中國而已，叫他担任國文教程，古的既不會講，今的又無從講：我所知道的有幾位作家教授，在講台上講點軼事，議論點時事，把時間消磨過就算了。這樣能把青年的語文程度提高嗎？國文教學，乃是教書匠的專業，並不是三部講章，八斗天才能應付裕如的。所以青年的語文上如有什麼缺點，卽是中等學校校長，誤聘國文教員之過，汪懋祖先生卽是不能逃其責之一的人。

至說青年的一般語文程度，那又非汪懋祖先生之所知。我且引古以喻今：方苞，姚鼐，桐城派之大師也，序跋銘誌文字，楚楚可觀；一涉及邦國大政，卽紕謬百出，其論邊防事務，簡直是大話柄。我最愛歸有光文，而其大幅文字，卽無足觀者。桐城諸文家，惟曾國藩大幅文字，洋灑可喜。可見議論文字，與閱歷經驗有關，

民非中年以後，不能有深切觀察。如以「國難期間青年應有之責任」　讀書不忘愛國，愛國不忘讀書」一類題目　考察學生語文程度，除門面話外無可說，當然難得差強人意。其實，以此類題目責令方苞姚鼐限時交卷，也不會有好文字寫出來。歐洲大陸的大學入學國文試題，大都是「朝霞」，「街頭」這類切實可寫的題目，決不注重空論。（我前天在某中學看見「禮義廉恥論」的國文試題，這個試題用「論」字即不通　應用「說」或用「義」字。以此試題，請汪先生試作一篇，我敢說汪先生未必能做出什麼好文章來）現代青年，見聞廣於舊時；其所學習諸科，皆養成組織能力，故語文程度，比從前文人的確高明得多。我曾經仔細研究過這個問題：古書讀得愈少，語文程度愈高；古書讀得愈多，語文程度愈低：請予不信，可以實地試驗。（至以別字多寡，字蹟優劣作語文標準，又當別論。）

還有一種錯誤青年的普遍觀念，就是一般教育家所謂「國英算並重」。語文程度的高下與常識多寡成正比；前人謂知人論時，歷史的知識不豐富，議論文即難健

全。蘇洵六國論，舊推名作，由今觀之，荒謬可笑；賈誼過秦，千古流傳；按其實際，亦多乖誤；此皆不知史事之過。切實地說罷，國英算並重，青年對於其他學程，愈無暇兼顧，則常識愈缺乏，因而語文愈不能進步；惟有讓他們多得一點常識，活用他們的思考力，語文水準方有提高的希望。

關於「文言文」底形成跟發展

耳耶

關於文言文　形成跟發展的問題，應當讓給對中國文學甚麼的特別有研究有興味的人來談；這裏只提供幾個原則上的意見。

第一，有人說「文言文」是周朝人底話；假如這話可靠，那也只是周朝的尊貴者羣底話底省文，不但那時的卑賤者羣底話沒有被寫進去，就是尊貴者羣底話，也未必就全部留下來。固然，也有歌謠甚麼的，是從民間採取來的；但是「民間」本

身，就是個曖昧的名詞，作算「民間」就是我所說的「卑賤者羣」，一經尊貴者羣底「採取」，寫出，一定就不很「民間」了。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思無邪』。爲甚麼「思無邪」呢？難道那時候的卑賤者羣，果眞那樣知書識禮，明白「先王之道」麽？恐怕無非是經過了「採取」而又粉飾之功吧。所以如果我們把孔子底「删詩」，理解爲删除那些由於採取者不小心，照那歌謠底原意或原話寫出，未能那樣「思無邪」的東西，大概不會有很大的毛病。

第二，爲甚麽獨有周朝的尊貴者羣底話底省文，形成了「文言文」，一直支配到現在：那是因爲周朝的文化思想，在歷史上佔着支配的地位的原故。原來中國底所謂文化思想，都是封建的文化思想。周朝是封建經濟底全盛時期，農業生產，達到了很高的程度，所以禮制文物大備——文化思想特別發達。以後的封建經濟，雖說有長期的穩定，也不是沒有種種發展，但多是細微末節的部份，很少本質的東西：同時，工商業底抬頭，雖沒有致封建經濟底死命，却也不斷地給它以打擊，從前

的那種盛世已經不可再見了。因此文化思想，也就不見有超過周朝所有的進步。歷代的文化思想，既都在周朝的文化思想底支配影響之下，崇拜周朝的文化思想是必然的。崇拜周朝的文化思想，附帶地就崇拜了周朝的表現文化思想的工具——文言文叫做「載道」的「文」。

第三，文言文本身有很多的進步。同是周朝的文章，戰國時候的文章，就比春秋時候的文章暢達得多。這裏用不着多找例子，只用把孟子底書，莊子底書跟老子底書比一比就可明白。到了漢朝，文章的範圍更大了，語彙更多了，表現力也更強了。本來可以有一個飛躍的發展；但是因爲那文章所「載」的「道」，並沒有前進一步，限死了文章不能有全新的面目。作文章的人，不過以周朝的尊貴者羣底話底省文爲基礎，加以改變，却沒有人想到用自己每天所說的話寫文章。他們把話跟文章底分家，看作當然的道理；甚至把那已經發展得相當複雜了的文章，簡了又簡，省了又省，硬要它接近周朝的少數人底話底省文。相傳蘇軾跟黃魯直比做古文，同

一題目，蘇比黃寫的多幾個字，蘇氣極重作，結果比黃底少兩個字。章炳麟告訴人做古文，是把平常的文章，盡量地減除虛字，減到一個也不能減了，就成了所謂「古文」。把自己寫的文章叫做古文，五四時代曾有錢玄同先生笑過他們不通。這「不通」，就在於他們要把文章合乎周朝的少數人底話底省文，或以那省文爲基礎發展到某階段了的文章。這樣一來，時代越往後，文章跟話就越離得遠了。

先使白話文成話

夏丏尊

五四以來的白話文，因為提倡者都是些本來慣寫文言文的人們，他們都是知識階級，所寫的文字，又都是有關於思想學術的，和大衆根本就未曾有過關係。名叫白話文，其實只是把原來的「之乎者也」換了「的了嗎呢」，硬裝入藍青官話的腔調的東西罷了。凡事先入為主，白話文創造不久，就造成了那麼的一個腔殼，到今日還停滯在這腔殼裏。當時提倡白話文的人們有一句標語叫「明白如話」。真的，只是「如話」而已，還不到「就是話」的程度。換句話說，白話文竟是「不成話」的勞什子。

白話文最大的缺點，就是語彙的貧乏。古文有古文的語彙，方言有方言的語彙，白話文既非古文，又不是方言，只是一種藍青官話。從來古文中所用的辭類，大半被刪去了，各地方言中特有的辭類也完全被淘汰了，結果，所留存的只是彼此通

用的若干辭類。於是寫小說時一不小心，農婦也喊「革命」，婢女也談「戀愛」了。編成戲曲的說白可以使台下人聽了莫名其妙。

舉一例說，現在白話文裏所用的「父親」「母親」二語，就很可笑。實際上我們大家都叫「爸爸」，叫「爺」，叫「爹」，叫「娘」，叫「媽」，或叫「姆媽」，決不叫「父親」「母親」的。可是白話文裏却要用「父親」「母親」的稱呼，甚至於連給六七歲小孩讀的初小教科書裏也用「父親」「母親」字樣。「爺娘妻子走相送」，唐人詩中已叫「爺娘」了，我們現在倒叫起「父親」「母親」來，這不是怪事嗎？

要改進白話文，要使白話文與大衆發生交涉，第一步先要使牠成話。

現在的白話文，簡直太不成話了，用詞應儘量採取大衆所使用的活語，在可能的範圍以內儘量吸收方言。凡是大衆使用着的活語，不論是方言或是新造語，都自有牠的特別情味，往往不能用別的近似語來代替。例如：「揩油」在上海一帶已成

爲大衆使用的活語，自有牠的特別的情味，我們如果嫌牠土俗，用「作弊」「抨擊」等話來張冠李戴，就隔膜了。方言只要有人使用，地方性就會減少。如「像煞有介事」一語，因使用的人多，已有普遍性了。此後的辭典裏，應一方面刪除古來的死語，一方面多搜列方言。

放棄現成的大衆使用着的活語不用，故意要用近似的語言來翻譯一次，再寫入文中去，這就是從來文言文的毛病。白話文對於這點雖經痛改，可惜還沒有改革得徹底，結果所表達的情意還不十分親切有味。我有一個朋友，未曾討老婆，別人給他做媒的時候，他總要問「那女子是否同鄉人？」他不願和外省的女子結婚。理由是：如果老婆不是同鄉人，家庭情話彼此都須用藍靑官話來對付，趣味是很少的。這話很妙。現在的白話文，作者與讀者間，等於一對方言不通的情侶，彼此用了藍靑官話來作喁喁的情話，多隔膜，多難耐啊！

從中學生寫作談到大衆話

尤墨君

這幾年，常在各中學擔任國文教科；去年同今年又曾評閱過浙江全省中學畢業會考國文試卷；我覺得我們當國文教師的對於中學生的寫作　實在再不能忽略了。說起中學生寫作，自然不外文言同白話二種。但無論其是文言或白話，大多數已變成非驢非馬的樣子，離開大衆很遠了。

有位同學寫給我一封信，現在把這信第一段的原文錄在下面，請大家看看這是不是大衆所需要的白話。

「我不知應該如何說好。所有我的那些爲著你的善意的同念而發的感激與依戀將是遠超過一年我所能用筆表達的，但是有一點我可以罰誓，藉著我的靈感和一切，我將永不會忘了你，你曾經不斷地對我作最仁慈最動人的精神上的慰藉，而且你又是那樣一個可崇敬的老師呀！」

從前白香山作詩，據說「老嫗能解」。如果這話是確實的，那末他的詩便是大衆語了。像上述的一段信，論其文字，不能不說它是通順而流利，然而嚴格說起來，這是寫字檯邊寫寫的白話，沙發上讀讀的白話，離開大衆真不知有多少遠！所以換句話說，這是弄弄筆頭的白話，或高跟皮鞋式的白話。

還有一種白話文，裏面嵌進了無數時式名詞，像什麼「進展」，「展望」，「探討」，下意識，「一切的一切」等，結果：因不善運用故，語句變成費解而不通，這可以把今年浙江中學畢業會考國文試卷中的一段文字作個例，題目是「我所最敬佩的友朋」。

「古云：「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甜如蜜。」斯可見古人之於交友也有如此深的探討 ，也許對于擇友這件事是頗値重視的。故然現在是什麼時代，不應該以十八世紀的套語來阻止這科學昌明的新宇宙間進展，而催謝了許多意志不決的中層階級。可是我們細憶一慮，就覺得古人的話，似乎不一定是絕對性的，也許有許多的見鑑是在我們之上，是適合於近時化，並不觸落社

會進化的和諧，而不愧爲世界偉大的孫總理，也能打破世界的一切昏迷，注一而不三折的心理。他是承認的，因此他特以恢復古有道德古有智識來醒覺人們。這都是先知先覺者可能，而一般皆以「陳舊老廢物」，老是將棄諸耳後。」

右列一段文字是一位初中畢業學生寫的，標點符號別字悉仍其舊。文中堆砌了許多時式名詞，像「探討」，「十八世紀」，「新宇宙」，「進展」，「中層階級」，「絕對性」，「近時化」，「社會進化」等等，弄得全段文字像天書一樣的難解難讀 而寫作亦失其效用。這種白話，可以說是囫圇吞棗式的白話，也可以說是食新不化的白話。食古不化，固不能接近大衆；那末食新不化，又怎能接近呢！

再談談中學生的文言文。據我所知，現在還有人把「弔古戰場文」，「阿房宮賦」等一類妙文，當做法寶，在中學生面前變把戲。結果，中學生的寫作：好一些的讀起來只覺叮叮噹噹，儼然「盛世元音」；壞的則如在叮叮噹噹之中，時聞幾聲亂鑼，怪難聽的。我可再舉一段文字如下，題目是「我所最敬佩的友朋」

自來英雄豪傑之士，痛祖國之沈淪，而卒能奠定金甌，建不世之名者，非恃有血氣之青年而誰？方其噴薄千丈，血誅激發之時，則雖刀鋸鼎鑊出之前，而其色不變；魍魎奇怪乘之後，而其心不恐。若項王之破釜沈舟，百戰百勝；豫讓之漆身吞炭，國士可風！前往奮發而莫之天閼者，此誠國家之棟樑，中流之砥柱，亦即我所最敬佩之朋友也。」細讀上述一段文字，雖其中有幾聲鏗鏘，像「噴薄千丈，血誅激發」及「天閼」等（也許我不知其中妙音），然讀起來，通體還是叮叮噹噹的。不過，我終不解，這於日常生活有什麼用！獵取功名吧，翰林，狀元，已只能在破牆門裏高掛的匾額上看得到了。

數千年載道的文言的流弊如此，十幾年提倡的白話的結果又如此。所以我們要想挽救「文運」，應趕快喚醒中學生快出「藝術之宮」，「翰墨之林」，而和大衆接近，這非提倡大衆語不可。不過這事體大，還得全 的中學國文教師起來共同努力才行。

（二三年七月於杭州師範）

歐化語體

語堂

白話文學提倡以來，文體上之大變有二，一則語體歐化，二則使用個人筆調。語體歐化，在辭彙上多用新名詞，在句法上多用子母句相繫而成之長句。此種句法，半係隨科學而來，謂之科學化亦無不可，因非如此結構縝密之句法，不足以曲達作者分辨入微之意。若曰『據說仁者人也』，『義者，似乎宜也』在古文中斷斷不許，然其精微表示思想，却係進一大步。又如曰『某派有潰滅，或腐化之傾向』，亦係歐化句法，古文中斷斷不能將原意如此這般表出。此種句法，開始於梁任公。章行嚴則恢復古文句法，而以西洋邏輯語調，斷成四字句，歸入新式古文，論理方面，較古文的確謹嚴得多，然少用雙音語，總是求雅之累，讀來頗似嚴幾道天演論，未能饜足讀慣西洋科學文者之望。白話文學改梁任公之之乎也者為的嗎呢了，是承梁之遺緒，而在解放句體方面發展，因而有所謂語體歐化發見。其弊在魯里魯蘇

。好的歐化語體未嘗不可讀，而普通譯筆之詰屈聱牙，却非歐化之罪，乃譯者原文不懂，中文不通之故而已。譯者不甚了了原意，故亦不敢推敲原意譯為中文合理的說法，致字字生吞活剝搬運過來，實不足言語體歐化。若有人譯 Her husband's Mother不曰『她的婆婆』，而曰『她男人的母親』，譯 He went from house to house tocollect taxes 不曰『挨戶徵收』而曰『由一屋子到別的屋子收稅』，譯 The butterfly flitted fromone flower to another 不曰『蝴蝶在花叢中翻飛』，而曰『由一朵花飛到別朵花』，實不足爲法，但與語體歐化无涉也。茲有人投稿指我賣花女中譯 Be kind to her 為『善待她』，認為錯誤，應作『對於她慈愛』，乃是英文不通，未知該語之義實爲善待。凡善待人善待狗，皆言 Be kind to 。此種人未悟此點，故將來作英文，『善待她』，亦必曰 treat her well，而不曰 Be kind to her 故萬世英文不通也。『對於她慈愛』看來似是『歐化』（因其決非中語）實卽只是原義未明，不得不如此生吞活剝耳。

衛白話

曹翼遠

夫語文之爭，由來已久，泥古保粹之士，毀語體文曾不遺餘力，而語體文終兀然存在於天地之間，寖成現代中國文化之柱石者，蓋自有其社會之背境，非一二人偏頗之好惡所能左右。謝相一語，挫成美於千載，在昔則然，今日豈復爲草偃風從盲心昧目之時代乎！近讀中央月報，見語文之爭辯，如周期之復始，汪典存先生以教育耆宿，首揭義旗；柳詒徵先生以國學名家，執殳前驅，許夢因先生亦負執教十餘年之經驗，揚鞭以從。或本諸經驗，稽於課本，慨於學生程度之低，遂謂教育破產，其罪胥由於白話，或以觀察所得，謂社會方需用文言，白話所成之士，類皆不通句讀，才難之嘆，實白話所結之惡果，於是必有一當然之結論，曰白話當亡文言當興也。嗚呼！危矣！夫危葉提風，猶禽易落，十餘年來爲泥古保粹之士羣起而攻之語體文，其終將因三先生之貶議而遂淹忽歟？然以鄙意觀之，殆猶未也。前已言之

語體文之所以存在，自有其社會之背境，非一二人偏頗之好惡，所能左右，抑此一二人抨擊語體文之論據，蓋又薄弱而不甚健全云。

於進陳吾說之前，先說明作者之立場，作者非教部執事，負有擁護部令之義務。亦非胡陳高弟，曾受語體文之厚賜。又非不知文言之美，溺於語體文之淺易。特於平心靜氣中欲求得語文之爭之曲直耳。即令茲假文言以爲辯護之事，亦足以證明作者之意矣。

吾人於作語文兩者之短長之前，當首明二義：一曰文字僅爲求知識之工具，而非知識之本身，文體之若何，與知識內容固無關也。二曰文字應爲社會性之工具，而非教育之專門技能，吾人所論者社會價值之語體文，非學校價值之語體文所可包括也。今汪柳許三先生之立論，初不循此二大原則，信手拈來，隨處挑剔，是以說理未嘗剴切，措詞但見意氣，其所訾議語體文之處，皆可不改變其文意即轉而成訾議文言之力作，此固無足奇也，今請循而闢之：

讀許，柳二氏文，均於各書局所出版小學國語教科書中，雜摘數十條，謂不宜以神怪，迷信，欺騙，詐僞，帝王，臣奴，禽言，獸語等等，戕賊兒童心靈，而指爲語體文不赦之罪。嗟乎！吾不知兩先生是否瞭解文字僅爲求知識之工具，而非知識內容之要義，而遽以是爲語體文之罪案也。許氏又謂紅樓水滸爲誨淫誨盜之作品，以證實語體文之等於洪水猛獸，吾人可進而反問之曰，若文言文而實以神怪，迷信，欺騙，詐僞，帝王，臣奴，禽言，獸語，誨淫，誨盜之內容，即可化腐朽爲神奇，變罪惡爲光明乎？必無此理也。是則國語教科書之未能盡善，在內容而不在文體，在編者之學術，而不在語體文之本身，彰彰明甚。古來不刊之作，不朽之義，決不以文體而遂影響其價值，吾人之重視老莊，孔孟，豈不重其道德思想而重其文采詞華耶？若是則文選所收之作，其價值超於子曰詩云之單調萬萬矣。是買櫝還珠之術也。夫求知識之工具爲一事，知識之內容又爲一事，語體文之爲工具利乎？文言文之爲工具利乎？後當論及，今誠非其罪，遽謂白話應亡，文言當興，是非吾人

之所解也。

尤可怪者，許夢因氏將目下學生不能提筆作書，亦列為語體文罪案之一，不知其論據之何在？夫此為教學方針整個之變遷，與語體文實風馬牛不相及，即令授文言文矣，而未嘗注重學生寫字一科，亦未必能免提筆如千鈞重之醜態也。且據作者所知，小學對於寫字一科，均甚注重。如此羅織，語體文之不為棘林夜哭之鬼者，蓋幾希矣。至於汪氏病小學教科書不應以嚶嘰等希用字苦兒童，恰恰又非語體文之罪，吾料汪先生決不贊同授兒童以三都兩京中怪僻離奇之字也。

總之：汪，柳，許三氏之文，謂為病教育專用之教科書本則可，謂為病現各書局各編者利用工具之才能學識淺薄則可，以之罪語體文則未允也。抑徒病教科書病書局，病編者，遂謂已盡問題之全義乎？彼負誘導之責者，於初中以上學生，儘可使習文言，命學八法，而現狀下中大學學生文理不能明白字跡不分鈎磔者仍滔滔皆是，又誰之過歟？

抑更有進者：文字既爲求得知識之工具，故應爲社會的，而非學校之秘笈。今試問以文字求知，以備致用，白話易乎？文言易乎？專攻古文三年，或粗能通句讀，然社會上人，豈盡能如學生之有如許時間以送於書本之中，而懸泥古保粹之士從容悠閒之誘導乎？是則以一年之功卽可暢然讀報寫信作文者，語體文尙矣，今姑置社會之廣利於不論，而僅求學校學生畢業後之能用於世，亦未見語體文之扼於用也。吾人不知所謂社會之所需用之用字作何解？若不以抱卷守經舞文弄墨，上之典籤秘府，下之備書朱門之用爲已足，則科學之知識，機械之技術，政治經濟之原理，非剖晰詳明不易領解，而此等最高思想知識書籍之譯著，已由嚴幾道式佶屈言詞，轉爲平易之文言，至晚近所出諸書，則文言已如祥麟威鳳，非不能也，解析表象之道有所窮耳。且卽事窮理因時研幾之作，如國內外大勢之分析，經濟情況之指示，爲世所必具之常識者，幾無不藉語體文以傳播，吾人將挾古茂典樸之壞寶以惘然於此等新知識之側乎？若希望學生用於社會之用，係僅指爲文牘員而言，則其敎育之

破產矣，尙何言哉！尙何言哉。

綜上所言：旨在說明語體文僅爲表現內容之工具，內容之不善，非工具之罪也。今退一步言：若以語體文所表現之內容與文言文所表現之內容並列以觀，亦足顯見汪，柳，許三氏之偏頗不公矣。夫章鴻氏有不才子，吳氏亦未嘗無不才子，且恐不才又有甚焉。學生作語體文不善，刻鵠不成當類鶩，作文言文不善，開首必「人生於世」，結局必「由此觀之」，強合瓦礫矢橛以成篇，則其畫虎不成又不類狗也，三氏既未曾領略清新流利之語體論述記事文及文學作品，又深諱文言文中之不才子，不自反省，但以揚人之短爲能事，可謂平乎？作者譾陋，竊以爲文言文如文法之控馭，與字句之排遣，一失其常，則滿紙柴棘橫斜，濁霧混濛，不復可忍。然文法之控馭與字句之排遣，殊不易易，若再以滿腹意氣之教師臨之，使任誘導之責，將見今之大中學生與昔之村塾蒙童，異途而同轍也。

夫以機械運輸，其較畜力運輸，負載爲廣，到達爲速，豈有疑義；然若偶因裝

載物之不健全，而謂其罪由於機械運輸，遂欲故步自封，廢其利器，寧非不通可笑之至，輕薄語體文，亦猶是也。

（附記）語，文之爭，在汪，柳二先生文，原係就中小學而立論；然文化之發展，學校之所重，即社會之所向，故此爭論由局部性之教育問題出發，推演至於有關整個社會文化之問題，殆爲必然之勢，許夢因先生在中央日報論文之標題即曰：文言復興之自然性與必然性，已可概見矣。

語體與民族復興運動

吳研因

近來有一部分人以爲在民族復興運動聲中，文言文應當抬頭，語體文應當壓倒，他的理由，大都認文言文是我國固有的文化；語體文則是新興而破壞固有文化的產物。文言文抬頭，語體文壓倒，便是發揚固有文化，以使民族復興的必然趨勢。

持這一個理論來反對語體文，要算反對語體文的許多理論中最有力的一個理論了；而且持這理論的人，他們的用心，也許有可原之處，因爲他們志在發揚固有文化以復興民族，這一種菩薩心腸，誰能說他們不是呢？

但是他們的用心雖然可原，他們這個理論却仍然不能存在。現在我們先把這個理論來研究一下：

第一，文字和文化是不是一樣東西？我們以爲文字和文化不能併爲一談。文化是國家民族的道德，智識，能力等種種實質，而文字只是傳述的一種工具。更淺顯地說，文化好比人物，而文字只是載人物的一種船或車子。我們決不能認船或車子就是人物，所以也決不能認文字就是文化，認文言文是我國固有的文化，這一個觀點，實在是「似是而非」的。

第二，語體文能不能破壞固有文化？我們可以肯定地說：固有文化的破壞，是時代潮流使然，決不是語體文的過失。世界潮流所至，人的觀念自然和以前不同了

；觀念既然不同，思想自然大變，所發表的言論以及小品文和文藝文，也自然會和固有的文化「格格不相入」。要是語體文不流行，這些人也一定會用文言文發表的。維新的潮流初起，康梁之徒的議論，被篤舊的人視爲洪水猛獸，而康梁之徒的文章，並不是語體，確實是文言，這便是一個明證。所以文化的破壞，原因在文化的本身，與語體文毫無關係，說語體文破壞固有文化，那是毫無理由的。

第三語體文能不能和固有文化發生關係？文言文因爲歷史長久的緣故，固然和固有的文化關係較深，但是語體文也未嘗不可和固有的文化發生關係，宋儒的理學，不能說不是我國的一種固有文化，但是宋儒的語錄，就是用近乎語體文的文體寫出的。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講演，闡發我國固有的文化尤多，但也是用語體文紀錄的，四書五經，要算我國固有文化的核心了，但是「詩經白話註」「白話四書」，……這所謂白話，也便是語體文。語體文的歷史雖短，但和固有文化也曾發生了許多的關係。

明白了以上三點，我們就應當知道語體文和文言同是一種工具，不應當想叫文言文抬頭，而把語體文壓倒。

但是我們又何必提倡學校用語體文而不主張用文言文呢？

我們可以聲明：我們並不要强令篤舊之士和一部分擅長古文辭的文學家……，個個捨棄文言而對語體文低頭。我們以爲語體文比較文言文容易學習，容易普及得多，不過主張小學全用語體文，初中參用語體文，社會通用語體文，把語體文做一種普通應用的最便利的工具罷了。

以文字是工具而論，我們相信文言文是特種工具；而語體文是普通工具。再淺顯地說：我們覺得文言文好比是古色古香用人力推挽的四輪，雙輪，或獨輪車；而語體文則是比較能行遠的馬車，騾車之類。

如果這一個理論不錯，那麼我們更相信要發揚固有的文化和復興民族，不但不應當提倡文言文，壓倒語體文，却反應當捨棄文言文而提倡語體文。

現在，我再把我們的理由，申說如下：

（一）從發揚固有的文化一方面說，固有的文化是否應當不加選擇的一概要牠發揚，這本來是一個極嚴重的問題。卽使說固有文化，確實應當無條件地發揚，但是我們也應當用更容易，更經濟的方法做去。換句話說：語體文既然比較文言文容易學習並且容易普及，我們便應當用語體文去傳述固有的文化，以使固有的文化爲全國多數人所認識並崇奉。這兒有一個比喻：我們把固有的文化，算是岸然道貌的孔夫子和足智多謀的諸葛先生，……我們如果認爲他們應當復活而給全國多數人所認識，並崇奉，我們便應當請他們周遊全國，和全國的多數人相接觸，要請孔老夫子和諸葛先生周遊全國，以與全國多數人接觸，究竟應當乘坐那一種車輛呢？他們是古代人，乘坐用人力推挽的古色古香的四輪，雙輪或獨輪車，似乎更加相稱；但是要他們爲現代民衆所瞻仰，倒不如乘坐馬車，騾車來得便利。語體文在中國文字未改良之前，自然不能算牠是汽車火車；但已是馬車騾車之類了。乘坐馬車騾車，不

是已比乘坐用人力推挽的四輪，雙輪或獨輪車，便利得多嗎？我們以爲篤舊的老（？）先生們，如果不忘固有文化而確要固有的文化發揚，最好的辦法，還是多做幾本類於詩經白話註等的書籍出來，以便大多數人由文字的了解而認識固有文化的眞面目；否則要發揚固有文化，而又不願用語體文，這正是要行遠而又只用以人力推挽的四輪，雙輪或獨輪車一樣，恐怕走來走去，也只能徘徊於百里之間，而不能力行千里的。固有的文化，本載在固有的文言文書籍中，要是能夠發揚的話，早就應當發揚了，何以幾千年來只有少數士大夫在紙片上咀嚼研習，時至今日，還要諸位老（？）先生力竭聲嘶地大嚷其發揚呢？因爲古文晦澀，和現代語相差太遠，所以所載的固有文化，也和現代人愈離愈遠，這是很顯明的事實。看了這樣的事實，還不翻然悔悟而想壓倒語體文，這眞是「一偏之見」了！

（二）從民族的一方面說：要復興民族，必先探尋民族衰敗的原因，中國民族衰敗的原因何在呢？據中山先生說：因爲一面失去了固有的道德，智識和能力，一

面又不能學習外國人的長處（見民族主義）。近來陳立夫先生等說得更明白：他們以爲中國民族所以消沉的緣故，由於貧，弱，愚，私，亂，無紀律，五個字在那裏祟（見陳論國產電影的出路一文）。其實從教育的立場觀察：中國民族衰敗的作原因，只是吃了一個「愚」字的虧；因爲愚，所以不能選擇固有的道德，智識，和能力，而加以保存；也不能學習外國人的長處，所以沒有方法救貧，救弱，也不知道私和亂的可恥，所以要復興民族，非打倒愚蠢不可，非普及並改善教育不可！要普及並改善教育，非改善中國的文字不可；要改善中國的文字，非先提倡語體文不可。中國號稱四萬萬人，竟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不識字不知書，愚得這樣的可憐，這不是吃文言文的虧嗎？世界歷史大家英國韋爾斯說，「中國文字構造繁重，應用艱難，形式固定，不能適應現代簡易，敏捷，準確，變通之用」。又說，「中國文字久用方熟，所以思想，議論的能力至今仍不能與西方標準相合；讀書人好修飾字句，不顧理想和實際，其社會上經濟上的發展，大受打擊。」議者說中國今日較列

與種種退步，中國言文複雜，就是一個總因」（見韋著世界史綱，按韋氏列舉中國文字構造的形體等爲例，他的發表此說，並非盲目的）。國聯教育考察團所著中國教育之改進一書論及中國的語言與文字，也曾說「除力求一種國語與文字的普及以外，教育當局還得進行一種重要工作，就是用新語法以表示由現代生活和現代科學所發生的新觀念，以使中國語言文字的內容，更加豐富」。又說：「教育部可與中央研究院和其他適當的機關，設法成立一委員會，討論中國通用的語言問題和中國文字的改良」……外國人對於中國人問題，固有許多很隔膜，但是學者和專家的言論，又往往「洞若觀火」。韋氏和國聯教育考察團的言論，實在是值得我們參考的。

以上都是理論，現在我們再舉幾個實例來說一說：

一，日本，我們不能不承認她是一個民族興盛的國家罷，她們本用漢文，但是近十多年來，因爲漢文艱深，她們中小學和一般社會已「通用」用「假名」拚成的日本語體文，而漢文也退處於「特用」的地位了。

二，土耳其，我們也不能不承認她是一個民族復興的國家罷○她們本用回文，但是近幾年來，因為回文繁複，她們已採用新羅馬字拼音，而且通行於社會和學校了。

三，意大利，德意志，我們更不能不承認她們是現代「復興民族」聲浪最高的國家罷。她們至今通用與現代口語一致的意文德文，而未嘗把希臘，拉丁文特別抬起頭來，希脫勒黨焚燬共產黨書籍很多，也沒有把罪過歸到現代德國文上面去，而想恢復古文。

四，英，美，我們也不能不承認她們是興盛的國家罷。她們因為通用和現代口語一致的文字的緣故，小販，車夫也幾乎沒有一個不會看報看書的，中學以上本多習希臘拉丁文的，現在也漸漸地減少了。

五，除各大國的實例之外，我們再看我們的歷史：秦 漢，可以算是民族興盛的時代罷。但是文字一方面，字形由籀而篆，由篆而隸，由隸而草，由草而正，文體由尚書而左國，由左國而史，漢……，秦皇，漢武並沒有使「古文」抬頭，把「

今文「壓倒」。

最後，我敢大膽地說：要民族復興，須實行中山先生的民族主義，一面抵抗帝國主義的侵略；一面用迎頭截擊的方法，去學習外國人的長處，以使中國現代化。本不應專在文字上做工夫，如要在文字上做工夫，則必須趕快提倡語體文，放棄文言文，以使大多數民衆得到一種比較容易學習、容易普及的通用工具，藉此知書達理，增進聰明，以爲民族復興之一助。否則自己習於文言文，還要大多數人也迷戀文言文，這不是要復興民族，實是要催促民族由衰敗而至于滅亡。契丹入寇，寇準固請宋眞宗親征，高瓊竭力贊成寇準的主張，馮拯在旁呵斥高瓊，高瓊罵道：「你因爲文章做得好，所以得了高位；現在敵兵犯境，敵馬縱橫，還咬文嚼字，責備別人！你何不做一首詩去嚇退敵兵呢」，「國是如此」請諸位文言文的「衞道之士」「深長思之」罷。

研因按：本人並不怕「文言復興」，文言即使眞正復興，也是靑天裏一時的雲

兩，「過一會就好的」。所以斤斤爭辯者，以汪典存先生最初「禁習文言文與强令讀經」一文，據傳者言是爲我而發的，所以我不得不加以解答罷了。因我的解答，引起了所謂「民族復興」的大題目，所以我又不得不作此文，此文倘眞能使篤舊之士「翻然改圖」，竟想利用白話文去鼓吹「封建思想」，那麽我又無形中做了「篤舊之士」的先驅，一定會鑽在夾縫裏被左右夾攻得無以自解了。但是世界是前進的，篤舊之士無法遏止已來的潮流；新進的先生們也不用焦急，還是靜靜罷，以後我也不願爲那問題而費去更多無謂的光陰了。

關於「白話文」底發生跟成長

耳耶

雖然尊貴者羣極力要把文章寫得「古」，但正像資產階級在封建社會成長了一樣，用話寫文章的事，或者說使文章接近於話的事，也慢慢在那古香古色的文章的圍氛氣之中，發生，成長起來了。起初，在寫文章的人，作興是偶然的，態度也不

一定好，但儘管這樣，那用話寫文章，甚至用一部份卑賤者羣底話寫文章的事終於有了。尊貴者羣，在某種場合，必需跟卑賤者羣發生契約關係之類的事，那契約又一定要卑賤者羣能懂，至少聽得懂。這場合，再好的「文言文」，「古文」也完全無用，尊貴者羣就不能不屈尊用話或像話的甚麼來特別爲卑賤者羣寫文章「條約」，一向是被當作滑稽文章的；就算是滑稽文章吧，我們也可以看出它底這種嚴肅性來。

這裏，應該加重補充一點：這種文章，起初一定是尊貴者羣寫的，卑賤者羣不能寫文章，而沒有工夫寫文章且不說；作算有這麼一兩個人寫，然而尊貴者羣中間，像孔子那樣的「大成至聖」多的是，他老先生「筆則筆，削則削」，並且又「刪」過詩書，那有文章經過聖人底一「削」一「刪」，放心吧，本來面目是不會保存下來的。只有尊貴者羣寫的，才有希望逃過那些檢查員（不，應當說是聖賢）底「刪」與「削」！

歷史是前進的。「法律賤商人，商人今富矣」。到了有很多的「商人今富矣」

的時候，一方面是工商業影響之下的大衆，會發生文化生活的要求；一方面是尊貴者羣不肯放鬆這雖然卑賤却是「富矣」的商人，要把他們拉到自己底陣營裏來。爲了麻醉大衆，爲了欺騙商人，尊貴者羣，可以特別寫出一種容易懂的文章，並且，隨着歷史的前進，話跟思想，越見複雜，文言文底缺點，漸漸暴露，「古文」就變成「惟不宜於說理耳」（好像是曾國藩底話）的東西了。豈僅「惟不宜於說理耳」而已哉，「理」以外的甚麽，也只剩下些空洞，曖昧的「詞藻」。一方面是實生活的體驗，一方面是那偶然寫出的「僮約」之類的文章的對比，「平話」，「語錄」甚麽的就產出了。這之後，用話寫文章，使文章接近話的事底影響漸漸擴大，不但尊貴者羣，就是卑賤者羣，也慢慢有人會寫文章，甚至進步的尊貴者羣裏的人，也用卑賤者羣底話跟意識來寫文章。

雖說這樣，尊貴者羣，還是看不起這些用話寫的文章的。甚至寫文章的人自己，也覺得不足齒於大雅之林。就說「語錄」罷，他們並不把它當作文章看待，「語

錄」這意思，是說只是「話底記錄」，記下來了預備寫成文章的。換句話說，就是文章底毛坯子，不算正式文章。

不過看不看得起是小事，使文章接近話的趨向終於在被人輕視之下、不斷地發展，而且有了很好的成果。這時候，那些「我欲正人心息邪說」的尊貴者羣又來了。他們把這些成果，不當作因為是用話寫出的原故，也不當作用話寫出的文章看，只當作從這篇那篇「古文」脫化出來的，只當作用話寫的「古文」看。至於那些結果中，如果有一點甚至是卑賤者羣底意識的東西，不用說，更歪曲得一塌糊塗。譬如「水滸」，是一部有名的小說，是好多年在苦難中奮鬪出來的成果，而它最可取的地方，就在是用話寫的。然而我們底金聖嘆老爺怎麼說呢？他說這是「才子書」，他硬把它放在左史莊騷一塊兒！並且，那書中有一點兒不像尊貴者羣底意識的地方——強盜不是天生的，不是壞人，官老爺們反是壞人，逼人做強盜——簡直使他忍不住。於是他竄改，他要「以丸泥封函谷」，他硬在那書中造出甚麼「微言大義

」，「春秋筆法」來。

尊貴者羣這樣就完了麼？不！他們曉得卑賤者羣喜歡看這種書。可是未必曉得甚麼「春秋筆法」，光指出一下是不夠的。於是他們又作「蕩寇志」，並且還利用卑賤者羣喜歡讀用話寫的文章這件事，寫了好多大五義，小五義，彭公案，施公案之類的「爲國家，秉忠心，食君祿報皇恩」的以綠林叛徒爲主角的所謂大衆小說。他們這種只問目的不擇手段的辦法，比林紓汪懋祖輩，要通權達變得多。

話又說回轉來：用話寫文章或使文章接近話，雖然成長，發榮；但是它不能取得支配的地位。因爲支配着社會的尊貴者羣，雖然有時通權達變，更多的時候，却是遵經守常的。他們根本沒有眞正用話寫文章的要求。用話寫文章，如果要取得支配地位，除非舊制度根本動搖，新興勢力，要來取而代之的時候——五四時代，曾有點像。

文言—白話—大衆語

陳子展

現在已經有人喊出「文言復興」的口號，同時也有人倡言「反對文言復興」，好像久已停止了的文言白話的論戰又要重演一番。

其實文言白話的論戰早已分過勝負了，並不是林琴南章行嚴諸先生的文言文做得不好，他們趕不上古人；只因中國社會已經走到某種程度變革的路上，基礎一動，舊文化全般動搖，文學革命只是其中一種。這種大勢所趨，自然還有許多回環曲折，可是站在沒落下去的某方面無論個人或他所屬的某一階層，雖然還能夠來幾次掙扎，最後的勝利却不會歸到他們的，儘管也得佩服他們的勇敢。

總而言之，文言白話的論戰早已過去了。目前我們雖然聽到「文言復興」的口號，並不感得怎樣的嚴重。至於個人爲了某種必要，做幾篇文言文，只要對於社會

上不生惡影響，不致毒害大衆，暫時似乎不妨容忍。

文言白話之爭旣已表過不提，現在我以爲要提出的是比白話更進一步，提倡大衆語文學。這理由並不怎樣高深繁重，就極淺薄極簡單的說，十多年來的白話又雖然比較文言的東西是要和大衆接近些兒，可是事實上告訴我們，這個顯然還不夠。目前的白話文學只是智識分子一個階層的東西，還不是普遍的大衆所需要的。再添上一句簡單的話說，只因這種白話還不是大衆的語言。

從前爲了要補救文言的許多缺陷，不能不提倡白話，現在爲了要糾正白話文學的許多缺點，不能不提倡大衆語。

這裏所謂大衆語，包括大衆說得出，聽得懂，看得明白的語言文字。標準的大衆語，似乎還得靠將來大衆語文學家的作品來規定，最要緊的還得先看一看目前大衆所受的教育程度是怎麼樣。並須想到將來大衆該受怎樣程度的教育。

這裏所謂大衆，固然不妨廣泛的說是國民的全體，可是主要的分子還是佔全民

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農民，以及手工業者，新式產業工人，小商人，店員，小販等等。就目前大衆的教育程度而論，可惜還沒有精密的調査統計可做根據，只能大概的這麼說，有的受過號稱新式的小學教育，有的只受過舊式的私塾教育，有的只受過年把幾個月的補習教育，識字教育。此外，受過新式中等以上學校教育的極少，不識字的倒最多。這樣說來，目前大衆說得出，聽得懂看得明白的語言文字是怎麼樣的一種程度就不難想像到了。

自然，我所說的大衆語文學，一方面要適合大衆用的語言文字，一方面還得提高大衆文化的水準。倘若語言文字上有歐化的必要不妨歐化，可是不要只爲了個人擺出留學生或懂得洋文的架子。有採用文言字彙的必要不妨採用，可是不要單爲了個人擺出國學家或懂得古文的架子。

據我個人的愚見，大衆語文學在詩歌小說戲曲三類，說聽看三樣都須顧到，尤其要注重聽，叫人聽得懂。因爲詩歌朗讀也好，唱奏也好，聽得懂就是深入大衆的

一個必要的條件。爲什麼白居易的詩在當時社會特別流行？爲什麼黎錦暉先生的歌曲如今特別流行？除了其他的條件以外，聽得懂，也怕是一個重要原因。至於戲曲上演，動作姿勢雖能幫助大衆了解劇情，重要的還在說白曲詞能夠叫大衆聽得懂，還有如今的小說雖然不必由說書的人說給大衆去聽，但是念起來能夠和說話差不多，也是深入大衆層的一個條件罷。

我因爲看到了徐懋庸曹聚仁兩先生關於文言文的論文，我就跳過白話，更進一步，在文學上主張大衆語，姑且這樣粗略的提出了，聽取大家的高明的意見。

關於大衆語文學的建設

陳望道

在中國文學史上，筆頭用語本來很複雜，簡單分起來，大約可以分成下面這樣一個表所列：

筆頭語
- 貴族語（文言）
- 市民語（白話）
  - 教士語（語錄體）
  - 大衆語（在宋代如「評話」上的用語）

五四前後「文學革命」時代關於筆頭語的論戰，便是市民語和貴族語的論戰。當時對文言爭市民權的筆頭語，是包括着教士語和大衆語兩種語。而且往往把兩種語平等的看待，留一個退入語錄語的可能。這是當時的短處。但當時所以把教士語和大衆語同等看待，不過是當時急於和文言對立的情勢逼他顯出了那樣看相，骨子裏到底並不是把語錄體做範本的。這比起以前的一切等等始終不脫把語錄體做中心的理論或者實際來，又不能不說是當時的長處，現在陳子展先生，提出大衆語來，可說是吸收當時的長處又拋棄了當時的短處。我想大家不會不贊成的。

不過關於大衆語的性質方面，恐怕還有商量研究的餘地。子展先生只提出說，聽，看三樣來做標準，我想是不夠的，寫也一定要顧到。寫的簡便化，這幾年來已

經有許多人研究，也是一種進步的現象，將來研究文學的人似乎也不能不注意研究。將來大衆語的語彙裏頭一定不免有外路語輸入，但必須用本國文字寫它的音，讓大家說得出。照過去的經驗看來，輸入些外路語或起用些古典語，在大衆也並不覺得十分不便，只要確實是當時大衆所必需的。如摩登，摩托，冰淇淋，手鎗，引渡之類。這類語彙實際時時在變換，變換起來實際也沒有變換語法那樣的煩難。不過總要不違背大衆說得出，聽得懂，寫得順手，看得明白的條件，才能說是大衆語。

大衆語的修練，只能靠平時，不能靠臨時。一切的規律一切的強制，在臨時經住心頭，都會妨害了筆頭的自由抒寫。在寫成的文字上顯出了不自然的痕跡。在小說詩歌戲曲之類描寫具體形象的文字上更其如此。所以這裏，便要發生了要建設大衆語文學，必須實際接近大衆，向大衆去學語言的問題。單單躲在書房裏頭不同大衆接近，或同大衆接近不去注意他們的語言，都難以成就大衆語文學作家。

大衆的語言確實是值得學習的。尤其是文法。它有好些地方都已經變得比文言更整齊，更巧妙，更自然。比如桐城派的人極費力地說過的，所謂實字虛用虛字實用，在文言中如「爾欲吳王我乎」「春風風人」，都不過用實字才硬用，文法上並沒有一定的方法可以討湊，所以讀起來也覺得很不自然，說起來更不必說，在大衆的口頭語上，却有一定說法。要把虛字實用，便可以加「頭」之類實字的接尾。如「想」字要實用，就可說「想頭」之類。要把實字虛用，也同樣地有方法。可以添加「了」「着」「起」「下」「去」「來」等等字。如「車」「袋」等字要虛用，便可以說「車了去」「袋了去」之類。這等語言的進步性質，固然極應該學。不過文學並非單有語言就行的。一切的文學都需要會得看現實，看現實又需要有一定的態度。態度的修養，實際又比語言的修養更重要。有些語言上的問題，也需要從態度上去選擇去決定。

從文白鬥爭到死活鬬爭

葉嗣炳

假如你肯用辯證法的頭腦寫出一部中國文學史，許多文獻會告訴你：

「筆頭用語的死活鬥爭二千多年來沒有間斷過，社會大衆日常生活所必需的文，都用活人嘴頭常說的話做基礎，整千萬自動地化錢買來看的書，也是越接近活話越受歡迎：活人裝鬼叫，決討不了巧，用半死半活的文言作成文印成集，跟實際社會絲毫不發生關係。」

古人試舉李白作例，他的詩，在一般社會可以抵鈔票用：文，就不值錢了。今人試舉最近文言運動的發難人汪懋祖作例，他用文言作過兩篇擁護文言的文章，然而他的大文，如果請聖陶拿它送進文學病院，解剖一下，不知道該笑痛多少人的肚子。

文言運動的再起，雖說祇是部分的某種復古意識的表露，可是過去對社會負責的文人也有相當的過錯。「五四」時期提倡白話文的所謂「白話」，「白」是「道白」的「白」，話是活話的「話」，同廣東話的「白話」相彷　是土話的意思。五四運動之後，有人把它歪曲作「明白如話」解說，胡適的「白話文學史」，拿歷史上半死半活的文言都塞了進去，活話和鬼話的界限也就跟着模糊起來。祇要把「焉者乎也」改成「了的嗎呀」，滿嘴鬼話也算白話。進一步，所謂五四產兒，××等以及所謂國話專家××××等，都公然作起古文來，繫鈴人自動的解鈴了，自鄶以下怎樣怪得了呢！

話和文，同是人們社會意識的標誌，社會意識不停地變動，話當然也連帶變動。文跟話發生差異，那文就不能正確地表現當時的社會意識；因此，充滿封建意識的古文固然沒有復活的可能；同樣，明白如話的白話文文言文和語錄體之類　也該掃除乾淨。

我們應當糾正文白鬥爭的過錯，積極地發動死活鬥爭，除了繼續禁阻文言的死灰復燃，為大衆利益起見，對於活話寫成的活文時候所有的問題，也該有相當的決定和努力：

一，確認話文同源，話和文不可分離，話跟着社會意識的發展向前發展，文也該跟着話隨時變動；同例，最近陳子展先生所說「大衆語文學在詩歌小說戲曲三類說聽看三樣都須顧到」的話，就不很妥當，為尊重大衆利益起見，應當更正成「一切文字都該話文合一」。

二，確認普遍性最大的北平話作現代活話的基準，大衆語的主要成分。

三，承認「文」可以合理地自動地吸收做新成分，補足話的缺點。

四，為減輕大衆寫文的困難：(甲)把話寫下來就算文。(乙)提倡簡字，寬容別字。

怎樣建設大衆語文學

申報讀書問答

因爲日來本報自由談上接連發表了幾篇陳望道陳子展諸先生的關於「建設大衆語文學」的論文，於是引起許多讀者向我們提出疑問。他們問：大衆語與白話的分別究在那裏？這樣的把問題提出，是不是重翻「五四」的舊賬？大衆語文學究竟應該怎樣來建設？關於這些問題，陳先生等雖有論及，但有的不詳，有的僅僅觸到問題的邊際，爰綴述我們的意見，作爲關心這問題的讀者們的參考。

我們必須首先承認陳先生等提出的大衆語問題，在文學運動的現階段，是非常正確和切要的。文學的「大衆化」，在目前，已成爲文學創作者和讀者大衆們一致的要求。要表現大衆生活，只有用大衆自己的語言方得達到成功，也可以說，在大衆的實生活中，已孕育着大衆語言的成長，只待我們採用。這不僅不是重複「五四

」的舊賬，而是把語言運動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加強了自身的任務。「白話」，誠如陳子展先生所說：只是知識份子一個階層的東西，它一方面是把僚士大夫的教士語做範本（借望道先生語）。另一方面却無條件的引用外來的買辦語（我們以爲「五四」時代所成就的白話，是官僚買辦語，是非常恰當的），而完全與大衆的生話，語言相隔離。我們常常在現在出版物中看到許多比古文更難懂的文句，便是由於這樣的原因。一等到社會進到一定階段時，它便反而成了語言運動的障礙，意識地阻止了大衆語言的發展，而顯現出一種非驢非馬的窮相。所以，目前的大衆語運動，是反古文的，同時是反官僚買辦的白話的。

因爲這樣，我們對於這問題，決不應該採取消極的態度，應該積極地從所負重任務的奮鬥中獲取它的勝利。陳子展先生「聽到古文復興的口號並不感到重要」的「容忍」態度，我們認爲不很好。「古文復興」決不是幾個遺老企圖死灰復燃，而是與尊孔，提倡讀經配合起來的。「大勢所趨」，誠然「最後的勝利不會歸到他們」

，但僅是那些「迴環曲折」，也足以使歷史的發展遲延若干年，何況「我們不置死敵人，敵人終於要置死我們」，這種教訓，歷史上隨處可以找出例證。我們必然地要具有戰鬥的精神來處理這問題，我們精確地對於「古文復興」來一次新的估量，然後給予致命的打擊。其次陳子展先生僅僅認大衆語比白話進一步，「提倡大衆語」是「爲了要糾正白話文學許多缺點」，這樣的認識，同樣是不够的。他沒有看出白話是大衆語作戰的對象，大衆語之與白話之與古文同樣是對立的東西。我們如忽視了這一任務，我們便要走上「五四」的覆轍，便不能完成這一大衆語運動的任務，我們要反對古文，我們更要反對似是而非的洋八股。

那末，大衆語是什麽呢？大衆語是大衆表達自己生活，從大衆自己生活中成長起來的語言，大衆語文學就是陳望道先生所說：「大衆說得出，聽得懂，寫得順手，看得明白」的文學：大衆語是有普遍性的，是時時發展着的，它與各地土語不同。(已前有人主張用土語寫文學作品，這是錯誤的，雖然我們不妨採用土語)土語是

封建社會的產物，大衆語應該是完全反封建買辦的語言，雖然在現在，還顯現不出它的全面，但隨着大衆生活的進展，各地方大衆間的生活語言的隔膜，逐漸打破，而適合大衆生活的新的字彙，日益增加，大衆語終於要達到完成。這從語言與文字發展的本身上，固可以尋出它發展的途徑，（這一點望道先生已經說得非常明白了）。即從社會學的見地來考察，也不難發現它的根源。

我們既認定大衆語的現階段，我們便不容忽視，不僅是要接近大衆，要從大衆中學得習用的語言，我們更要體驗大衆的生活，了解大衆生活的實際情形，懂得大衆生活是在怎樣的發展。大衆能夠聽得懂看得明白「摩登」·「摩托」，「冰淇淋」這些字彙，是因爲大衆生活已進行到和這些字彙接觸的時候，二十年前對鄉下人談革命，他們最多只知道是等於「長毛造反」，但現在却連三歲小孩子也差不多了解這字的意義了。離開大衆生活，則你無由去「輸入大衆所懂的外路語」，或起用古語。這二點是陳望道先生所已觸到而未深入地說明的。

總之　大衆語問題的提出，是非常有意義的，但如果我們不把大衆生活作爲充實這一問題的內容，卽是不使這運動與大衆生活的進展相配合，這運動便依然要陷於空洞無物，旣不能克服敵人，更不能得到解決。

本文因篇幅限制，對於這問題只能概括地論及，有未觸到處，只有待到下次有機會時再提出來討論。

再論建設大衆語文學

申報讀書問答

自我們發表一篇「怎樣建設大衆語文學以後，有許多讀者向我們提出意見，比如，大衆語爲什麽是反古文，同時又是反白話的呢？大衆語的標準語是什麽呢？我們認爲，這些問題，實有從新提出來談談之必要。

我們曾說，「目前的大衆語運動，是反古文的，同時，是反官僚買辦的白話的

」，因爲，「大衆語之與白話，之與古文同樣是對立的東西」。這意見，在原則上，雖然沒有什麼錯誤，但說來未免有點含糊，沒有精密地劃出其間的差別，正確地指出白話與大衆語的對立和統一，以致引起讀者們的誤解，而以爲反對白話等于反對古文。

我們的意思並不是這樣！

語言文字的發展，和社會發展一樣，是有其一定的程序的。我們如果要明白大衆語與白話如何對立，及如何統一，只有從語言發展的過程中去理解。我們說，大衆語是反白話的，這是因爲白話運動並沒有完成它自身的任務，達到「言文一致」的成功，反之，它已走上投降「文言」的危機，成爲語言文字發展的障礙，試看，現在流行的白話文！不是藍青官話，便是變相的八股，（所謂語錄體）與大衆有非常大的距離。那些冷嘲熱罵青年作家把「丟那媽」「媽媽的」寫進文學作品內的作家們，與汪懋祖之提倡古文，在反大衆語這一點上，是並無不同之處的。

但是，這樣說，決不是認爲：反白話等於反古文，反白話也和反古文一樣，有否認全部白話的意思。不是的，我們反對白話，是爲了進一步反對古文，爲了進一步保證獲取「言文一致」的勝利。在「五四」時代，大衆語運動是包含在白話文運動之中的。我們反對白話，並不否認白話在整個語文運動中所成就的那一部份：它宣佈了「文言」的死刑，指出了今後「話文一致」的必然性。所以，在建設大衆語的現階段，我們反對白話之離開大衆，我們却不能不批判地接受白話中那接近大衆語的一切。白話畢竟和古文不同，白話畢竟是與大衆語距離較近的東西。

那末，白話中有那些是我們應該接受的呢？大衆語的標準語是什麽呢？這問題，是不能機械地回答的。

語言，不是靜態的，而是隨着社會生活的進展，時刻變動着的。五四時代白話文的產生，同時也就是大衆語文的出發點。在這一歷程上，在白話與大衆語對立的

發展中，大衆語愈漸成長，則豪紳買辦的白話愈顯出衰弱，愈暴露出它的反動性，如果我們否認白話文中大衆語的存在及發展，我們便無異否認整個語言運動，甚至文化運動的意義。不說別的，我們試拿五四前後的白話文，與現在一般白話文相比，拿遺少們的白話文來和大衆文學作家作品來比，就可知道何者更接近於大衆。這裏所謂接近大衆，不僅指語言，且指內容，這裏的大衆不指保守的大衆，而是前進的大衆。這種語言文字的發展，是漸進的而不是突進的，（五四白話文運動可說是突進的）所以我們並不容易看出它的發展的形式，指出那篇眞能作爲大衆語文學的標準作品。

以此來回答什麼是大衆語的標準語的問題，是可以得出同樣正確的結論的。有些人認大衆語標準語應該是流行的普通話，又有些人認爲應該是輪船火車上流行的江湖語。他們均視語言爲靜止的東西，視語言發展與大衆實生活的各面無關。他們只看到了這些構成大衆語的要素，誤將某一要素作爲全體。我們現在建設大衆語文

學，我們固可預設一種標準語，但這種標準語，並不能認為即是未來的大衆語。只能當作這運動的依據。大衆語是在大衆實生活中長成的。夏丏尊先生謂農婦也喊「革命」，不是大衆語，但在北伐時的江西兩湖及廣東一部份的農婦，却真能談革命，却又不能不說是大衆語了。在目前，語言與文字，其自身還留有很大的差異，看得懂的不見得聽得懂，聽得懂的，不見得看得懂。我們採用某種語言作為這運動的標準語是可以的，這須語言學家和社會學家的努力。然而，顯然的這並不是主要點，現階段建設大衆語文的主要任務，我們以為是：

一改進形義字使逐漸變為拚音字，打破語文間的根本差異。

二提高大衆生活，──文化，增進大衆語辭彙，使大衆語言，與一般文化發展適於一致的步調。

關於這兩點的詳細解釋，容後再及。

──申報讀書問答──

內容與形式

司•馬•疵•

文言文——白話文——大衆語——方言土話——羅馬字

這次關於從反對復古運動而引起的反對「文言文」的論戰，大家都承認這是和五四時代完全不同的。五四時代封建方面，對於「文言文」是頑固的保守；而反對者方面則是一種破壞舊的建設新的——白話文。現在這一個階段所不同的，「文言文」不過是早已經被制死了的殭尸，亡國的封建爲要掙扎牠最後崩潰的命運，又想把牠復活起來去麻醉大衆，很顯然地是有着牠的背景和作用；而反對者方面則大多認爲那東西並不值得一駁，主要應該反對的是它的作用——即是反對這種復古運動，要眞正能夠徹底完成這種任務。大家要認清的就是現在不是五四時代的性質，唯一的的方法只有建設「大衆話」，並且還要糾正五四式的「白話文」之不徹的

地方。

關於這個為了守護「白話文」反對復古運動反對「文言文」，同時提出建設「大衆話」的這個問題，還有一個和五四時代所不同的特點，就是：大家所注意到的已經不是單純的形式方面「文言文」和「白話文」「大衆話」的戰鬪，而且已經看清了光明的將來，看見了主要的前進的大衆，實際地注意到戰鬪的內容。這為大衆所迫切要求的問題，已經有着廣大開展的趨勢。這種趨勢，就是共同站在反對亡國的復古運動出發，從「白話文」發展到「大衆話」，——「代表大衆意識的語言」（胡愈之）。這就是牠的真實的內容。

不過，在這個論爭中，對於「大衆話」應該要怎樣的建設，還沒有確定地得着豐富的答案的時候，所以有些問題不免發生一種不完全切合實際的缺點，比如申報的「讀書問答」輕率地把「白話文」和「大衆話」對立起來，胡愈之先生和傅東華先生認為「大衆話」在「目前要話文合一是辦不到的」，而傅東華先生則更認為「

只好把大衆話的範圍縮小起來」。至於魏猛克先生和佛郎先生甚至對「方言土話」懷疑起來。這問題的嚴重，是迫待討論的，現在我就想大膽地來簡單的嘗試一下。

1 為甚麼我們要反對「文言文」？主要的就是因為牠是封建的產物，是縛束而且麻痺大衆思想的東西。牠的形式，始終為封建的內容所決定，成為封建特有的東西。牠是為大衆所不懂，尤其是現代的大衆所不懂的。牠在五四時代早已經被痛快淋漓的批判過而且死了好久了。在現在這樣亡國殺身的大禍臨頭的時候，牠要復古，要復活「文言文」，要麻痺大衆救國的情緒，所以我們只有澈底的攻擊，揭破牠的欺騙，掃除牠這毒物。這些工作，根本就是為了大衆，為了自己。如果有條件地用「文言文」這形式還可以為一部份被壓迫的大衆所了解的話，恕我說句要不得的話，為了喚醒這一部份人，也未嘗不可把牠利用一下。可是不行，大衆並不懂。難道我們把「倭寇將悉亡我國矣」或者「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些話去向着封建的老爺少爺們「對牛彈琴」麼？何況這些句子壓根兒就包含着十足的封建性。所以我們不

但要反對牠這亡國的復古的內容，同時也要澈底地反對這種麻痺大衆的形式——「文言」

2　至於「白話文」應該要怎樣的批判和糾正的問題，是應該和當前大衆的要求的內容不能分開的。像申報「談言」上家爲先生那樣乾脆地提出反對，我們是要反對的，至於申報「讀書問答」上那樣機械地把「文言」和「大衆語」對立，雖然牠後來又修正過說是「對立的統一」我們還是要提出批判，在「不要上當」那一篇文章裏我已經舉出了些關於「白話文」的實際例子，爲甚麽封建都可以利用，我們自己却要拋棄或者對立？這不是向敵人繳械麽，何況在五四時代提出的內容是民主主義和科學，「白話文」的發展就是在這樣的氛圍中造成出來的。雖然當時並沒有完成牠的任務就妥協了，但是「白話文」本身多少還有點是現代的。雖然牠這種形式歐化氣太重，而且還夾雜一些「文言」，以致脫離了大部份的大衆，可是還有一部份大衆比如學生，小市民，還能懂，還在牠的影響下。並且牠這種形式還比較的精

密，在文法上還比較科學的，並不如「讀書問答」上所說「大衆語愈漸成長，則豪紳買辦的白話愈顯出衰弱，愈暴露出它的反動性」。我們要知道牠的反動性是在牠的內容，而不在牠的形式。何况「大衆語」是依據當前的大衆的要求，從「白話文」這個基礎發展出來的。所以「大衆語」決不能，而且也不應該機械地和「白話文」對立。只在看我們用甚麼內容來用這種形式。還有甚麼比束着手等帝國主義的刺刀和皮鞭打到我們的身上更痛苦更切身而且更迫切麼？只要可以把這種亡國殺身的大禍告訴大衆，可以喚醒大衆起來救國自救的，無論甚麼形式都可以用，所以「白話文」我們絕對不能攻擊或放棄，牠的難懂或不够的地方，我們只有竭力批判地去糾正，應用。

3　說到「大衆語」，這是大家熱烈地提出，而是大衆所迫切地要求的問題。從前在「文學月報」上宋陽先生和止敬先生曾經提起熱烈的討論，這次魏猛克先生又重新把牠引出來作爲參攷，而且把這問題引到注意的中心點，我認爲是很對的。

這問題還在討論，當然我們還不能肯定的說甚麼才是「大衆語」，甚麼不是「大衆語」。大衆既是當前主要的大衆，那麼宋陽先生和止敬先生所指出的範圍——現代的工廠，輪船，火車，碼頭，車站，客棧，飯舖，遊藝場等等，想來大家都會覺得這是可以作爲討論這問題的根據的。當然在中國這樣經濟的破產，文化的落後，地域的限制，使各地方各種生活不能順利的交通，大多數的地方還依然保持各的「土話方言」。不過除廣東福建，浙江這些地方有着極特殊的「土話方言」以外，凡是交通便利，工廠商業比較多的地方，在某種程度上，大衆的語言是止在銷磨自己的難懂處，接受別人的比較普通的字眼，大衆的語言，確是正在變化，形成，發展着的。這問題要達到具體，實際，就只靠我們自己在大衆中的實踐。像申報「談言」上垢佛先生動不動就叫人拿貨色來看，這都不過是恐駭人的話。記得好像從前是梁實秋先生吧，（恕我記不清楚了）好像對「大衆文學」也說過這樣的話，「拿貨色來看吧」。當時當然還沒有甚麼，現在可已經大量出現了，而且據說還出了眞正工農作

家，而棨先生（？）也不再響了。從大衆文學發展的鐵的事實證明，我們可以預測到「大衆語」這貨色，不久一定會眞正的出現。不但是「不久」而且已經正在出現，不過還在學習而且在實驗的期間，暫時的話文不能一致是在所不免的。不過我對於胡愈之先生和傅東華先生的意見稍稍有一點不同。自然在目前話文合一還沒有辦到，可是我們如果「要」去辦到，五四時代那時所提出的「白話文」，不是當時已經辦到了麼？我以爲問題不是在目前辦得到或辦不到，而是看大家眞正地去怎麼辦。當然胡先生和傅先生是知道將來一定會辦到 一定會實現的，可是這種用語，我覺得會使人引起「等待」的心理，胡先生和傅先生以爲這話對麼？問題要提出，我們只有堅決地提出，實行起來才快而且有力。我相信這樣的做，決不致「把大衆語的範圍縮小起來」，而且只有更加擴大，更加豐富。況且在目前救國自救的問題上，要告訴大衆，同時要知道大衆的意見，決不能因爲難而把範圍縮小，只有去擴大，只有趕快去到大衆中想辦法弄到「文言合一」的地步。

4　這裏就要談到「方言土話」的問題了，關於這一問題，從前宋陽先生也具體說過，從前並沒有甚麼人反對，而且已經有人實行試驗，得到相當的效果。我在「不要上當」裏所舉的一些實例，封建不是已經在大衆地運用麼？現在魏猛克先生（見魏著普通話與大衆）和佛郎先生提出懷疑的意見，我覺得有在這裏加重地提出討論的必要的。問題還是前面說到過的，爲了當前大衆的需要，我們決不能把牠看成「原始的，沒有進步性的」，而把牠拋棄。主要的，還是在我們所提出的內容的問題。自然「方言土話」在表現現代的某種意思的時候，難免會感着許多缺點。可是亡國的大禍迫切，要大家起來救，難道等牠發展到「大衆語」的時候，才和他們講麼？可是到那時候，帝國主義的刀子已經架在頸項上了，或者是如東四省一樣強迫着叫學日本話或者英國話那就會只能說得幾句「天皇聖明」，懂不得別的甚麼了！爲了目前救急的辦法，也只有在各地方用各地方的「方言土語」。我們不能因爲像張天翼先生用「奶奶雄」使一些地方的人不懂而怪「方言土語」的不行，況且「

奶奶雄」也是表現大衆的意思和情緒的一個詞頭，用得得法不見得就不懂，這又屬於表現的問題了。即使別的地方人不懂，但是有「奶奶雄」這話的那地方的人一定懂。總之主要是爲那地方的人寫的。即使那地方的人覺得「奶奶雄」並不完全表現出要表現的意思或者不妥當，又未嘗不可用別一個「方言土語」的詞頭來代替，我以爲魏先生和佛郎先生是太看重一般「文化的」的問題了。文化應該是和前進的大衆的要求一致的。當前嚴重的形勢要求着文化應該和大衆聯繫在一起，不然的話，「文化」跑得太遠，大衆連飛跑都趕不上，那就會弄得他們連喘氣的工夫都沒有了。所以「方言土語」這形式在目前是特別需要的。記得去在廣州曾出過幾個完全廣州土語的刊物，有一個叫着「大家新聞」，還有兩三個的刊名現在記不起來了。並且還出廣州土語的叢書。我看見過一本叫着「單眼虎出世」的。我不過僅僅懂得幾句並不完全的廣州話的。開頭看自然很吃力，可是多看幾下看慣了，有些地方就容易懂，因此我還被這本書增加了幾句廣州話。至於有幾個廣州朋友一看居然並

不吃力地看下去，而且很有味。比如「雲棚拾放鴿」，他們看了非常之懂。我也懂。自然我們知識份子，比較有點敏感，容易學會，可是據我所聽見的，這幾個刊物和叢書曾經受過不少大衆的歡迎。例子不再舉了。總之，我認爲「方言土語」是極應採用的。

5 最後說到「羅馬字」拚音的問題。五四時代錢玄同先生曾經提到過廢除中國這可惡的方塊字，用羅馬字來代替的主張。照我在「不要上當」裏的例，如果我的朋友說的話是千真萬真的話，那麽中國字就該廢除了，這個意見曾經有許多學者作家們提到過，而且在各刊物裏面試用起來。這方法現在我們應該熱烈地來討論，而且勇敢地來試驗一下。許多人在從前早已經相信「羅馬字」拚音可以代替方塊字，就看我們這次的討論和試驗的結果怎樣。

限於篇幅，不再寫下去了。希望大家來討論，使問題達到更具體的地步。總之，我們這次討論到的這些問題，不單是形式的問題，而是從反復古運動這一個大衆

的內容出發而來的，我們不要只從形式上去看，在腦子中劃分成幾種屬性。把「文言文」認爲是封建的，把「大衆語」認爲是勞苦大衆的，是可以的，但要把「白話文」分爲完全是豪紳買辦的，把「方言土語」分爲是原始的，我覺得這是不應該的，勞苦大衆有批判地接受一切文化遺產的權利。一切形式都應該以勞苦大衆的內容來決定。我們要反對在這問題（內容）面前猶豫，離開勞苦大衆，我們更要反對混亂陣營的胡亂攻擊。

建設「大衆語」並不反對「白話文」

王鋼

二十六日在申報本埠增刊「談言」裏讀到垢佛先生的「文言和白話論戰宣言」以後，今天二十八日又在「談言」裏讀到家爲先生的「歷史倘會重現的嗎」，這兩篇文章所表現的立場雖是不同，然而我總疑心家爲先生有替垢佛先生做了應聲蟲的

懷疑。如果這疑心更進一步，從家爲先生這篇文章仔細看來，很可以疑心到家爲先生在塗着前進似的彩色在那兒幹着和垢佛先生同一樣的勾當。如果這懷疑都是錯的，家爲先生確是前進的反復古運動的話，那麼我們可以說家爲先生這種乾乾脆脆的主張，不免於幼稚，在客觀上不免於替封建妖孽做了幫手的任務。這種有害的理論，我們不能不提出嚴厲的批判。

垢佛先生那篇文章不是明明在文學上掉花鎗，企圖從反復古運動的反「文言文」的戰鬭中挑撥出另一個「白話文」與「大衆語」的戰局麼？他把「白話文」劃成「中間的」，「或者」叫「文言文」贊成牠，「或者」叫「大衆語」反對牠：使「文言文」對「白話文」讓步，互相妥協，聯合着來攻擊「大衆語」；要不然就是叫「大衆語」向「白話文」進攻，使「白話文」趕快向「文言文」投降，反過來來攻擊「大衆語」，這種陰謀不是很巧妙而又很明顯的麼？凡是每個眞正反復古運動的進步作者，不應該機械地在幾個排列着的名詞之前發昏，幹着文章遊戲，而應該實際

地看見國亡家破的嚴重，看見每個凡是不願當亡國奴的對於亡國的封建妖孽的憤慨，同時對於復古運動裏的復興「文言文」所起的憤恨和反抗。從表面看，問題雖着重在反對「文言文」，然而，這根源是起於這反亡國的封建妖孽，因爲反復古運動反「文言文」的問題深入了，必然地會感到五四式的「白話文」在「運用上」已經不夠，須得更進一步的建設「大衆語」才能完成這個使命。「白話文」和「大衆語」是不能像申報「讀書問答」的「再談建設大衆語文學」那麽機械地對立的。如果不從實際的反復古運動這個問題出發，而只是在那究咬文嚼字，只是在「白話文」「大衆語」幾個字面上去變花樣，從表面說是文章遊戲，從骨子裏說是在替復古運動製造機會。

家爲先生這篇文章恰巧就是這樣。不管他怎樣說得漂亮，「時代是不斷的向前進，而社會意識也就得不息地在變動，演進」呀，「要社會得前進，變善，就必需要來對這種勢力，作強有力的暴露攻擊」呀，於是他就提出「我們須得來建設與提

借「大衆語」，向死了的「文言文」作戰，同時，也得向「洋八股」的「白話文」進攻呀〻了！

垢佛先生剛在那裏弄着圈套喊道「來呀，來呀」，家爲先生就馬上應聲「來了，來了」，一唱一和，眞是前後呼應的兩篇巧妙文章！這兩篇文章是很容易使人疑心是一個人做的。

我認爲在這裏應該特別提出，在這個反復古運動反「文言文」的戰鬪中，決沒有反對「白話文」的理由．（大家不但要建設「大衆語」而且也要「白話文」）而是反對那些利用「白話文」「大衆語」去散佈毒素的帝國主義和封建妖孽。

給討論大衆語的人進一忘備錄

昊午

——目前認識大衆語的眞實價值固然重要，

但怎樣去發現大衆語，跟着立大衆語尤爲重要！——

文言文的辯護士們，不怕他們怎樣爲這「江河日下」的衰老文化作「中流砥柱」，而現代人決不能再去開口子曰詩云，之乎者也，跟不能再去穿着儒服，戴上儒冠是一樣。

不但這樣，就是「五四」時代遺留下來的，那籠統的所謂「白話文」，也不過是在大學教室，會議廳，書本子上，兜圈子，不能爲大衆所了解。

問題是因生活關係的不同，大衆在他們的生活裏，所欲表達的意思，情感，喜怒和哀樂，都不是那般「文質彬彬」的人們所用的歐化，或胡適化（或者可以說紅樓夢式的），以及從舊文，詩，詞，蛻化而來的，如果除掉了「的」「嗎」「呀」之類的面網，依然是原封不動老傢伙之類的文字所能表達的。

在這將文化的基點，建立在大衆要求上，使它成爲大衆的，成爲大衆認識世界，表現他們的人生的非常有效的工具，是一個時代的要求！

可是，如果單認識了大衆語的當提倡，還是不够的。因爲這樣，還不過是解決了問題的一半。而另外一半：怎樣去發現大衆語？跟建立大衆語？這才是一個實踐的探討，而不致陷於書呆子式的空談。

雖然已經有人提出了什麼「「接近大衆」，「創造新字」，「採用土話」……的有效辦法。但，這些祇是原則問題。要更進一步追求解決這些原則的步驟，才對。

因爲，人們喊着接近大衆，已經許久了。實際上呢？我們在這裏不必加以診斷，祇是有以下的話要說。

「人們應該提出可以解決的問題」，在這失業的洪水，淹沒千萬人的都市，人們之欲進入生產機關，去從容作發現大衆語，創造大衆語的旅行，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到農村中去，則更是「難上加難！」

假使不在這一當前現實之下找出一可能的路徑，則結果也還是空話。

所以我的意見，覺得現在熱心現代文化的人，尤其是大學生，街頭職業者，作家……，應該下決心來作教育大衆的工夫。尤其是在現在暑期，在都市的，回鄉村去的人，是可以來一次「消滅文盲」的運動，創辦識字學校，夜校等。一方面，我們可以提高大衆看書的範圍，（我們試想一想，不管你的文章寫得頂通俗，而認字的人佔着非常可憐的數目，就可知道提倡大衆語還有連帶的問題）。另一方面，我們可以尋獲「到底我們的文章，跟大衆語言的相差在那裏？」的關鍵。

尋獲了問題的關鍵所在，我們才能大量的吸收大衆語中一些非常能夠表達大衆情感，生活，意思的東西，而逐漸反映到文章上來。那末，真的，活躍的大衆語文學，也就纔能生長起來，繁榮起來。

這是一個比較容易，而又有效的事。希望這次參加討論文言與白話的朋友，把這一問題，提到更進一步來！

不然的話，恐怕流為空洞的毛病，於問題無真實的克服！

忘掉了反面

零紅葉

關於大衆語的問題，連日論爭，熱鬧極了！許多朋友都問我，有沒有什麼意見？但我覺得這個時代只是幹，雖然說話是很必需，但可以不談的時候，還是不談的好。直至前天，讀自由談上的夏丏尊先生的「先使白話文成話」一文，才寫了一篇交給張梓生先生，刊否不知，今晨又讀吳午先生的「給討論大衆語的人進一個備忘錄」，因而覺得有幾句話想說。

大衆語是不是在教育沒普及前應當提倡呢？吳午先生說：「所以我的意見，覺得現在熱心現代文化的人……應該下決心來做教育大衆的工夫……一方面，我們可以提高大衆看書的範圍，另一方面，我們可以尋獲「到底我們的文章，跟大衆語的相差在那裏？」的關鍵」。看起來，這個爭的確是一個比較容易的事，但是不是眞

的呢？

「教育不普及」，這是一句誰都知道的話。但爲什麼教育不普及呢？一方面固然是教育者的不努力，一方面却未嘗不是教育水準太高的原因，而使一般勞苦大衆，既沒有過高水準教育的經濟銷耗，更沒有過高水準教育的時間供給。這樣，我們爲了要補救這個原因，應當採用什麼比較最經濟最容易的方法呢？這方法，便是提倡「大衆語」。中國文言文的深奧和難學，誰都不能否認；而要獲得這深奧難懂的文言文，更不能不有充份的時間和經濟，然而所謂充份的時間和經濟，又是勞苦大衆們所辦不到的事，所以文言文，便應着時代環境的需要，而在五四時代消滅了，那時候便倡行大衆的白話文。

不幸，白話文又爲了先天的不足，到現在又漸漸顯了原形，於是便產生這次「大衆語」的倡行，這也是歷史上進步的必然性！我們說：因爲白話文已經受了傳染症，不願實第二次白話文運動（其實大衆語和白話文運動意義是一樣的）。再承襲

這個不強健的病體，而改個名稱呼「大衆語」，也未嘗不可，但「大衆語」的盛行，便是主要教育的一種辦法，這却非常淺顯的！因爲在上面已說過，勞苦大衆既沒有充份的時間和經濟，則所謂「文言文」又是非三五年工夫不可的，所以我們之提倡「大衆語」，便是便利於大衆增加其求知的能力和速率的。

在鄉村，固然很可以來一次「消滅文盲」的運動，但是消滅之後呢？而所謂救助文盲們的教育水準，又是如此之高，結果又是使一些文盲們望着讀書運動垂頭喪氣，既沒有經濟又沒有那許多時間，（讀文言文或是變形的文言白話文，非有三五年工夫，是不大容易看得懂書本的，）當然弄到後來，便像吳午先生所說的，「我們試想一想不管你的文章寫得頂通俗，而認字的人佔着非常可憐的數目，就可知道提倡大衆語還有連帶問題」那樣境況裏去了。

大衆語是替大衆謀得教育的運動，而推翻所謂貴族教育的運動，更是普及教育的先決條件。僅認得字的人多，是不是便會看書本，是不是算得普及教育？大衆語

推行之後，大衆認得字便馬上看得懂大衆語的一切大衆意識的書本，這一層似乎還應當比較地細究一下的。

我以爲吳午先生是只記着正面的普及教育，而忘掉反面的怎樣普及教育，而誤會了大衆語的意義，這一點是應提出糾正的！

關於大衆語的建設

樊仲雲

白話文運動十五年，又聽到文言抬頭的呼聲，不是一件怪事嗎？可是不，在這馬掛復興的今日，這正是意想中事。

白話文運動是歐戰後受民族自決主義的影響，中國民族資產階級要求革新並建立現代中國的表現。可是這種要求，在國際資本主義的巨大壓力下，馬上給摧毀了。於是在一方面，白話文運動立卽成爲整理國故運動，在他方面，則不過把封建的

才子佳人的小說，改變成爲摩登男女的戀愛描寫。白話文運動在把「之乎者也」改成「的那嗎呢」之後，就從此終止了。

因此之後，這所謂白話文者，其實與文言沒有什麼不同。這沒有與一般大衆打成一片，且不消說，還有他的根本的意識，也與文言相同，爲封建的，享樂的，消費的，剝削的。所以這種白話文之應加改造，是不必多說的。但欲不蹈過去的覆轍，問題來了。一，是意識問題，屬於思想的表現，二，是智識問題，屬於內容的充實。我覺得用語問題，還是第三，但三者必須同時並進，事乃可成。

一方面是要使白話文成爲一般大衆生動的語言，一方面則現在大衆的思想，不脫陰騭文感應篇的支配，而智識方面，其水準之低，我們也不必諱言，在這一點上，他們簡直是一張白紙。所以必須輸入新智識，以豐富其語彙，介紹新思想，以改正其意識。待至智識充實，思想正確，白話文與大衆語，我的意思以爲自然會彼此接近的。

講到智識的傳布與思想的矯正，那末教科用書以外，要數報章與雜誌。但今日教科用書，像過去的白話文樣，很多只是文言的翻譯，而現今的報紙，尤滿紙是封建意識的表現。譬如記男女問題，不曰「陳倉暗度，已非一日，」即曰「珠胎暗結，大腹便便」。記其他新聞，也多關於個人，如某某於某時由京專車啓行，送者某某等，幾時到某處，迎某某等之類，如某社開會於某處，到者某某等。很少指出這事件的社會的意義。總括一句：新聞記載的公式化，就是由於中文言的毒太深了。

因此白話文運動雖已十五年，而一般大衆還是沒有可資閱讀的書物。但他們既然已認識文字，就要讀書，不得已，只好到水滸傳紅樓夢等舊小說中去求滿足，或者看些啼笑姻緣武俠小說之類，或者新一點，讀新禮拜六的戀愛小說。由這種低級趣味，於是小報盛行，黃色新聞支配了整個的新聞界。

說起來這個現象的造成，還是由於白話文運動之半途中止。所以今後從事文化運動，我們應當知道必須先使一般大衆有可讀的東西，只有這樣，纔能斷絕文言的

殘餘勢力，消滅一切爲消費，享樂的封建意識所凝結成功的低級趣味。

建設大衆語文學，我們先要求合於大衆需要的讀物。

「大衆語」不能離開「寫什麼」的問題

俞遙

我的故鄉雖是個距離都市極遠的荒僻冷落的農村；但替帝國主義負有特殊使命的先鋒隊—牧師，的確很早在那裏樹立了十字架。那班聰明的先鋒，不等我們「五四」運動的發動，已先用白話翻印新約和讚美詩了。更不等我們今天因提倡大衆話的文字，他們也很早已把馬太福音等書編成幾百種各省各地，甚至各縣的方言，向佔全國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農民說經講道，實施他們的侵略工作了。

十多年前，自己還是個拖着鼻涕的小孩子，在星期日拉着母親的衣襟上教堂去做禮拜。那時高大廣闊的教堂裏擁擠着許多『吃教』的善男信女，跪在地上向上帝

禱告，懺悔，求福

那時候，聰明的牧師們除了用他們特殊的政治，經濟力量宣傳教義外，更用大衆聽得懂，大衆講得出的話來宣傳，實收了很大的效果，基督教在最荒僻的農村裏，也漸漸蔓延擴展，幾乎與土着佛教有並駕齊驅之形勢。

可是近年來却不行，教堂裏寂寥地剩着幾個老婦人，十字架已失了從前燦爛的光彩。『吃教』的信徒，有的回轉頭去念佛，有的什麽也不信了。

這是什麽原因呢？是牧師們懈於宣傳嗎？是大衆語失了効用嗎？否，原來牧師們的話，隨着環境的演進，現在雖然是大衆聽得懂，大衆講得出，但是大衆不像從前那樣信任了。

大衆的苦痛一天一天加深，家庭貧窮了，農村破產了，生活不能維持了；但上帝永遠不會來援助他們。同時他們直接間接的認清，使他們遭這種苦痛的，不是別人，正是這班紅眉毛綠眼睛的洋鬼子。於是他們漸漸覺悟到原來所謂上帝就是個

一屁」（驗）

結局，牧師雖然用大衆語來講經說道，大衆也不去理睬了。

現在我們的文壇上正在提倡用大衆話來寫作品，這是值得擁護的，但我們不能忘懷，單靠大衆話，也不能接近大衆，深入大衆。我們的作品，不但要使大衆讀得出，聽得懂，並且要使大衆相信它。我們說的話，要正是大衆所要說，要聽，要想的，這才有意義，纔會成功。

現在我們的大衆究竟須要些怎樣的作品呢？這也是個創作家應注意的問題。

大衆語底記錄問題

張庚

最近文言底迴光返照，以及白話文底脫離大衆而走向新文言之路，我們無須多說。它是怎樣地反映了這時代中文化爭奪的鬭爭。對於這一點，申報讀書問答欄中

有極好的說明。我們現在只說，要在這鬭爭中取得勝利，應當如何「做」。

陳子展和陳望道兩位先生都提出了大衆語的問題。這是非常正確的。「白話」在最初就帶着溫情的改良主義的面具，到了近日，正如徐懋庸先生所舉的例子，變成了一種「摩登文章」，好意地說是新文言了。

考「白話文」之所以慘敗，之所以「投降」的原因，完全在它底階級根性，而其中主要的契機之一，即在於記錄問題。

記得陳望道先生在修辭學發凡上講過，中國語言是有由單綴音語漸漸進向了多綴音語的趨向（大意）。這的確是一個事實。但是文字呢却仍舊停留在單綴音的方塊字這形態上。

於是乎文字與言語之間就發生了矛盾：在記錄上就生了問題。

因此我覺得倡行一種全新的文字是必要的。如果不如此，只讓方塊字仍舊存在，即使提倡大衆語，結果也仍舊文言化，殭死化的。

舉幾個例罷：比方北方話和四川話中多捲舌音的尾音，在方塊字上，是用「兒」字來記錄的；但「兒」字用國語羅馬字拚出來是『er』，而拚舌音底字尾不過是一個簡單的『l』又如「膀兒」一辭，北平音讀若『dal』，但依方塊字拚成羅馬字卻成了『Dang er』了。如果，要記錄出活潑的口語來，方塊字成麼？

然而方塊字也自有它奇特的辦法來『補救』這些困難底一部分，像北平口語中有一個由『buhyong』（不用）二音變成的『buong』字，於是在方塊字中生生造出了一個『甭』字。這不過是其例之一。如果我們去翻看『正粵謳』及各地流行的小唱本等等，恐怕要發現許多離奇古怪的字來吧。

如果大衆語底記錄仍舊使用方塊字恐怕要不勝其繁的創造許多奇怪得難以想像的字。

一句話說轉來，方塊字實在是一種死字，『文言字』，封建字。據舊皮袋不能盛新酒的原則，它實在記錄不了大衆語這豐富活躍的語言。否則必定會把大衆話拖

向殭死的路上去。

至於怎樣創造新的合於大衆語的字，我以爲是應當討論的。我在前面舉出過兩種：國音字母和國語羅馬字。這兩種文字是否配做正式的文字，還是只能做注音之用，也是頗可研究的。此外，蘇俄創行了一種中國語拉丁字，推行得很廣，而且出版了很多書報，這我們也可以拿來研究。其實，普及和社會化是並不困難的，我們可以舉閩南土語羅馬字聖經底推行爲例。同時，也並不會絕滅我們的文化傳統的，因爲它決不是教所有的「專家」「學者」拋棄了方塊字。拉丁文雖成了骨董，但拉丁文化底遺產還是流傳了下來的。

關於大衆語文

胡愈之

在我們這個社會裏，幾千年來一向佔着支配地位的某一個社會層，眼見得是在

很快地沒落了。跟着社會層的沒落，凡是代表這社會層的一切文化—哲學，道德，教育，法律，戀愛觀，文學，藝術—也都在沒落的過程中。代表這社會層的意識的語文，自然也沒有例外。

要是五四運動，在別的方面，沒有多大的貢獻，至少在語言革命上，却已把支配階層的營壘，打了一個落花流水。五四文學革命的領袖們，雖然並沒有認識清楚社會的使命，但一方面宣佈「文言文」的死刑，不意識地繳了支配階層的文字的械，另一方面因「白話文」的大量的實際應用，使文學不再成爲大衆的禁地。因此，對於支配階層的語文的沒落，和大衆語文的產生，五四運動，確實起了不少的推動作用。

但是這沒落的社會層，決不是毫無抵抗，就甘心沒落的。代表這社會層的語文，和代表這社會層的一切文化一樣，到了一個相當的時機，必然地要死灰復燃的。而且五四的文學革命，本來就沒有幹個徹底，只是把「文言」和「白話」對立起來

，對於文字接近口語這一點，盡了一點力量，卻把中國文字主要的病根—代表古代的封建的意識—輕輕放過，同時對於新的大衆語言的建設，更少努力。因此就給這判決死刑的中國舊語文，暗下裏留下了一條活路。

果然，到了目前，跟着政治的社會的復古傾向，中國舊語文的鬼怪，又重行出現了，這些鬼怪卻裝着四種不同的形式來露臉：第一種保持着本來面目，就是近來所謂「文言復興」運動。第二種是穿着「白話文」的外衣，借尸還魂。（例如禮拜六派的文章，張恨水的小說，都用「白話文」的形式，表現沒落社會層的意識。）第三種是混入「白話文」的中間，如許多流行的作品，在形式和意識上，不免有時露出沒落語的狐狸尾巴，（樂嗣炳先生是最忠實於「白話」的，但是不幸得很，前天自由談所登樂先生一篇不滿一千字的文章，卻有「繫鈴人自動的解鈴了，自鄶以下……」兩個古典。這不過是舉例。樂先生如此，「自鄶以下」自然更不必說了。可見死文字是到處在作怪的。）第四種是戴上了「風格」「性靈」「語錄體」這些面

具來出現的。這種鬼怪雖然最乖巧，但是主要作用，是傾向語文的復古，卻是十分明顯的。

這四種鬼怪，連合起來，表面的力量是可怕的。但在實際上，這些都只是沒落的語文的最後掙扎。無論怎樣掙扎，都不能挽回沒落的運命，爲的是使用這語文工具的社會層在沒落着，這社會層的意識也在天天沒落着。因此，在教育上儘管提倡「文言」，但「文言」所包含的意識消滅了，「文言」就愈高愈不通。至於體裁六派的借尸還魂，到底沒有多少影響。提倡性靈文學或語錄體的，終究也會露出原形來的。

健康的人是不怕鬼怪的。沒落階層的沒落語文，是不會有多大前途的。橫在我們面前的主要問題，卻不是反對「文言文」，反對「語錄體」之類，而是積極地改善建設大衆的語文工具，建設供大衆應用，代表大衆意識的語文。

因此對於陳子展陳望道兩先生提出的大衆語文學，我是感到有重要意義的。不

過在這裏我有一些意見，和兩位陳先生不完全一致。我以爲：

一·「大衆語」應該解釋作「代表大衆意識的語言」。「大衆語文」和五四時代所謂「白話文」不同的地方，就是「白話文」不一定是代表大衆意識的。而大衆語文卻決不容許沒落的社會意識，混進了城門。

二·「大衆語文」一定是接近口語的。但是絕對的「文語合一」，當在語的組織有相當進步的時候。

三·中國言語最後成爲大衆用的最理想的工具，必須廢棄象形字，而成爲拚音字。因此在目前詞的連寫，簡筆字，國語音標，都值得提倡，因爲這是促進中國語文拚音化大衆化的一種步驟。

再進一步

龍貢公

單說提倡大衆語，活話，去回答提倡文言，死話，這陣法雖然很好，但仍然免

不了籠統含混的毛病。大衆語，活話底本質的要素沒有被明確地指陳出來，正是對於「借提倡文言使人去讀古書」的陰謀家保留了致命的一擊。

在我們不曾用最科學的方法證明佔全國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大衆，絕對不能接受不能運用文言文之前，我們雖堅決地說明大衆有大衆語，有他們底活話，而不把那種語底一般的抽象性的東西暴露出來，反對者仍然大有饒舌的餘地的。他們說文言文簡便，白話文（大衆語，活語）累贅。「大衆爲甚麼不高興省力呢？」他們是這樣吶喊着做猛烈的反攻的。

汪懋祖先生很驕傲地告訴我們：「……例如說『這一個學生或是那一個學生』，文言只須『此生或彼生』即已明瞭。其省力爲何如？……」汪懋祖先生沒有新的發見。只像許多人問過大衆似地提出這質問：難道大衆不想獲得較省力的工具麽？

如果我們不能不承認「這一個學生或是那一個學生」在字的數量上的確較「此

生或彼生」爲多，而我們又無法把大衆必須使用大衆活語解釋做道德的責任，這答案將使我們感到困難與迷惑了。

但我們知道許多人不明白省力只是在某種限度內的一種方法，而不是一個目的。假使但圖省力，語言文字該廢棄，只要結繩子比手勢就夠了。譬如要遍遊某一城市所有的馬路，我們可以說乘坐汽車比較省力，倘要攷察當地的風土人情，汽車就變成毫無用處了。所以從前人們主張說，白話文比文言文易學，所以要提倡。這樣的講法是極其錯誤的。

反對文言文，白話文，提倡大衆活話，這是在老早以前已經得到大家承認的結論。那理由正是因爲大衆活語精密正確，而文言白話等死語浮泛空虛。浮泛空虛是中國人底通病，一切行爲的弱點，半開化的封建頭腦底特徵，所以我們才要使用「精密正確」的戰術去追擊。

「此生或彼生」不能使我們滿足，「這一個學生或是那一個學生」仍然不能使

我們滿足，我們要知道「這一個髮短，身矮，聰明，康健的小學生，或是那一個長年流鼻涕，貧窮，瘦弱的小學生」。

為了精密正確，我們要拒絕偷懶的省力，無結果的容易，內容空泛簡潔，和油腔滑調的流暢。而敢於接受沉着凝重的語體；担負創造新詞新字，吸收外來語的麻煩困難；倘充實不妨詳盡，倘嚴肅不妨粗糙生澀。否則語言是以前進着，運動着的社會做牠底內容的，沒有一掃傳統惡習慣的精神，如何能建立大衆活語，使中國語言有向高度發展的可能呢？

不懂得大衆語需要精密正確，却能夠討論大衆語底建設問題，這樣的事情恐怕很少的吧。

根據這個對於大衆語底本質理解，要來再進一步建立大衆語文學，我可以試行提出下列幾個辦法供大家參考：

I 在全國大衆語言沒有成為統一的東西之前，我們應該盡量利用方言的形式。

2對於方言裏的陳腐靡爛，浮泛空虛的成份，我們應該盡剔除洗鍊的責任。

3反對以北平話做大衆語底基準，因爲道地北平的土話，懂的人並不多，尤其在粵閩兩省。這樣的話拿給大衆學習運用，是縛束他們底語言底發展的。

4創造新字，提倡簡字，吸收外來語。

5爲要精密正確地表現大衆底思想行爲，有語言學素養的文學者應該提供他們以適當的外國語語法。

普通話與「大衆語」

魏猛克

現在的所謂「文言文復活」，其實只是燈油將盡的「囘光反照」，本來不足稀奇，更用不着怎麼憂慮。倘若爲青年人前途打算，少使他們上點無謂的當，而羣起以攻之，則雖然所耗費的氣力太可惜，在當前却還是有意義的。關於「大衆文學」

的問題，好幾年前早就有人當作一個嚴重的問題來提出過，不過那時所獲得的只是一個空洞的口號，理論上的鬥爭簡直可說是完全沒有。直到一九三二年文學月報創刊時，才又由宋陽先生將這問題重行提出，這回却不但有了理論上的鬥爭的發展並且最先涉及到「用什麼話寫」的文字本身，這實在是大衆文學急待解決的先決問題，但是，他與止敬先生戰了一個回合之後，又不幸因該誌的停刊而被延擱下來。現在，我們再提出「大衆語」的建設問題來發展討論，倘能因此而成爲一個新的運動，那意義自然更重大了。

看現在的議論，是已經同意話和文不能分開，但「用什麼話寫」，大衆有沒有一種普遍的語言，我們可不可採取一種語言來做「大衆語」呢的這些問題，却似乎還少有具體的意見。但從前宋陽先生是提出過了：他以爲只有「現代中國普通話」才是「大衆語」，才是大衆中間的普遍的語言。不過他所指的普通話，主要的是「現代化的工廠」裏面流行的那種話，所以經止敬先生調查的結果，知道還是以當地

土白爲基本，仍然不是普遍性的大衆所能懂得的話。其實，「現代中國普通話」是有普遍性的，牠是主要的流行在輪船，火車，碼頭，車站，客棧，飯舖，遊藝場等處。工廠不過也受到影響，這是客籍的工人帶進去的，但因爲他們的生活不是流動的，久之就要和當地的語言同化。所謂普通話是因爲交通發達，各地人們往來日漸密切，要求交涉上的便利而產生的。所以牠的目的只在要人懂。牠不是容納各種土話，牠是竭力避免各種土話。牠在企圖每句話都能夠說得出，寫得出，每個字眼都找得出意義來。牠比北平話簡潔，少「兒」「啦」等語尾詞。自然，「現代中國普通話」還沒有達到完善之境地，有時夾雜些所謂「南腔北調」(零碎的土話)，但牠必然會隨着交通發達而進展，隨着社會意識的轉變而轉變。中國處在現在世界的狂潮之下，語言的統一當然不是久遠的事，那時統一的語言爲「現代中國普通話」轉變而成，大約也未必會錯。所以我想，採取有普遍性的，「現代中國普通話」作爲建設「大衆語」文學的基準，是可以的。作家在作品中盡量採用普通話，也未必不是

文學接近大衆的初步。完全用普通話寫文章，將來也許要變成最簡潔明朗的文章。

我對於採用土話的主張很懷疑。土話是原始的，沒有進步性的語言。土話寫出來只讀得出聲音，找不出意義，意義變全的「土話」，便是人人可懂，人人能說，不成其爲土話了，（即如「搗蛋」一語，便非山東人也常說。），試拿張天翼君的小說來看，他最喜用的一句罵語是：「奶奶雄」，這「奶奶雄」我們可知道是指什麼東西呢？又如「啊啦」，「頂括括」，「乖乖叫」等語，倘非當地人是不能從字面上理解其含義的。一篇文章用許多看不懂的土話，即使加了註釋，那效果與撇用成語和典故，又有什麼分別麼！

「大衆語」文學的建設是艱難的工作，還需要更多的研究和論爭。倘談到土話的採用時，則希望不要忽略了牠現在在文學作品上所收的是怎樣的效果。

什麼是「現代中國普通話」？

陳　弈

在「文言」與「白話」的爭論中，陳子展和陳望道兩位先生更進一步的提出了「大衆語文學」問題的討論，這是一件可喜的。

關於「大衆語」文學的這一課題，在幾天來的各報附刊上，都引起了熱烈的討論。昨天在「自由談」上，又讀到了魏猛克先生的「普通話與大衆語」一文，魏先生在這篇文章中，特別的提出了「現代中國普通話」來，魏先生認爲『「現代中國普通話」作爲建設「大衆語」文學的基準是可以的。』關於這一點，我以爲有很多的疑問，而不敢妄加苟同的。

什麽是「現代中國普通話」呢？這在以前的文學月報上是沒有討論出結果來的。但據魏先生說：『「現代中國普通話，」牠是主要的流行在輪船，火車，碼頭，車站，客棧，飯舖，遊藝場等處』。『對於這一點，不知是否魏先生曾親自觀察過，而發覺有這樣一種「普通話」在那些場合上普遍的流行着？不過，我們只知道，在現代的情況之下，整個的中國是沒有一處的語言統一的。而魏先生却是說這一種

「現代中國普通話」是到處的流行在「輪船，火車，碼頭，車站，客棧，飯舖，遊藝場」等處的。那末，這種流行普遍各處的「現代中國普通話」到底是那一種語言呢？這不知魏先生是否有着明確的事實可以證明？

說到輪船，火車，碼頭，車站，客棧，飯舖，遊藝場等地方，在我個人到是經過很多的，但是，我從來就沒有聽到這種到處流行的「普通話。」而只是到一處就有一處的話。比方說到了香港或廣州的輪船，火車，碼頭，車站，客棧，飯舖，遊藝場等地方，總是聽着一些廣州話，甚至內地的土語。要是你再到汕頭或廈門去，在這些輪船，碼頭，客棧，遊藝場等地方，又是變成完全用汕頭話或廈門話了。再之，就是單在上海的這一都市裏，是不是各輪船，火車，碼頭，車站，飯舖等地方，都是說一樣的語言呢？所以，魏先生的提出「現代中國普通話」是流行在「輪船，火車，碼頭，車站，客棧，飯舖，遊藝場等處。」這不知到底是那一種話；最低限度，我是不知道的。因為現在不單是全國到處的輪船，火車，客棧等地方不會有

一種統一的話，就是單獨的在一個都市裏，也是沒有這樣一種統一的話的。

魏先生還說：「中國處在現在世界狂潮之下，語言的統一當然不是久遠的事，那時統一語言為「現代中國普通話」轉變而成，大約也未必會錯。」這一點我認為魏先生是太過於武斷了。中國的語言是否很快的在短時期內就能夠統一？這是另外一個問題，然而假如是統一之後，據魏先生說是，通行「現代中國普通話」所變成的語言，那末這是不是可能的？上面我說過，現在的這種「現代中國普通話」還不知是那一種話，為什麼魏先生現在就這樣武斷的說統一之後就實用這一種由「現代中國普通話」變成的語言，這不知魏先生是否如某預言家(？)的有先見之明，或者是有什麼證據可以先搬出來給大家知道？

至於說到「採取有普遍性的「現代中國普通話」作為建設「大衆語」文學的基準。」這更是一種空洞的理論。其實，現在還未知道這所謂「現代中國普通話」是那一樣話的時候，就先把牠提出「作為建設「大衆語」文學的基準」，這還不是笑話嗎！

最後我希望魏先生先把這所謂「現代中國普通話」是那種話，這一疑問解說之後，再去談別的吧。

建立大衆語運動的態度

朱瑞鈞

近來有人在提倡文言，也有人在向提倡文言者抗議；二者之外，更有人進一步提出「大衆語」的建設，不承認文言白話之爭還成問題，這問題根本已經過去了。

由我看，前三者之爭，並非文字本身正統之爭，從提倡文言者的口中是可以明白看出他們的用心的。因而後者建立大衆語的提議，也不能只以文字本身的興廢爲止。這一個問題雖由文白之爭爆發起來，但實際上是全部文化前進與後退的爭論，也就是代表這兩個營壘的文化意識的鬪爭。陳望道先生在「關於大衆語文學的建設

」中已經觸到了這一點。他說「文學並非單有語言就行的。一切的文學，都需要會得看現實，看現實又需要有一定的態度。態度的修養，實際又比語言的修養更重要。有些語言上的問題，也需要從態度上去選擇去決定」。

倘要建設「大衆語」，首先不能不了解到這一點。五四時代的新文學運動為什麼不澈底，就因當時的戰士們只看到文字的本身的改革，忽視了決定這種文字內容的東西。

因此所謂進一步建立大衆語的工作決不能置身于「文」「白」相爭的事外，他們爭些什麼，不能不睬。大衆語建設的工程只有在根本否定文言，相對的揚棄白話之下，纔能順利的前進。

要根本否定文言，就先要否定文言所根據的東西。文言的復興，並不是文言本身有什麼魔力，牠是和尊孔，讀經，迷信佛法在一個陣營中出發，受一個指揮進軍的，牠和這些東西，不能拆開。

從來的攻戰，正面迎出是一法，旁敲側擊是一法，根本搗毀敵人所根據的營壘也是一法，最後的一法是一切攻戰中的上策。

我們要知道文言的陣營所在，牠復興的社會的根據是什麼，只要看曾經提倡過牠的是些什麼人，他們是代表着什麼。我們翻開歷史，遠者不必說，「五四」以際，要尊孔讀經的是些什麼人呢？做皇帝的袁世凱，復辟的張勳，「反革命」的張宗昌。

他們這種舉動，并不如一般人所說的是思想落伍或開倒車，實在有他們不能不如此的苦處。現在是時勢所趨，風氣如是，不但中國，德國的文化統治，不就是中國文言復興，迷信佛法的國際先例麼？倘要建設「大衆語」，第一個關口，第一個暗礁，就在這裏。

文言的本身已經是一個不可復活的東西，但借文言還魂的東西，却不可輕看。大衆語運動對文言正確的態度我想不是消極的容忍，要緊的還是積極的向文言所根

據的整個復古運動的堡壘面前。

大衆語文問題

佛朗

語言文字的改革，是和社會的改革有着密切的關係的。五四時代的提倡白話文，是當時新興資產階級對封建階級的文化上的進攻。這種文化運動是跟着當時社會的改革而出現的。但新的語言文字的成就，是必須藉着新的充實的階級生活作其內容；五四時代的文字的革命——由文言到白話，固然是資產階級民權主義的任務，可是中國的資產階級在文化上不能完成這種任務，也跟他們不能完成政治上經濟上的任務一樣不久便開始叛變。這種現象，正是說明着資產階級的階級生活不足以充實新的言語文字，於是這運動的第二步沒有向前走，一部分走到歐化文字的道上，成功了一種高等華人的「買辦文字」。一部分回頭鑽進封建殘餘的巢穴，形成舊小

說式的白話。這樣，白話文便逐漸變成文言文一樣不適合大衆的一種新八股了！時至今日，封建的勢力死灰復燃，士大夫之流——很多是當年的戰士，已經「羸至名來」，換過一副嘴臉，把白話成爲「士大夫的文字」。他們所考究的是如何說得婉美，如何講得漂亮，怎樣更適宜於紳士身份，博得洋大人和官僚資本家的欣賞。有些人公然斥大衆爲「傖夫俗子」，自鳴風雅，提倡「死人的白話」——語錄體，把言語文字回轉到幾百年前的時代去，這些都是「士大夫文字」的復活，和誦經唸佛的復古是一樣的。

這種蛆虫的活現，這種新僵屍的叫喊，還在正須努力着文藝大衆化的進程中的現代，實應加以嚴肅的斥摘，而對於「白話文」問題之須再提出——大衆的白話文，也是必須的事。所以近來陳子展陳望道兩先生對於「大衆語」主張的文章，我認爲是很重要的。

但這問題的提出，我以爲不是單在用什麼話的問題，大衆語文，是建築在大衆

的生活上，我們不是去提倡大衆語文，而是要從大衆去體驗與學習。質言之，是怎樣發動大衆來完成這正在大衆中成長的新的語言文字的問題。

我們不當忽視在那留學生，新式風流才子，阿附了帝國主義，屈服於封建殘餘，叛變了文化革命的任務，造成脫離大衆的士大夫文學之外，勞苦大衆已經漸漸的把這責任肩負起來了。文化革命的任務，也祗有勞苦大衆自己，纔能夠完成，當前的勞苦大衆，正在充實他們的階級生活，他們絕不是祗能應用士大夫文字的唾餘，而是已有自己的語言文字，新的語言文字，正在他們的生活的開展中成長，一般的作品上之所以不能寫下這種大衆的言語，是那些作者沒有深入到大衆中去，沒有從大衆去學習，沒有使自己成爲勞苦大衆中的一員。

以前便有一些人主張要創造一種「現代語」來糾正那一些縉紳先生的白話文了。他們知道現在的非驢非馬的白話文不能接近大衆，想創造一種廣大民衆能聽懂的白話。但可惜，他們是忘記了勞苦大衆已經有着他們的新的語言在生長，不提出

學習的問題，而提出「怎樣去創造」的問題！結果，便有「建立土語文字」的主張，這是錯的。這是把大衆的語言文字和大衆的實生活分開。新的語言文字，并不是天才所能創造的，也不是幾個文人所能領導的，而是由新興階級在他們的實際生活中繼續去完成。至於土語這種東西，多半是含 封建的意味在內。中國的言語文字之不能統一，土語之所以盛行就是因爲中國社會長久停留在半封建的狀態中，狹義的地方主義，使某一地方的豪紳階級維持着他範圍內的勢力，而以「鄉音」「土語」爲籠絡。因此「土語」有時不但不是很好的大衆語，而是勞苦大衆在執行文字言語革命的任務時所欲極力剷除的東西。土語有時有若干之處可以應用，若干之處仍是對新的語言文字發展上發生阻礙，新的大衆語大衆文建立的目的，——不單是要大衆「能聽」「易看」，而且要統一起各地方不同的語言。應用土語正是相反的東西。

所以，對於大衆語文的問題，我以爲新的語言文字，已在勞苦大衆的實生活中

成長，一般作家應該去從大衆中學習他們的語言。

大衆語問題討論的現階段及以後

傅東華

近來汪懋祖和吳研因兩位先生關於文言白話的爭論，（單說在上海方面）曾經引起兩種反應（一）是担憂文言文的復興，因而感覺到對這傾向有提出嚴重抗議的必要；（　）是連帶感覺到五四的「白話」的先天病（雖然這種感覺並不等到現在纔有），及須有另外一種較健全的文學用語起來代替它的必要。這另外一種用語，爲要對五四的「白話」表示不同，及爲以後關於它的建設問題便於討論起見，曾得一部分人的同意，給它暫時起一個名字，叫做「大衆語」。

直到現在爲止，參加這問題的討論的，似乎對於（一）點都不大重視。稜磨先生在「文言的前途」一文裏說：「我斷言這抗議是無效的。」確實，在汪懋祖先生所

反覆中說的「社會需要」不住地在替文言文打强心針的現在，這抗議能發生多大效果呢？因爲汪先生對於白話文的抗議也原不是「無病呻吟」啊。他看看許多人學英語，都只爲預備走進大英「寫字間」，那末學國文的目的除預備進中國「寫字間」還有什麼呢？而現在的中國「寫字間」，無論官辦，商辦，或者官商合辦，都只要文言不要白話，於是汪先生不得不替青年們擔憂了。是的，在目前的中國，生活迫得人們不得不「見人講人話，見鬼講鬼話。」（這里「人話」和「鬼話」都照劉大白先生所解釋的用例。）典型的紅人們，大都拿起白粉條來，就能在黑板上寫「白」的「話」，一旦拋下白粉條，搖起葉聖陶先生說的那把鵝毛扇，就又能拿起也是毛做的筆，在紅格紙上「等因奉此」了——只有這樣的人們才會發跡。所以汪先生擔憂文言文的墮落並非無故。但可惜現在的青年未必——也不容——人人都打算進「寫字間」去發跡，因而汪先生的美意未必會普遍地被接受，那末稜磨先生說「現在對白話文無須擔憂」那句話，又是千眞萬確的了。

不過稜磨先生對於他自己提出的「白話文被利用是不是另有可愛處」一個問題，只簡單地給它一個「不見得有」的答案。似乎還嫌太大意一點。因爲話跟話雖然像耳耶先生說的自然會得「分家」，但若不經一個會計師或者律師之類替它們分一分清楚，難免要出起毛病來。所以現在把「文言文」和「白話文」的問題再提出來討論，原要算是「五四時代剩下來的文章」（也是耳耶先生的話），至於把「白話文」和「大衆語」應該怎樣分家的問題來討論，應該不至於是「倒霉透」的事情吧？

現在爲止，對於「大衆語」這個名詞，還不曾有人提出異議，但也不曾有人加强這個名詞的重要性，至多把它當作「白話文」的同義語罷了，例如龍貢公先生的「再進一步」文中，有一處在「白話文」三字底下用括弧括着「大衆語」和「活語」，好像這三個名詞是沒有分別的。其實龍先生要「再進一步」去討論的問題，就是耳耶先生所說的「話跟話底分家」的問題，所以同「白話文」分了家的另一種用

語，似乎有先給它一個名字的必要。

不過一個名字常要被人給與不同的內容，因而龍先生的「再進一步」的需求，又是很自然而且必要的了。到現在為止，給與「大衆語」的解說已有了下面幾種：

(一)「大衆說得出，聽得懂，看得明白的語言文字。」(陳子展)

(二)「只提出說，聽，看三樣來做標準，我想是不够的，寫也一定要顧到。」(陳望道)

(三)「爲尊重大衆利益起見，一切文字都該話文合一。」(樂嗣炳)

(四)「大衆語不是什麽人創造出來的，而是隨着大衆生活的進展而進展的東西。」(申報讀書問答)

(五)「應該解釋作代表大衆意識的語言。」(胡愈之)

但是因爲「大衆」和「大衆意識」這兩個名詞本身太富有彈性，所以關於實際建設的討論上仍舊要發生困難。例如都市大衆「說得出，聽得懂」的語言，農村大

衆未必「說得出，聽得懂」：又如一部分落後的農村大衆對於「眞命天子」出現的希望，能不能算它「大衆意識」？因此，大衆語是不是可以聽憑它自然發生和進展，完全不加一點人工的「創造」和促進？如果我們　於最後這個問題的答案是肯定的，那末現在這許多討論就都沒有意義了。故從這問題討論的現階段的情形看起來，我們只能夠把握住下面幾個要點：

（一）「大衆」是跟一切特殊的個人或特殊的羣——從皇帝到買辦——對立的名詞，故一切特殊的個人或特殊的羣的特殊用語，無論是口頭的或筆頭的，都不是大衆語。文言文從專作筆頭用語用的時候起，就全部是特殊的羣的特殊用語，故全部文言文都不是大衆語。「白話文」因它只拿「白」不「白」做標準，無法防衞自己不被特殊的羣拿去利用，故「白話文」不必就是大衆語。

（二）「大衆語」一面要向大衆去學習，一面也要大衆來學習，所以它的進展至少得要一點人工的幫助，猶之歷史的進展需要人工幫助一樣。例如「肺病」，最

落後的大衆叫做，「野貓迷」（神話的），次落後的大衆叫做「虛病」（玄學的），標準的大衆語語彙裏就應該不容有後面這兩個名詞的存在，不管它們怎樣的「白」，怎樣的「活」。（至於描寫大衆知識落後的小說，當然在例外。）

（三）因上面第二項的理由，目前要「話文合一」是辦不到的（胡愈之先生已經說過），所以「大衆要聽得懂」這個標準，只好暫時讓步一點給龍先生所主張的「精密正確」的標準，（例如北平話「汽車」叫「電車」，「留聲機」叫「話匣子」，大衆語語彙裏都應該改正。）換句話說，只好暫時把「大衆語」的範圍縮小起來。說得再具體些，可假定拿現在高級小學的教育程度做我們的大衆語的標準。至對於比這程度更低的文盲大衆，當然還得再遷就些。就如對兒童說話有時不用代名詞，而沒有代名詞的話究竟不能算是標準語。

以後呢，我們希望對於這個問題能夠繼續有人像龍貢公先生那樣「再進一步」，「又進一步」，「更進一步」的討論下去，逐步的把實際問題提出來解決，並且

實行。即使我們的抗議果眞無效，至少在文學的領域裏應得先做一番「堅壁淸野」的工作。

最後，我們不可忘記，現在參加這個討論的人們，從某一義講時，也未嘗不可算是「特殊的羣」，那末我們的這種打算是不是合於眞正的大衆的需要，那就只有眞正的大衆自己纔能判斷。

什麼是大衆語？

雅•非•

自從五四以還，吾國的文學界裏就因白話文和文言文的鬭爭，而曾激起過一次巨大的浪潮：迨至今日，白話文已在吾國文壇上樹起了它成功的旗幟。於是它就成了一種普遍性的文學，不過，它所立的基礎，似乎還沒十分鞏固，因此不時有動搖之虞！就拿目前的情形來說吧：文學界裏正在爲了復興文言文，和推行大衆語，而

引起了紛爭。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誰也不能够斷定誰是誰非。日來翻開每種刊物，裏面總有一二篇關於大衆語問題論爭的東西：這裏，有的贊成白話文而反對文言文，有的雖然贊成白話文，而不反對文言文，對於大衆語則不能表示同情，這使吾們這班文盲眞是無所適從。

白話文之在今日，在文學上已經有了相當的功績：這是誰都不能加以否認的。原因當然是因爲它，看得懂，說得出，聽得慣，寫得來。不過，它的缺點也有，那就是繁複冗長。文言文優點是，流利簡潔，莊嚴，圓穩：所以啓事公文等，還是少不了文言。可是，四六駢文　在近年以來，却不大看見了。自後，漸漸地有些人愛用語體文，這亦因其簡而易曉，詳而不繁。迄至目前，歐化文字，亦不脛而走，盛行於現文壇，於是，這些語體文等，倒不大有人用它了。

什麼是大衆語？怎樣才是大衆語？吾到如今還是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有人說：大衆語就是鄉下人口中的土白，然而，這句話對不對，吾還不大敢相信。如果對

的話：那，我卻要懷疑起來了。因爲，吾國各省各地的土語是根本沒有統一性的，往往南方人講的話，會使北方人聽不懂，而同樣的，北方人講出來的話，使南方人聽了會莫明其妙的。譬如說：揚州人的「休告子」，蘇州人的「啥介」，山東人的「幹嗎」，寧波人的「沙害」，廣東人的「稟高」，教隔省的人那能懂懂，所以，吾的意思，對於這樣難使一般大衆瞭解的「大衆語」，實在是不敢領敎！吾的唯一主張，還是希望幾位文學家，和大作家，且先把這流行的現成的白話文，拿來改善一下就得，正不必捨本逐末的去追求這種畸形式的新奇發現，那是我敬向吾國未來的文學界裏所馨香祝禱的。

總之，文壇的變遷，也是受着時代的影響而被推動的：西洋文學和東洋文學，也是一樣的推陳出新，但須適應現實生活，把握住社會核心，及瞭解民族性的變動：可不能夠避重就輕的去投機取巧。然而，吾國幾年來之文學界，則日漸趨入歧路，遂形成了今日的畸形發展，與變態情形，還眞是大大的不幸！

不過，吾末了還得向讀者鄭重聲明一句，吾贊成白話文，但，同時亦不反對文言文，至於語體文，也自然有其存在的價值。而實際上不能大衆化的，所謂「大衆語」，吾卻始終不能夠表同情的。

以上所說的，吾是站在純客觀的立場上講的，並沒有什麼成見介乎其間。鄙意如是，質之高明的讀者以爲何如？

大衆語的產生與建設

寒白

著名的語言學家劉德威格列諾（Ludwig Maire）曾說過：語言和理智的生活都是由那趨向於達到共同目的之共同的活動發生的。卽由我們祖先之原始的勞動發生的。他的意思就是說言語完全是隨伴着社會勞動發展而發展的。所以言語是不能脫離社會生活而存在，是人與人相互之間交際的一種工具，是聯繫人們的一種手段。

資本主義社會是不同於封建社會，更不同於原始社會的言語，這完全是被社會生活條件所決定的。所謂「豐富的言語」是伴着「豐富的生活」而發生出來的。現在還有幾種畜牧民族，他們的言語，幾幾乎還是關於牲畜的言語，這種現象之所以發生，因為是生產力之低度發展，局限於一定的生產過程的關係，由此我們知道在目前所爭論的文言，白話，大衆語等等的問題，都是末落的社會根據。像復興文言一類的運動，僅僅是一個夢而已。

在經濟畸形發展的中國社會，是多麼需要着一種共同言語——大衆語啊！把全中國人們的意識，密切地聯繫起來，使文化水準低落的人們，容易收獲一切新文化的果實！使無數千萬的文盲，容易學習一種普遍的智識，然後大家手攜手地在一條戰綫上共同努力他們生活的樂園。這就是我關於大衆語產生的簡單敘述。至於大衆語在中國的重要性，擬另文再說。

大衆語產生的必然性，我們已經明瞭，現在要來談談怎樣建設大衆語的問題。

要使大衆語成爲一種堅強而有力的言語，在中國普遍地發展，我覺得需要注意下列幾個問題：

（一）深入到民間去：既然成爲一種大衆語，那末它一定是人們各方面生活的結晶，人們因爲受着經濟環境限制，就決定了他們言語的因素，所以要眞正能把大衆生活具體地反映起來，就必需要到民間去體驗。

（二）溶化各地的方言：中國言語的複雜，是誰都知道的，所以要使南方人懂得北方人的方言，反之，要使北方人懂　南方人的方言，就必需把各地的方言，溶冶於一爐，得出一個共同的結論。

（三）文字通俗化：爲了要使任何文字大家能理解，就必需要把文字絕對通俗化，去適合大衆的需求。

（四）肅清作家的虛榮心：在過去的一般作家，拚命地在文字上用功夫，把文字語句修飾得非常美麗，深奧，好像要是不這樣做，就失去了作者的尊嚴性的樣子。

要知道那種作品，完全是有閒階級的消遣品，象牙塔裏的藝術，所以我們希望前進的作家們，能認清有閒階級所賜與的虛榮心，掉轉筆頭，去為大多數人們服務。

(五)新聞事業的改良：足以成為大衆普遍的讀物，當然是報紙了，而現在所有的報紙，除了一些副刊以外，所有的文字，都是文言文。不消說，文言文現在已成為普遍教育的阻礙物，不，也是大衆語的勁敵。

我所認為重要的，僅僅是這幾點，希望大家來作一個熱烈的討論。

建設「大衆語文」應有的認識

若生

從「文言」「白話」底爭論所引起的「大衆語」問題，最近幾天來，已經討論得很熱鬧。這問題在現階段被提出，無疑的，是有非常實踐的意義和迫切的需要。

語言和文字，本來只是人類社會進化過程中的產物，如果社會底基礎建築一有

改變，那麽代表社會意識的語文，就不能不跟着逐漸改變，否則它將成爲社會進化上的障礙了。現在我們這個社會，舊的一方面，已很快的在沒落下去，新的一方面也逐漸在生長起來，爲了要表現這新的意識，自應有一種新的語文產生，這便是「大衆語」。

但是我們從這幾天討論的各方面看來，對這問題，意見還很不一致。我們以爲「大衆語文」不僅是絕對的反「古文」的——代表「封建意識的古文」，同時也相對的反「白話」的——現在流行的那些代表「官僚買辦意識底變相八股或語錄體之類的白話」。我們要執行這兩重任務，首先要從語文發展的社會關係和語文的本身上，求得個澈底的了解，認淸它們中間的對立和統一性。所以現在許多人以爲「古文復興」是沒有多大意義，或者以爲「大衆語文」只是反對「古文」，並不反對「白話」，都只看到事物的一面，而不會看到它的整體。

現在的所謂「古文復興」，雖然祇是一種沒落階層底臨死掙扎，不會有多大的

前途，可是你如果不去澈底清除掉，究竟會障礙整個語文的進步的。這好像一間屋子裏，放着一個患着很危險的傳染病底人，或已經死了的屍體，如果不趕快把它送進醫院裏去或埋葬掉，對於其餘健康的人是多麼有害。同樣，目前這種中國舊語文的精靈鬼怪，又重行化裝出現，到處作怪迷人，像樂嗣炳先生這樣健康的人，也會受牠的迷惑，其餘更不知有多少哩！所以我們在建設「大衆語文」的現階段，對於這種「五四剩下來的文章」，還是要對付的（這後面還要講到），並且要用戰鬥的精神來對付它，非給它一個最後的致命打擊，使它早日滅亡不可。何況這種「古文復興」運動，事實上還不僅是幾個人底別有用心，是跟着整個社會的復古傾向而來的。

至於從「五四運動」所興起的白話，是那時新興資產階級要求民主政治的一種表現，在反封建上果然已盡過很大的任務，但因他們階級本身的缺陷，不能進一步幹個澈底。他們只在字面上「白」「不白」的兜圈，不敢深入到社會的底層去和大

衆相聯繫，所以留了一條給「封建」復興的路。另一方面，更因戰後國際帝國主義的加緊壓迫和其他的關係，反使他們遠離了大衆向回頭去和封建攜手妥洽了。在語文上也祇將「之乎者焉」換了「的那呢嗎」的變相八股。

今天「動向」裏登載王鋼先生一篇文章，以爲「建設大衆語」並不反對「白話文」。假使王先生底話是對，那末禮拜六派的文章，張恨水的小說，和戴上了「風格」「性靈」「語錄體」這些面具出現(借用胡愈之先生話)的東西，不是都用白話(大衆語？)寫的麼，我們何必再要建設「大衆語文」？提倡「大衆語文」豈不是多事？王先生批評別人機械地對立起來，自己却說：「在這個反復古運動反文言文的戰鬥中，決沒有反對白話文的理由，大家不但要建設大衆語，而且也要白話文」，這才是機械地把它們對立起來。

「大衆語文」到底是什麼呢？「大衆語文」和「白話」完全不同麼？自然不是的。「大衆語文」並不是從天上掉下來，或地下生起來的，它是跟大衆底實踐同時

發展的，這點在前面已經說過。所以「大衆語文」並不完全反對「白話」，它是從「白話」相對的對立而又統一的。換句話說，「大衆語文」是白話的高一級，牠發展了「白話」的某一部分而揚棄別一部分：它是「白話」之否定。

關於大衆語文學底建設

王任叔

我以爲在這大衆語文學的名詞下，首先要決定的，是「大衆」這個名詞底屬性。因爲「大衆」這個名詞，根本是含義籠統，沒有確定的屬性的。在封建君皇之前，山呼萬歲的人民，固然可叫大衆：在革命的廣場裏，大喊打倒擁護的也可叫大衆。我們現在要建設大衆語文學，如其不僅僅限於語言底範疇裏，正如胡愈之先生所說，還要包含大衆意識的，那麼，我們將以那一種大衆作爲基礎呢。落後的大衆意識和前進的大衆意識，其間相差的距離，差不多有一世紀之遠。自希望真命天子底

出現，以至於發現了自己，一想由自己來負担歷史的任務的大衆，在現階段的出場，恰巧對比地出現着。在這時候，所謂大衆語文學之建設，不得不發生一絕大的困難和矛盾了。

其次，要提到爲什麼現在有人要提倡大衆語文學呢，及提倡這大衆語文學底作用是在那裏的問題了。這大約可作如下解釋。大衆語提倡底契機，是在文言復興運動的刺激下，作爲反文言復興運動，同時，更使白話運動深入於大衆而起來的。所以從後一意義來說，也就是白話底奧伏赫變。（申報讀書問答欄中把這一意義也叫做「反白話」。實際上，反白話底「反」，與反古文底「反」，有其不同的意義，反古文是從其對立形態上來說的，反白話則是一種自身底揚棄與調整。這一點應該加以區別）。而所以要把白話奧伏赫變過來，就是爲的要深入大衆，接近大衆。這基礎正築在許多大衆，還在希望真命天子，還看不到自己歷史的任務，而必須加以教育這一點上。大衆語文學在這教育的意義上，才把前項所說的落後大衆與前進大

衆意識底衝突，（也就是落後大衆意識與歷史的進展間底矛盾）統一起來了。就是大衆語文學底建設者，是以生產大衆爲其對象，以前進的大衆意識爲作品的內容，用大衆所活用的語言而從事創作。但在這前提下，立刻又發生了一種矛盾。就是在非大衆本身的「特殊者羣」——如現在提出大衆語文學的作家們——負担起現階段的大衆語文學建設任務的時候，如何能使語言大衆化呢。換句話，這些「特殊者羣」，大都爲他們自身階級所決定，比較是便於運用五四式（或買辦式）的白話的。要他們更進一步創造大衆語，是不可能的，卽使勉强要裝場面，硬把語言弄成大衆化：其流弊所至，反把那些浮動的容易接受的非生產大衆駡街的語詞盡量地吸取了。這現象，在現階段中國較進步的作品裏，已顯著揮發出來。記得文學月報裏，曾經登載過一首屬讀書雜誌派長詩，魯迅先生曾加以指摘。而產生這一詩篇底實際原因，却在這點上。

問題一開展到這里，覺得大衆語文學底建設根本有個矛盾，似乎不大可能的了

。但這可不然。要解決這個矛盾，方法是有的。那就是作家底實踐問題。就是參加到生產大衆中去一同生活的問題。祇有在實踐中，能增加作品裏大衆的語彙；祇有在實踐中，能削弱大衆間對於封建殘餘觀念底擁護。能在作品中增加了大衆語彙，那就是能把作品和大衆發生了關係，盡了教育的任務；同時，能削弱大衆間封建殘餘底觀念，那麼再透過作品，就很容易引起大衆來作反封建以及反帝的運動，而展開了另一個場面。（反帝應與反封建相聯結的。因爲在現階段中國的封建勢力，實在是帝國主義爲便利其本身侵略而扶植起來的。）那時候不特文言復興運動，失掉了它的根据——基礎，即買辦式的白話，也自然而然地淘汰了。然而大衆語文學，一進展到那時候，其自身又必須與伏赫變了。新出來的，應是「什麼」文學了吧。

當然，這一過程，決不如上所說那麼機械和單純。大衆語文學的建設，必需有其他的動力，就是社會變革中的主要動力。那不是這短文所能詳盡述及，就止於此了。

我底結論是這樣：在大衆語文學建設過程中：落後大衆意識和歷史的進展間底衝突，是可用教育這一意義給予以統一。而現階段非大衆出身之作家們其所固有的便於運用的語言，和大衆語間底矛盾，是可以實踐給以統一的。而實踐呢，是能統一一切問題中之矛盾的。

大衆語文運動之路

陶知行

胡愈之先生所下之大衆語之解釋很好，我想提出兩個字的修正。大衆語是代表大衆前進意識的話語。大衆文是代表前進意識的文字。

大衆語與大衆文必須合一：在程度上合一，在需要上合一，在意識上合一。

大衆語文適合大衆的程度，需要和意識時，在大衆本身所起的反應是高興。所以大衆語文是大衆高興說，高興聽，高興寫，高興看的語言文字。這高興的境界便

是藝術的境界。

一個月前，我從一家電影公司裏，借得一捲電影片子，送到鄉下去公映。我們想在公映前幾天教農人讀說明書。這說明書雖是用白話文寫的，但是鄉下小先生不會教，農人也讀不來。我只好重新寫一篇說明書來教大家。這工作是不容易。我一連換了幾次稿才勉强寫成。據小先生說，我最後寫成的說明書，還嫌太深。但比了電影公司的原稿已淺了十倍也不止。這個例子說明現在通行的白話文只是把文言文的「之乎者也」換了「的嗎啊呀」，夾了一些外國文法和一些少爺小姐新士大夫的意識造成的。這種白話文，寫起來，大衆看不懂，讀起來大衆聽不懂。我們可以看出在中國的文學運動裏是有一個大黑幕：白話文不與大衆語合一。

大衆是過着符號貧窮的生活，但是他們需要符號是鐵打的事實。老太婆用繩結記賬。農夫剝樹皮抒情。野孩子寫王八旦罵人。民衆學校學生用注音字母代替他所不會寫的字。這種需要更可以用一個故事來說明。從前有一位婦人寄了一封信給她

的丈夫，丈夫打開一看，紙上畫的是：

「一個單圈，一個雙圈，一個圓圈，一個破圈，一連許多圈。」

丈夫看不懂。一位聰明人把他夫人所畫的圈中秘密指點他說：

「欲待相思無從寄，畫幾個圈兒替。單圈兒是我。雙圈兒是你。圓圈兒是團圓。破圈兒是別離。還有說不盡的心思，把一路的圈兒圈到底。」

這些例子指示出大衆的生活中是有一個大缺憾。大衆沒有取得夠用的思想的符號，情感的符號，行動的符號：總而言之，沒有取得充分的生活的符號。大衆的符號是和大餅一樣的貧乏。剝削大衆的大餅的人是同時獨佔了大衆生活所需要的符號。

照這樣看來，大衆語文運動是有兩條大路可走：

一智識分子參加大衆生活，在大衆語演進的基礎上努力寫作語文合一的大衆文；

二將生活符號普及於大衆，使大衆自己創造出語文合一的大衆文。

智識分子要想寫大衆文必須先學大衆語。他必須拜大衆做老師。不够！他必須鑽進大衆的生活裏去與大衆共生活共甘苦。他必須是大衆隊伍裏的一位戰士。等他自己的生活與大衆的生活打成一片，然後他纔能領略大衆生活之酸甜苦辣；然後他寫大衆便是寫自己，寫自己便是寫大衆。如果他不屑拜大衆做老師，不肯在大衆的隊伍裏成一個小兵，他決寫不出好的大衆文。

拿什麼符號來向大衆普及？漢字呢？注音字母呢？拼音文呢？我的建議是三管齊下：漢字要教，注音字母要教，用注音字母拼成大衆文更要教。

漢文是士大夫的法寶，大衆必須認得這法寶，纔能看破士大夫的神秘。能教漢字的人有八千萬。漢字的本身雖難學，但是能教這符號的人如此之多是推廣運動的一個大便利。我以爲漢字只要認得就够了。幫助大衆認識漢字的一個方法，便是注音字母。大衆學會注音字母便可以自動去用字典，認生字，追求新知識。但是我們

不能停頓在這裏。我們必須立刻教導大衆運用注音字母去記錄自己的思想情感行動。我們必須立刻教導大衆運用字母去寫大衆文。我們教漢文的目的在使大衆認識那被漢文包圍的中國；我們教字母的目的，小而言之在幫助多識漢字，大而言之在用秋蟬脫殼之方法創造拚音字來代替漢字，以產生拚音的大衆文。

我們做普及文字符號的工作時應當連帶提倡俗寫簡筆漢字，印寫字體合一，字母正草合一，以節省學習之時間精力。

中小學校及民衆學校之學生都該做起小先生來，每人至少教兩個不識字的人。這樣一來，我們便有一千多萬有組織的分子來負起普及符號之重任。再加上八千萬識字民衆之進一步之培養及總動員，數年之間，必可使大衆取得他們生活所必需的符號。

大衆得到符號便能將自己的生活，深刻的描寫出來。大衆的隊伍裏自有文藝的天才。他們自然而然的會產出第一流的大衆文。

我們把文字符號傳給大衆的時候要做一番「濾清」的工作。我們要把時代落伍的意識濾掉，要把麻醉的毒質濾掉，要把古典濾掉，要把洋文法濾掉。我們獻給大衆的符號是要和沒有微生物的清水一樣。大衆得了這種清水的符號便能自由的，毫無成見的，寫出眞正的大衆文。

我想指出大衆語必以一種活的語言爲基礎。中國四分之三的人能懂的活的語言便是濾過的北平話。北平話又最好聽；好聽，人就願意學。因此，北平話實有成爲大衆語之主要成分之資格。但大衆語應當胆量大。凡與大衆前進生活有親切關係之各地土語，甚至於外國話都可儘量吸收。我們也不必懸一抽象的主觀的標準，勉强加以去取。讓大衆自己去選擇好了。不合前進大衆的口味的必歸天然淘汰，用不着我們過慮。

抱有前進意識之大衆要領導意識落後之大衆把自己的生活提高起來：把程度提高，把需要，把意識提高。這樣，大衆語便能繼續不斷的提高，大衆文也就跟着牠

繼續不斷的提高了。

「大衆語」底建設問題

任白戈

目前，又有人提出『大衆語』這個名詞來作爲問題了。也許有些人會覺得生疏認爲很可以不必要的吧，然而，我却覺得這個問題在目前提出實在是有最大的意義和必要的。中國的語言，一向就和大衆離得很遠，古老的文言，固然不必待說；就是經過一番革命來的白話，現在亦與大衆沒有什麼關係，早已變成所謂新文言了。現在的大衆是不能不要自己底語言的。所以『大衆語』這個名詞便被提出而成爲問題了。這是主要的一點；其次，目前突然有種文言復活的趨勢，過去曾經和它決了勝負的白話及其所有者早就失掉了戰鬥的作用，要克服它只有由現在的大衆以自己底語言來完成。所以目前必須趕快建設起大衆底『大衆語』來，這是第二點。只

要是一個不必使大衆完全變成盲啞聾瞎的人，我相信必定會贊成這個問題之提出的。

（一）什麼叫做「大衆語」？

這個問題，本來在過去老早就有人提出過了，然而常常總是只被作為問題中的問題提出，雖然經過多次的討論終於還是沒有達到一圓滿的結論。而且，好像是受了「大衆」這兩個使人胆戰心驚的字所累，從來就沒有一直讓討論好好地發展下去過，卽使匆促地得出一點結論也只是原則上的原則，實際上並沒有發生過什麼作用。所以，一直到現在，就連「大衆語」這個名詞都還沒有一個普遍地確適的定義，甚至於連這個名詞底本身都還沒有普遍地成立起來。什麼叫做「大衆語」呢？所謂「大衆語」究竟是怎樣的一種語言呢？我們首先就必得將這些問題弄清楚。

很明顯地，這個名詞是由文言——白話聯繫而來的。它雖然是隨着文言——白話之後產生的一種語言，但它必然是超過文言和白話的一種較高級的語言。每一種

語言都有它所代表的具體所有者，而它底內含的意義便由這個具體的所有者來規定。文言是貴族階級底語言，白話是市民社會底語言，這是在「五四」時代底「文學革命」當中分劃得很清楚的。那末，現在的所謂「大衆語」，自然是市民社會以下的成千累萬的大衆底語言了。這種語言，必然是爲大衆所有，爲大衆所需，爲大衆所用。卽是說，這種語言，必然是拿來爲大衆服務而且很適宜於爲大衆服務的，如果再換一句話反轉來說，那「大衆語」就是一種拿來傳達大衆底思想與情感而且很適宜於傳達大衆底思想與情感的語言。更具體地說，就是一種使大衆寫得出，看得懂，讀得出，聽得懂的語言。

(二)爲什麼要建設「大衆語」？

從此看來，我們可以說現在一般流行的語言是和「大衆語」離得很遠的。要達到標準的「大衆語」，至少我們還得做一番建設的工作。這理由非常簡單而明白：中國的大衆，一向是沒有受教育的機會和可能的，他們大多數連西瓜那樣大的字都

不能識上一擔，其知識之淺陋更可想而知了。又加以地方閉塞，交通不便，語言複雜分歧到了萬分，有的甚至連同省的人都不通語言。在這樣的情形當中，我們是不能要求在一切大衆底現有的語言當中很快地就自然發展出一種標準的「大衆語」的。同時，因爲大衆急需取得他們精神上的武器來解放自己和整個世界，事實上又不能不急需取得一種可以傳達新的思想與情感的語言去戰勝那種傳達舊的思想與情感的語言，這却須得馬上就有我們所說的「大衆語」出來供給他們應用。目前是大衆吶喊的時候了，我們應該幫助他們底嘴巴首先解放。自然，我們不能夠說大衆沒有嘴巴，完全和語言脫離了關係。事實上，亦有許多所謂大衆的讀物在大衆之間流行，例如最低級的小說（七俠五義，說唐，征東傳，岳傳，施公案，彭公案……等）時事小調唱本以及連環圖畫，等等。不過，這些讀物，正因爲不是由大衆自己底語言傳達大衆自己底思想與情感，往往倒是由大衆學得了這種語言去接受了它所傳的思想與情感，所以愈是深入大衆反而愈是束縛毒害大衆的，結果只有使大衆愈是愚

豪和苦痛。言語是不能和意識分開的，要獲得新的意識首先就要獲得新的語言。爲了使大衆能够獲得新的意識，我們亦必須爲大衆建設一種能夠獲得新的意識的語言。所以，目前「大衆語」底建設是異常必要而且迫切。我們目前主要的工作，就是建設起大衆底「大衆語」向一切反動的語言進攻，消滅一切語言底隔閡，一直到語言底統一使語言完全成爲大衆的。

(三)「大衆語」底建設是可能的嗎？

但是有許多人認爲要建設像這樣的一種「大衆語」實在很困難，也許竟是不可能。困難自然是很困難的，天地間並沒有一件並不困難的事業，但如果要認爲不可能却就有商議的餘地了。有的說，這是可能的，而且大衆自己早已開始建設起來了，例如在五方雜處的大都市裏面，在現代化的工廠裏面，他們的言語事實上已經在產生着一種中國的普通話（不是官僚的所謂國語），它容納許多地方的土話，消解各種土話的偏僻性質，並且接受外國的字眼，創造着現代政治技術等等新的術語

。這種大都市裏，各省人用來互相談話，演講，讀書的普通話，才是眞正現代中國話，這和智識份子的新文言不同 。 有的說，像這樣描寫得活龍活現的『眞正的現代中國話』事實上並不存在，而且舉出實例說就是五方雜處的大都市的上海工人亦沒有一種通用的普通話，在他們中間流行着至少三種形式的普通話，不過並未說出建設「大衆語」之不可能。也許有人還會說，要建設像這樣的一種標準的『大衆語』在事實上是根本不可能的。然而在我，却要十分之十地說有十分之十的可能。即以五方雜處的大都市的上海工人眞的沒有一種通用的普通話而在他們中間流行着至少三種形式的「普通話」來說，亦可見得這是完全可能的，既然是五方雜處的不知道有若干種語言的工人都已經只有兩三種『普通話』在他們中間流行着了，爲什麼這兩三種「普通話」不能再融合統一成爲一種共通的普通話呢？即是說，這些各種各樣的不同的語言，表面上看起來好像是『大衆語』建設底障礙，然而其實正是『大衆語』建設底基礎。語言是有它自己底歷史的發展和社會的根據的，我們不能任

意憑空將它造出硬栽在大衆底口裏叫他們說出。我們決不能認爲要沒有各種各樣的不同的語言才能建設起一個同一的共通的「大衆語」。反之，倒正是因爲語言有了各種各樣的不同才需要建設起一個同一的共通的「大衆語」，倒正是因爲有了各種各樣的不同的語言才能夠建設起一個同一的共通的「大衆語」。而且，事實上亦是可能的。語言雖然可以說是一種符號，但這種符號和那抽象的或只是代表一些數目的數學底符號不同。它是含有具體的內容的，而這種具體的內容往往規定它底發展和變革乃至創造，它是隨着內容底發展而發展，它是隨着內容底變革而變革，現代的社會，無論在生活上或意識上都將分離的大衆結合統一起來了。他們經驗着同一的生活，他們形成着同一的意識，他們遍處着同一的環境。即是說，他們底一切所見，所聞，所感，所思都是同一的。如果語言是代表人們底思想與情感的符號和傳達思想與情感的工具，那末這樣同一的大衆便必會說出同一的語言，建設起一種同一的共通的「大衆語」。也許這條道路走起來有點困難，但決不能因有一點困難就

說無路可走而竟至不走。只要努力地開着足步走去終於會達到目的。譬如說，在五卅以前，上海的工人很少有知道「罷工」「示威」這些名詞的，到現在可以說誰都會掛在口邊了，這便是由於生活環境的影響和需要使大衆接受了一些新字，構成共通的語言底明證。誰能夠說「大衆語」底建設是不可能的呢？

(四)怎樣建設「大衆語」？

既然「大衆語」底建設是可能的了，那末緊接着來的問題就是怎樣建設的問題，怎樣去建設「大衆語」呢？

首先，我們得決定「大衆語」究竟是怎樣的一種語言或具備怎樣的條件。

自然，正和前面所說，「大衆語」就是一種使大家寫得出、看得懂，讀得出，聽得懂的一種語言。不過要做到這種境地很不容易，至少必須做到下列幾點：

第一，必須拋棄和排斥那些含有毒素的反動的貴族的死去了的言語，批判地接受和採用一般說着現實的具有進步性的新的語言。語言一定有它底一定的內容的，

我們一定要關聯着社會意識去檢閱過它底內容包含着舊的遺質有多少和新的生機有多少之後才來決定接受和採用。我們可以滲加些新的東西進去改革舊的，我們亦可以抉取些舊的東西出來創造新的，但主要的是必須是能正確地傳達大衆底正確的思想和情感的語言。

第二，必須是統一了言文的一種語言，這樣也就將寫，看，讀，聽聯在一起而成為一種既寫得出，又看得懂，既讀得出，又聽得懂的語言，以後再沒有什麽聽的語言和讀的語言的區分了。自然，語言和文字，在現在究竟是方式不同的傳達思想與情感的工具，有時為了工具本身限制總難免有種差異：例如語言可以用聲調手勢等等來作幫襯而文字可以用標點和圖表等等來作幫襯，兩者不能做到完全機械的同一。但這點差異正如說話時的聲調底高下和文字中的圖表底繁簡也會有時不同一樣；只是一種同一工具所有的差異，決不會妨礙了語文的同一或統一。必須做到這種境地，語言才會簡便經濟起來而為大衆所有，不然大衆是無法獲得的，結果仍然會

白話之變爲新文言一樣，至今還與大衆離得很遠。這當然不能說是「大衆語」，亦不能成爲「大衆語」。

第三，要是直白的和現實的。一般的大衆都很少有時間過一種精神的生活或作一種觀念的游戲，他們缺乏緻密的思維和丰富的想像，只有他們所經驗着的實際生活能使他們特別明瞭感動，而且他們也沒有什麼可以隱諱或掩飾的，所以對於他們必須要是說得現實，直白中肯的話才容易使他們接受和愛好，一種不爲大衆所愛好的語言決不能爲「大衆語」而且也不能很滑稽的稱爲「大衆語」。

第四，要單純，明確，簡短。這里所說的單純簡短，自然是對那種複雜和冗長的語言說的，並不是簡單的意思。卽是說，一切不必要的複雜冗長的文法文句都應該拋棄。有許多複雜的文句，在外國底語言中因爲文法底周備和整齊本來是一眼就可看淸的，正如數學中的括弧一樣。但中國底語言，因爲文法和組織的不好卻不能這樣了。近幾年大家都在叫譯文看不懂，其原因就在翻譯者將外國底文字依着原有

的文法和組織生生地直譯過來。所以，大衆所能接受和愛好的語言一定是單純，明確，簡短的語言。如果用一句術語來說，那就是一種以最小限度的話收最大限度的效果的語言。這也就是「大衆語」底長處和特點。

第五，要通俗化。所謂通俗化，亦可以說就是大衆化的意思。「大衆語」當然要大衆化，這還成什麽問題呢？不過，我們應該具體地說，所謂通俗化就是說這種語言應該隨着大衆底程度建設，提高，主要的條件是要與大衆底理解相適應，決不能超過大衆底理解程度使大衆不懂。而且，更主要的是使一切大衆都要理解使用，不只是爲那一部分大衆所理解和使用。不過，我們同時要反對故意將語言降低到失掉了進步性的程度去迎合一般落後的大衆低級趣味。卽是說，我們一方面主張語言通俗化一方面又反對將語言轉化成爲低級的言語。因爲那種語言決不能爲進步的大衆服務，決不能代表大衆語言而成爲眞正的「大衆語」。

這不過大體地說說，如果要周納備至地列舉出來那恐怕還有很多很多。接着明

題還是怎樣去建設「大衆語」呢？

第一，目前的大衆還沒有能力來建設自己的語言，這種工作便留在一般進步的肯為大衆服務的智識份子身上。自然，這建設底原動力仍然是在大衆自身底發展，不過一種意識的完成和行動的推進卻必須大衆自身以外的助力，一般進步的肯為大衆服務的智識份子，必須走入大衆當中去體驗他們底生活，通曉他們底語言，學得他們底視聽，採取他們底有最大的同一性的語言來加以分析，揚棄，研究，組織，建設成為一種最低限度的「大衆語」，然後再對它加以充實，提高使其發展到標準的「大衆語」的境地。

第二，利用一切同樣的方式或形式去和那些大衆所愛讀和聽的最低級的故事演義小說，時事小調唱本，落後思想和反動意識最濃厚的戲曲，說書，灘黃，宣卷等等對抗，同時就在這對抗之中建設起大衆所愛讀和聽的「大衆語」。

第三，舉行普遍地廣大的「大衆語」宣傳，創辦通俗的大衆雜誌，以一部分作

為研究討論「大衆語」底建設問題，以一部分作為教育大衆的篇幅。並發起組織一種機關來研究中國俗語底文法，句法，性質等來作為建設「大衆語」的原料。

第四，提高大衆底文化水準。中國底大衆是很少有機會受教育的，要提高他們底文化水準，我們應該普遍地組織大衆讀書班和大衆通信乃至起碼的識字運動，文化水準不提高到相當的程度，「大衆語」是不容易建設起來的，這一點，看起來好像是與「大衆語」運動離得較遠一點，然而其實是最基礎而又迫切的工作。

「大衆語」底建設，在目前，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運動，也是一個偉大的艱苦的運動，必須要盡可能的努力，才能不至於如過去那樣半途夭折，必須要很鄭重認真地刻苦地開始工作方能達到成功的目的。一切進步的肯為大衆服務的智識份子都應該向這方面進軍。

大衆語與白話是不是對立的？

姚・炳・颺・

——大衆語的形式，內容，與標準——

關於建設大衆語的討論，現在顯然已經走上歧路。

自陳子展先生的「文言——白話——大衆語」這樣的標題露佈以來，有許多人就按照這個順序解釋爲：「白話與文言是對立的」，同時「大衆語與白話又是對立的」（如申報讀書問答，和申報本埠增刊的垢佛君）這究竟是合理的解釋嗎？

在未下斷語之前，我們且先就那橫在這個問題的前面的另一個問題加以一番說明。這問題是「文」和「話」的關係的問題。

爲什麼我們要反對文言呢？主要的原因，便因爲文言脫離了話的範圍，爲什麼我們又反對白話呢？原因是現在「用筆寫的」白話已經又重新踏入文言的覆轍，而脫離了話的範圍。

「用筆寫的」白話固然重行「文」化，可是「用嘴說的」白話，卻不見得也都「文」化了。（雖然少數智識份子往往咬文嚼字地賣弄斯文）所以「白話文」儘管

如何的「文」化，可是「白話」却依舊是能說，能聽，能看的「話」，反對白話，應該首先認清「白話文」與「白話」是不同的。

白話與白話文既然不同，那末我們反對的目標，應該是「白話文」，而不是白話。弄清了這個關係，現在就請進一步來看一看「大衆語與白話是不是對立的」？簡單地說，如果我們所反對的是文話不一致的「文」，那末對於文話一致的白「話」，（用嘴說的）我們就無法反對，所以在這種情形之下，白話和大衆語不是對立的，因為大衆語本身也就是用嘴說的話。

在邏輯上，這樣說固然沒有錯誤；然而在事實上，問題却又不是這樣簡單的。問題的核心，不在於「用嘴說的」白話與大衆語，在「話」的方面有若干不同；問題的核心却在於白話與大衆話的「社會的意義」上的不同。

白話（不是白話文）在封建制度社會裏，牠所代表的意識是封建的。可是等到社會制度，由封建的而走入資本主義的，於是牠所代表的意識也就跟着逐漸資本主

義化了。這種情形，並不是說，在封建制度的社會裏，一切社會階層所說的話都是百分之百的代表着封建意識；恰恰相反，在這些社會階層中的進步的階層裏，却孕育着一種代表新興意識的新興語言。

以今日的中國而論，代表着殘存的封建意識的遺老遺少們，雖然竭力想復興文言，無如這個半殖民地的社會所包羅的階層却是太多，他們無法來「統制」。買辦階級和部份的智識份子雖然也是竭力地提倡其藍青官話式的白話文，然而與他們在社會關係上剛剛站在相反的地位的「大衆」，却不喜歡他們這種東西。他們所喜歡的是代表着他們自己的社會意識的語言，這種語言，在形式上仍然是白話，但在內容上，是大衆語。

所以，在這裏，白話和大衆語文顯現爲對立的了。

「讀書問答」的編者提出了白話與大衆語是對立的，又是統一的，（這一點我們非常欽佩）然而在具體的說明上，他却沒有交割清楚。

白話與大衆語在形式上（卽在兩者同是「話」的意義上）是統一的，然而在內容上（卽一個是代表着少數知識階級的，另一個是代表着大衆的意識的）意義上兩者却是對立的。

明瞭了這一點，現在再請進一步解決大衆語的標準語問題。

中國的象形字早晚必須廢除，這是任何語言學家都同意的。不過廢除的時期應否在提倡大衆語的目前，則是一個非經過詳密討論不可的問題。然而不論是象形字抑或是拚音字，這只是中國文字形式上改革的問題。這與提倡大衆話的實質意義，關係殊少。採用北平話，採用普通話，採用輪船火車上流行的江湖話……所有這些主張，都只是看見了大衆語的形式，而忽略了大衆語的燦爛的內容。他們只看見了問題的一面，却沒有全般地考慮過。

相反地，如果以爲各地的農民，產業勞動者，小販，小市民等等的語言都能够拿來作標準的大衆語，那也是一樣地錯誤。這錯誤不只在於各地方言不同，很難確

認一種作標準語，同時，各個階層用語之不同，也是一個很難的問題。農民層人數雖「衆」，然而因爲生活條件的落後以及組織的散漫，絕不能用來作標準語，所以如果選擇一個人數又衆，語言的組織很進步的階層，那必然要歸着於產業的，交通的以及各方面的勞動者。然而要切記，這只是「標準的大衆語」，而不是廣汎意義的「大衆語」。廣汎意義的大衆語應該是一切大衆的語言，不論其爲農村的或都市的，農民的或工人的，甲地的或乙地的，……都是。

在具體的大衆文學創作上，只有廣汎的大衆語而無標準的大衆語，則無法統一認識。相反，如果只有標準的大衆語而忽略了各方面的大衆語言，其結果，（在短時間）也將失之太專。

以上是我個人的意見，是否正確，敬請賢者指教。

爲「大衆語問題」答司馬疵先生

申報讀書問答

司馬斑先生在中華日報副刊動向上寫了一篇「形式與內容」，對於我們所大發表的，「怎樣建設大衆語文學」一文，順便提出了一點不同的意見。他認爲「建設大衆語是反古文的同時是反官僚買辦的白話的那樣地把大衆語和白話對立起來，未免輕率，或者未免機械。（王綱先生語—載同日動向上「建設大衆語並不反對白話」）對於這，我們實在不敢苟同，司馬先生不僅不曾看懂我們的文章，且忽視了這問題在現階段提出來的特殊意義，無意中有取消這運動的危險。

我們早感到：在「怎樣建設大衆語文學」一文中，對於「反白話」一語，稍嫌籠統了，—其實在這裏已經提到，我們的反白話，是反官僚買辦的白話，不過因篇幅限制沒有詳細的說明罷了！爲了補足這一缺陷，所以便產生了「再談建設大衆語文學，」給了第一篇文章一個補充，替「反白話」的「反字」下了一番明明白白的解釋，—決不如司馬先生所說是修正—我們說：我們反對「白話」是爲了進一步反對「古文」，爲了進一步保障獲取「言文一致」的勝利，……反對白話並不容否認

白話運動在整個語文運動中所成就的那一部份，我們又說：「在白話與大衆語對立的發展中，大衆語愈漸成長，則紳士買辦的白話文愈顯出衰弱，愈暴露出它的反動性，如果我們否認白話文中大衆語的存在及發展，便無異否認整個語言運動，甚至文化運動的意義。」難道這還不够說明「反白話」與「反古文」不同之處嗎？王任叔先生指出這裏的「反」，是一種自身的揚棄與調整！七月三日自由談一篇叫做「奧伏赫變。」這，當然我們也懂得。但王先生一方面不了解「奧伏赫變」也含有「反」的意思，另一方面看不清我們第二篇文章，雖然沒有提出「奧伏赫變」這個字，却處處是「奧伏赫變，」我們不提出這個字來，是因我們極力避免使用爲我們的讀者所看不懂的辭句。王先生認識這個字，却不認識這個字的內容，於是便發現什麼似地替我們加了一點「區別」；可惜的是那區別等於「馬上駝驢」。我們想：司馬斑先生大約不致於如王先生那樣的「輕率」，假如司馬斑先生整整地讀完了我們前後兩篇文章而且讀懂了，那末，顯然的，我們與司馬斑先生之間，便不是文字上

的誤會，不是「咬文嚼字」的問題，而是對於這問題的認識問題。這「問題的嚴重」，更是「進行討論」了。

司馬純先生是根本不承認大衆語與白話間的矛盾的。他的不承認，是因爲他認爲「牠—白話—的反動性，是在牠的內容而不在牠的形式」，結果忽視了形式，認爲：雖然她這種形式歐化氣太重，而且夾雜了一些「文言」，以致脫離了大部份的「大衆」，不要緊，還有許多人，在牠的影響下。這是多麼危險的立論！他不明白形式與內容的統一，不明白這裏所指的「大衆」，是前進的「大衆」，他恰恰走向「修正」的歧途，無形中取消了這一運動的意義。

誰都知道，語言運動，是配合着整個文化運動，（包括政治經濟等）而來的。就整個文化運動說，目前反帝反封建的文化運動，是不是僅因爲「五四」時代的「不夠」「不徹底」，而來一下「糾正」呢？顯然不是的！「五四」時代的新皆們，一方面因爲自身力量的薄弱，負不起這兩重任務，另一方面，因爲大衆文化的愈漸成

長，而愈使他們不安，便愈暴露他們的反動性，於是他們不得「不撤底」，且日益向帝國主義封建勢力投降，不僅是「不够」，而且在阻礙新文化運動向前發展。試問目前企圖「復古」者是誰？提倡「讀經尊孔」者是誰？我們總不致看不見那些五四時代的新貴吧。在目前新文化運動的任務中，如果否認了反那些新貴們，（也叫做「遺老」）的任務，我們還有什麼話說？我們還談些什麼反帝反封建？司馬疵先生為什麼連這「大前提也不去認識清楚？

假使照司馬疵先生的話，白話雖然「脫離了大部份大衆」也不要緊，「他的反動性是在牠的內容，不在牠的形式」，以致「只要看我們用甚麼內容來用這種形式，」那我們目前為什麼還要提出建設大衆語問題呢？我們又怎樣去解釋，汪懋祖之「古文復興」是與整個復古運動相關聯的呢？試問，離開大衆也不要緊，還有什麼要緊的呢？司馬疵先生注意內容是對的，但因注意內容而完全忽視形式，於是連所謂內容，也弄成神秘的東西，不僅否認了目前大衆語運動，連自「五四」後，整個

語文運動的發展及成就，也否認了，這是多麼嚴重的錯誤，豈但輕率？

退一步說，即使司馬班先生要批評我們提出「反白話」，是因爲怕混亂戰綫，減削自身的力量，也還是不對的，司馬班先生僅「看到個人，而不看到整體」，見到量，而不見到質。在每一個運動中，我們最主要的，是建立整體統一的堅固陣綫，怎樣建立呢？就是要注意量與質的同時發展，要吸收新的，同時要排洩腐舊的。單爲了保持質的好看，而容留許多腐舊的份子在整體內，不但不足制止陣綫的混亂，且有使整體全般腐化的危險。這是「機會」意識的作祟！試問那些「五四」時代的遺老—在那裏提倡「語錄體」，「洋八股」，以至「考古」之羣，是不是應該「反對」呢？而陳望道，夏丏尊葉聖陶諸先生，雖也是「五四」白話文運動的人物，却已走了大眾語運動的陣營內，還能與那些遺老並論嗎？

以上，也許司馬班先生看了又要以爲是「咬文嚼字」，「混亂陣綫」，其實，我們絕無此意，我們以爲如要使這一大眾語運動得出正確的結論，便不能不把這一

運動的意義弄清楚，我們於是便不能不再提出來一談了。

大衆語與大衆

周木齋

由文言文白話文沉渣的泛起，迸出了大衆語的討論，這從外表看來，是辯證的展開了。

然大衆語的提出與討論，截至現在爲止，卻有如傅東華先生所說，乃是「特殊的羣」，（見六月二十八日申報自由談「大衆語問題討論的現階段及以後」），並非大衆自己，這是很明顯的。而討論的影響所及將仍然祇限於「特殊的羣」；但非大衆自己，也是可測知的。因之，所謂大衆語者，果眞由此而建設了　能否即成爲大衆的工具，又是一個疑問。

大衆語一定要大衆自己提出，自己討論，自己建設，這是再好沒有的事；然而

也是「守株待兎」的事。因爲大衆的口被堵着，手被縛着，腦被遮着，耳被塞着，不能自己發洩，也不能自己接受，但是，建設大衆語如不顧到這些，不也是守株待兎麽？且如這樣，能保將來不也變爲文言文或白話文麽？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

爲避免命定的流弊，則在建設以前，有幾點是須加注意的。首先：「大衆」的範圍，應不怕擴大；否則相應而建設的大衆語，縱有可觀，但祇是白話文的另一形式，祇是「特殊的羣」的工具，而與大衆漠不相關。其次，大衆語的建設，一方面須從建設大衆語者與大衆的密接中得來。這點已經有人說過：反之，另一方面，最要緊的，是在使大衆能與建設中的大衆語密接起來，更進而成爲他們的工具。兩者都非單獨的文字的問題，後者尤甚。

又次，大衆語不是和文言文白話文爭統，只看作爲鬭爭的表現於語文。過去文言文與白話文的鬭爭，是「文統」的鬭爭，文白連環，永無了期。今後，白話文將藉大衆語而毀滅文言文，但白話文也將隨文言文的毀滅而粉碎於大衆語的前面。然

這必須大衆語眞正成爲大衆的工具，纔是文言文白話文鬥爭告終的時候，纔是文言文白話文同歸於盡的時候。

大衆語論戰中的幾個成問題的問題

張庚

大衆語的問題，已由討論入了論爭的地步，綜合過去的討論，我們可得大家都同意的幾點，那是：

1、大衆語是大衆能說，能聽，能讀的語文；

2、大衆語是代表進步大衆的意識；

3、大衆語不模稜兩可，却清楚明白；

這是它底特性一方面，附帶的還有：

4、大衆語應從大衆中去學習；

5、要推行大眾語，必須逐漸廢除方塊字，採用拼音字。

然而成爲紛爭焦點的，也有許多問題：

1、大眾語反白話與否的問題；

2、土語方言採用問題；

3、北平話能否做大眾語的基礎部份的問題。

現在我們對於這些問題，也一個個加以申述罷。

第一，白話問題：這是以申報讀書問答和司馬班先生，以及申報談言和王鋼先生二組爭論爲中心的。關於後一組，因爲申報談言上並沒有若何反駁，而家榕先生在七月七日中華日報「專刊」上的答辯，實在就是全部接受王鋼先生的批判，所以這一組就表過不提。所必須申論的是申報讀書問答和司馬班先生這一組。雙方的理論中心，約述如下：

讀書問答以爲白話是官僚買辦語，先前雖也反古文，指出了『語文一致』的必

要，但目下卻比古文更難懂，阻礙了語言運動底進展，所以必須反對，可是卻和「反」古文的「反」不同，這只是：「反對白話之離開大衆」，而另一方面，卻「不能不批判地接受白話中那接近大衆語的一切」的。

司馬捉先生卻以爲白話文的反動性只在其內容，與形式無關，所以形式大可利用。因爲如果放棄白話底利用，結果便成了向「敵人繳械」。所以即使形式歐化，甚至夾雜了些文言，可是因爲有學生，小市民能懂，仍是不能放棄的。

全般看來，司馬捉先生不能不說是有態度上的錯誤，而讀書問答方面也有些名辭用得不當的錯誤。爲什麼呢？司馬捉先生僅僅爲了獲得人口大衆之故，而無批判地接受白話文，這是如烏里頭諾夫所說，會陷於機會主義的錯誤的。我們並非跟全部白話對立，白話文運動初期的革命性我們是可以作爲遺產接受下來的，但對於目下白話底歐化，文言化，卻不能不反對。對的，我們是要完成白話運動初期未完成的任務，可是卻不能隨着白話底反動而變成反動。在這裏，我們應當向人們指明白

話如何沒有而且不能完成語言革命運動，指明它如何變成反動；並且指出白話運動原來的任務如何落在大衆語運動上，而且如何只有大衆語運動才能徹底完成這任務。所以我以爲「批判地接受白話中那接近大衆語的一切」是對的。

不過如讀書問答所說：「在目前新文化運動的任務中，如果否認了反那些新貴們的任務，我們還有什麽話說，還該談什麽反帝反封建」？云云，我以爲話說得太不明了。好像是把反白話和反新貴混爲一談了，新貴是單純的反動家，而白話却像前面說過的，其中有革命的成份在。反資本主義的人，並不反機械文明，這很容易明白，因爲壞處不在於機械文明，而在於工錢制度啊。

第二、土語方言的採用問題：這問題並沒有引起大的爭論，可是顯然有兩種不同的意見。如反對得最力的是魏猛克和佛朗兩先生。讀書問答也叫它做「封建社會底產物」不加重視。贊成的人很多，如耳耶，司馬疵幾位。各種意見，大致歸納如下：

贊成方面：

一、普通話語彙少，表現力不充份，必須用土語去補充；（耳耶）

二、土語是最近乎大眾的，在目前飢不擇食之時必須作爲手段而採用。（司馬瓶）

反對方面：

一、土話是落後的語言，有韻無義，一般人不了解（魏猛克）

二、土語是半封建語言，是豪紳地主維持分割的武器，如此也就是語言底障礙（佛朗）

對於耳耶先生所說一點，完全是可以同意的，不過必得加上一個條件。即當普通話的語彙表現不力，或無法表現之時，才能採用。其實，土話採用是要鄭重的，其中有許多表現充滿了落後意識如傅東華先生所舉肺病名詞一例就是。司馬瓶先生的意見，太過分了，太無批判的了。不過在某些場合，如綏拉菲木維支所說特殊表

現某種鄉土豪團氣的場合是可用的，尤其在演劇上可用。至於魏猛克先生所顧慮的，正是我們以爲必須揚棄掉的一部分，但我們得注意，土語中并不是沒有極好的表現，比方北平話中的「壓根兒」實在和知識份子口中的「根本」不相上下。佛朗先生的顧慮就更不成問題了。我們批判地採用，去了封建的成份，轉變了它底意義，它能增加革命的力量，決不會再做障礙的。

第三、採用北平話做基礎的問題。分兩種意見如左：

贊成的：

一、普遍性最大（葉嗣炳，陶知行）

二、好聽，因而人都願意學（陶知行）

反對的：

一、道地北平話懂的人不多，尤其在閩粵兩省（龍貢公）

二、北平話只是方言之一（胡繩）

從上面看來，大前提似乎各各不同。陶樂兩先生所說北平話懂的人多，好像是指北平腔，而黎胡兩先生所說明明是指北平土話。是土話，自然應當與其他土話一例看待，即批判地採用，可是北平腔我也主張用來做基礎，理由是：一，頓挫抑揚，沒有閩廣話底粗大，也沒有吳語的低平，便於聽，便於表情。二，字音區別細緻，比各地方音都清析。

再說，大衆語必須要由一個基礎去發展，不能聽其自由。因為：一，大衆中也有許多落後份子，會漸漸引壞了它；第二，由想像中的普通話去自由發展也不可能，因為普通話是「言人人殊」的南腔北調，不僅不清晰，缺乏表情要素，而且也不統一。所以我們主張用北平腔，而且附帶的，可是堅決的不主張自由放任，而主張定着計劃做。

七月七日。

大衆語・土話・拉丁化

葉籟士

大衆語問題最初是作爲一個文學上的用語問題而提出的，這樣把問題局限於文學以內的結果，不單妨礙了這個討論的發展，而且有「一場無結果」的危險的。我們在討論建設大衆語文學時，不能無視大衆教育的問題，否則我們的討論永遠是與實踐 離的空論。祇是說「接近大衆，向大衆學取，理解大衆」是不够的，必須使大衆來直接參加大衆語的集體創造，才能完成大衆語創造這一任務，只有在大衆教育之中，才能建立大衆語文學（吳午先生曾講到這點，是很對的）。

大衆語應該就是「現代中國普通話」，這個見解是對的。但是這種普通話現在還只是一種胚胎，它的具體的面貌尚未形成。中國最大多數文盲大衆，至今還用着各別的土話。所以我們當前的急務，就是首先要給與最大多數的各地文盲大衆一種簡明容易的各別的「土話文字」（以土話爲標準的書寫文字）。「土話文字」的發展，不但決不阻礙大衆語（普通話）的形成，而且提高了各地大衆的文化水準，給與他們直接參加創造大衆語的可能，促進了統一全國的大衆語的完成；所以「土話

文字」是消滅文盲的利器，非但和大衆語並行不悖，而且是大衆語創造中必要的步驟。（請參看七月二日耳耶先生的「開快車時候的備忘錄」一文中的第九節）

白話文游離大衆的原因，是在於五四發動者這一社會層本身的無力，正和他們在政治上的成就一樣，白話文在中國語言的民權革命上，也未能徹底完成它的使命。白話文在形式上承繼了封建文言文的象形方塊字，這是對封建文言文的一大妥協，一方面種下了今日「復興文言」的根源，使文言文可以喬裝了混進白話文中去，（如語錄體之類）一方面使白話文對於大衆依然是種煩難的文字。白話文語彙的貧弱，以及話文的不能一致（夏丏尊先生）也因爲象形的漢字阻止了它的發展。（今日我們口頭語中有着無數的擬聲字，但能有多少可以用漢字來表現的呢？）所以我們要創造「土話文字」和大衆語，就應該堅決地打倒象形漢字，採用拼音文字。只有如此，才能做到「大衆聽得懂，說得出，看得明白，寫得來」的地步。

關於中國語言的拼音化，過去已經有了國語統一籌備會的「注音符號」（原名

注音字母）和「國語羅馬字」。它們的最大的缺點，就是都以北平話强迫作爲標準，而要學像這種「京腔」，卽在知識份子也是非常困難的。我們只要看自政府發表以來直到現在，可會得到幾分效力？注音符號因爲不能忘情於方塊字，結果成了非驢非馬的怪物，而且不便書寫。至於國語羅馬字，因爲要嚴格區別四聲，拚法就變得非常的雜難學，據說知識分子也須一二三年才能學會，所以對於文盲大衆不用說是根本要不得的。那末在簡單易學上，蘇聯華僑創製的「拉丁化中文」（創案者是旅俄華僑文化宣傳隊所屬下的「遠東邊疆拉丁化委員會」）就要强得多。「拉丁化」不但廢去四聲，而且聲母（子音）單獨也能發音，像漢字中「文字」兩字，國語羅馬字要拚作 wentzyh，而拉丁化只作 wenz。又如「世界」兩字，前者作 Shyhjieh，後者作 Shiczie 自然要簡易得多。蘇聯的華僑以山東人佔多數，所以「拉丁化」是以山東，河北，東北一帶北方土話作標準的。它的目的在於給該處大衆以一種筆頭語，並不是用來强迫全國用作普通話的。根據拉丁化委員會的意見，中國可分做全

國凡——七個方言區，而把各區方言都拉丁化，以消滅各地的文盲。因此「拉丁化」是非常值得我們的研究和參考的，我們特別要注意的是：它不是學者書桌上的方案，而在伯力海參威一帶華僑中已是一個極廣泛的文盲大衆掃除運動了。

我上面提出的「土話文字」，預料一定會遇到許多反對和非難的。一定有人說：提倡拚音的「土話文字」會使中國分裂，「分散各地居民的文物的聯繫」，反不及文言文白話文的能統一全國。我的答覆是：漢字（不論文言文或白話文）所聯繫的是「執武器」和「搖鵝毛扇」的人，而不是大衆！漢字始終與大衆無關的！而且我在上文已說過，全國統一的大衆語和「土話文字」是並行不悖的。只有提倡「土話文字」才能促進大衆語的成長。企圖用某地土話（不論其爲北平話或是南京話）作爲標準來統一全國，終歸是徒勞的。注音符號和國語羅馬字的失敗已告訴了我們。

國語羅馬字，我曾看過一點，但是至今尚未學會。關於拉丁化的書，我只過三

種，其中一本是字典，一本可以算是文法（拚字的方法和檢字）。都是蘇聯世界語同志寄來的，也只隨便看了一下，最近又得到一本 Sinwenz（「新文字」），是拉丁化中文的課本，其中一個漢字也沒有的，但我已全部讀完了。我覺得「拉丁化」也許尚有若干小缺點，然而它既成爲一種大衆運動，一定能在實踐中得到解決的。

我贊同耳耶司馬班等先生對於「方言土話」的意見，因此在匆忙中寫了這篇文章，一方面更介紹了一點「拉丁化」。至於「拉丁化」的詳細內容，這裏無法多談，只好以後再寫了。關於討論「拉丁化」的文字，目下買得到的，恐怕只有中外書店「每月文選」第十二號「中國語書法之拉丁化」（自世界語中譯出的）一文，雖然那篇文章似乎不無獨斷之處，但爲理解「拉丁化」的理論起見應該拿來一讀的。

大衆語萬歲

——答曹聚仁討論大衆語問題的一封信——

吳稚暉

曹先生：好久沒有領教了。但是在許多刊物上常常拜讀大作，獲益亦不少。爲了文白大衆的問題，我也本想和和大家的興，插說幾句。止因近年來對於現在的一部十七史，從何說起呢！倪雲林所謂「開口便俗」，他是恐怕俗了自己，不願開口。我是明知口裏落不出象牙，無往而不俗，不敢開口。因此遇到這樣熱鬧的問題，也還到底不敢作聲。承您爲了這問題，還提到我的科工問題，到底還不曾引申先生的盛意，屢說幾句。就爲從前得了先生的教訓，說我盼望別人從事科工，自己理不科不工，這真是一針見血；從此我也就覺得刺刺不休的討厭，更加沒有可開之口。現在又蒙先生將這文白大衆的問題下問，那我就把我心中要說的寫出來，博先生一笑罷。

我總括地先說一句，文言一時難得死光，也是實在的。說他會什麽復興，再來代用白話，那是笑話。並且是鐵樹不能開花，同樣的可以肯定。汪柳諸先生他們忽然主張中學以後要側重文言，救人之意七分，衞道之意或亦有三分。因爲他們看見考試的卷子，及畢業的小世兄，實在文言太蹩脚，不適於有司之程式，那就於個人出路，完全艱難了。他們要救渡這班「出路先生」，所以望學校大開方便之門，給他們以出路的利器。這七分，是惻然悲憫，我想汪柳諸先生是胸無成見，是爲人的，決非護己的　所以衞道之三分，則見仁見智，設想不同。他們偶然感覺文言這東面，可以連帶保存得他們希望之道，比較多一點；亦如白話家或大衆語家也相信能夠連帶迷信到文體有關，況且止有三分，也可以對汪柳諸先生很原諒的。

然而文體與衞道有關，我是不大相信。說文言中有道，何以總理的三民主義，竟能把白話寫成的呢？說白話完全是道，何以白話家又常聽見擯斥某某派某某小說呢？可見得文言白話大衆語，止是工具。有容易普遍，或不容易普遍之分罷了。我

們現在的局面，如合理的分配，即以學校而言，只能五成叫他進官場，十五成叫他在學校教書，八十成望他為農工商。在中學時代，通通一百成，就要注重他的理化算數，而且要習科工，非兼習外國文不可。那末將容易的白話文，叫他能讀總理的三民主義，也就够了。到了高中，分出那二十成來，讓他兼習點合於有司程式的文言。到了大專，再讓他性之所近，去習法政文哲。其數目，也足够考試院取中，機關登庸了罷。還恐怕路是少，而要出的人太多。何必定在初中，即着眼有司程式，暗示以出路之所在，實則此路不通，社會上賸下多遺的中等流氓？故汪柳諸先生在必救人，實乃害人。汪先生是不曾進過畜生道，柳先生是同我一樣，進過畜生道的。回想那一個童生，不是四書五經，強迫了讀的？文言當然是沒有人敢對他發生問題的。然而每縣要取一二十個秀才，有幾個通順的呢？莊思緘先生常說：「考試的文章，是見得官，見不得朋友的。」比較起來，現在的中學學生，少數的也不讓當年的童生證，其出類拔萃如柳先生者，當時亦止最少少數。今日學生中也儘有柳先

生，所以不是文言才能出秀才的呀！總之，文言會成文學，白話也會成文學，大衆語當然也會成文學。但是，文言白話大衆語，有容易普遍與不容易普遍之分，當然白話比文言容易普遍，大衆語一定更比白話容易普遍。若一說到文學，恐怕文言白話大衆語，一樣的止是少數能，其實卻有司程式，及牽此等因，就算文言，也止要文言，並不要文言文學。就是白話寫得好的，也未嘗不能寫那牽此等因的文言。可惜一做文言，便馬上肉麻地要希望他懂得文學。於是文言的不通，因此而起。

這一回文白戰爭，名作如林，多數皆可佩服。弟所尤注意者有兩篇。一篇是尤墨君先生的「從中學生寫作談到大衆語」。他引浙江會考，題爲我所最敬佩的朋友，其中一則是文言，自來英雄豪傑之士云云，雖有點古文觀止氣息。然尤先生要問於日常生活有什麼用？我對曰：這叫做文學，恐怕請這位先生去辦牽此等因，未必條理很能清楚罷。因此不要獨斧文言。尤先生於還會考，又引一則白話，有古之君

子之交淡如水云云：尤先生又批評爲食新不化的白話。然而化不化的原故，亦就在那裏做文學。大家現在又要建設大衆語，打倒白話，恐怕就是白話文學鬧下來的禍罷。所以胡適之先生一方抵禦文言，叫人還要在白話文學努力。不曉得又一方面不爭氣的白話文學，做得好的，止有少數，正同文言文學，總是少數的一樣。不知不覺，人也白話文學，鬼也白話文學，也同古文觀止常册文言的台一樣。而大衆語不客氣的又來聲罪致討了。因爲在工具方面說，白話自然優於文言，因其容易普遍。然而一到文學，便爲煙癢氣，文言的好文學，如袁中郎的小品文，止供象牙塔裏人消閑 而白話文學的好的，亦不過供亭子間裏朋友排悶而已。其多數的怪物，簡直在大衆都莫名其妙，與古文觀止一樣。所以到了這裏，兄弟願意貢獻的：不要建設了大衆語，跟着便是大衆語文學。建得起大衆語文學，當然亦像胡適之先生把白話文學建成了白話，可是後頭還來一個打倒，是一定不免的。

我這回尤注意的兩篇，其又一篇便是陶知行先生的「大衆 文運動之路」。他

說：大衆語與大衆文（文是文，不是文學。文言，文言文，文言文學：白話，白話文，白話文學：大衆語，大衆語文，大衆語文學，就是大衆語將來當然的文學，讓大衆自己創造起來，不要像白話文學，還是幾個文言文學家改頭換面的代辦。）必須合一。在程度上合一，在需要上合一，在意識上合一。他主張符號是三管齊下。漢字要教，注音字母要教，用注音字母拼成大衆語更要教。我看他的意思，並要提倡俗寫及簡筆漢字。就是有時措手不及，夾點同音的別字的又是他先生所容許的。我還容許他讀字，注音符號，別字不够使用時，可以合璧成文。到大衆教育普及時，由大衆中的能者來理出一個頭緒來；等衖堂裏的癟三又需要有弄堂消閒品，再讓他們來創出大衆文學；不要又經令日的文人學士，鐵青了面孔，立文例，創語彙，好像大衆應當來受我們的欽定。看見夾了別的注音，嚴飭不許。倘若如此，也是受了傳統思想，與文言先生們的於古有之，於傳有之，也有什麼兩樣呢？文言於古有之，固屬可笑。白話先生與洋有之，必定要將「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子曰」合

紹給大衆，這就是白話要受大衆語的革命爲不可救藥的汚點。文學的天才，是很少數的，而東施效顰，就有一刻板格式，加上了桎梏。所以大衆語要鼓吹文學，是很要當心的。最好遵從陶先生的意思，讓大衆自己來創造，不要代辦。

且據兄弟猜想：陳望道先生等拿出這個大衆語的標旗來，大衆是縱的，指向多數階級說話，雖然也有意思，慢慢連到橫的方面，一人說話，可以使四百兆大衆一齊明白，然而依我臆說，恐怕陳先生起意，是不曾想一躍就到的。四百兆大衆一齊懂得的，叫統一語，不是現在第一步急需的大衆語。傢伲也有大衆，阿拉也有大衆。傢伲的大衆，把傢伲的語文合一起來。阿拉的大衆把阿拉的語文合一起來。傢伲的大衆與阿拉的大衆，有了合一的語文，又互相合一起來。一種的統一語，還讓大衆來造成，是第二步。這恐也不是烏托邦，傢伲與阿拉，現在就常常通話，傢伲亦不傢伲，阿拉亦不阿拉，自有其不正確的藍青官話。藍青官話必是將來的統一語。多帶點北平話，或亦相當，然須要應了陶先生「最好聽，願意學」才行。然而英美

的英國話，都不認恭照約克省一道同風呀。一道同風，就是欽定的反面。我國一道同風的觀念，不但入了政界，咬牢了雞巴，雞腿都挽不動，就在文學界，也是移動一毫，就要若喪考妣的傷感的。破壞統一之罪，在政界是頂大的罪名，在學界何嘗不是呢？好了，我是崇拜文學的，文言白話的文學，都崇拜的。可惜着人沒有力量，止來裝小脚，是實可臭惡的。而且因而害於爾國，兇於爾家，所以敢下斷語，以答先生明問。曰：

文學不死，大禍不止。

好了，大衆語萬歲！若大衆語文合一了，寫點粗淺的科學工藝文出來，惠及大衆的飯碗，尤其圓滿。否則知識值幾文一斤，飢不能食，寒不能衣，灌輸大家抱頭痛哭之知識，哭得大衆骨瘦如柴，什麼革命禦敵，都不辦好罷！回想前日，你不好，打倒你，我來做，你來我來，還是那末一回事。根本弱點在那裏呢，就是自己不科不工，對先生不勝其忸怩而已耳。好了，祝您健康！

弟敬恆頓首二十九日

又：閻王不曾賦我以文學天才，我是一個「放屁放屁，眞正豈有此理」的大衆，有些脫字譌句，都望原諒。現在社會眞是發昏，好好一個劉半農先生，是聲音學大家，偏要拉他算文學家，算尊重他，不曉得正是駡他，正是埋沒他，顛倒錯亂到如此，先生亦必大笑。

話跟話底分家

耳 耶

話跟文章，都是表達人底思想感情甚麼的的東西；文章，甚至於是寫出來的話。照理，除了文章，因爲受繕寫：印刷等技術上的制約，必需比較經濟，謹嚴以外，以及文章可以容許獨有的方法如標點圖表甚麼的以外，話跟文章，應該是一致的，但是現在事實上，話跟文章是這樣地不同！不但中國，世界各國的話跟文章，也很不同！它倆爲甚麼分了家的呢？這一點，現在討論「文言文」跟「白話文」的問題的先生們並未提出。

我以爲是必需提出的。

話跟文章分家的問題，其實就是話跟話分家的問題，也就是人跟人分家的問題。在這裏沒有工夫來詳細研究人跟人分家的問題，那末，就從話跟話分家說起吧。

人類社會，在最初，他們說的話，在某種程度的地域範圍以內，是一樣的。因

爲他們底生活習慣，他們底行爲，他們底觀念，沒有甚麼不同。但是在很久以前，人跟人就分了家。中國的聖賢，究竟是不凡的；譬如孟子，在幾千年以前，就把人類社會分成「勞心者」跟「勞力者」兩大類。這分法是對的。雖說現代的社會科學，有更準確的用語；但是有些人好像不很喜歡科學，那末，就用「勞心者羣」跟「勞力者羣」這不科學的話來代替吧。

所謂「勞心者羣」跟「勞力者羣」的分別，無非就是參加生產過程跟離開生產過程的分別。因爲有的參加生產過程，有的離開生產過程的兩者之間底生活習慣，就慢慢不同起來；不但行爲，就是觀念也慢慢不同起來：不消說，兩者之間底生活習慣行爲思想所需要的話，自然也跟着不同起來。時代底進化，就是說，生產工具跟生產關係底逐漸改變，兩方面的生活習慣行爲思想也以不同的發展路線逐漸改變；兩方面的話底不同程度，就逐漸增大。但這裏所說的不同，只是局部的而不是全體。他們兩者，究竟不是可以「老死不相往來」的兩個民族，他們必需交通彼此底

意見，纔能維持彼此的關係。就只這一點，也就不允許分成全然不同的兩種話。這樣一來，這不能分成全然不同的兩種的話，爲了研究，我們倒可分成三種了。一種是共同的話，其餘兩種是兩方面各自的話。換句話說，就是：勞心者羣底話等於兩方面共同的話加自己獨有的話；勞力者羣底話等於兩方面共同的話　自己獨有的話。話，就是這樣分了家，自然地。

還有一種是人工地分家。有兩個不同的「者羣」（恕我杜撰），就有不平等的事實，也就一定有不平等的觀念。換句話說，就是有尊卑貴賤的事實跟觀念。在這樣的社會，尊貴者羣，會鄙視卑賤者羣，是必然的鄙視他們底人，鄙視他們底行爲動作，決不會單獨不鄙視他們底話——他們所獨有的話，鄙視他們的話，就不說他們底話　即使非說不可的時候，也特爲找旁的話來代替。從前俄國的貴族，在他們自己底「者羣」之間，是不說俄國話而說法國話的。那原因就在於農奴們都說的俄國話。在華貴的「紗籠」裏面，如果有一個「麥歇」在一個「馬丹」

面前無意地說出了一句俄國話，那簡直是莫大的侮辱。像我們在一個小姐面前說出了兩性生殖器底最土俗的名子一樣。至於那些貴婦人們，除了在她們底奴僕面前，永遠沒有說一句俄國話的機會，這雖是極端的例子，却也是說明尊貴者羣怎樣鄙視卑賤者羣底話的最好的例子。舉一反三，我們就可知道話跟話是怎樣人工地分了家。

話跟文章底分家

耳耶

說明了話跟話底分家，再要說明話跟文章底分家，是很容易的。在分成兩個不同的「者羣」的社會，哪一個「者羣」，最願意維持現狀，因之也最需要「宣傳」，就是說：最需要寫文章，同時也最有工夫跟能力寫文章，最有機會發表文章呢？何消說，一定是勞心者羣，也就是尊貴者羣。自然，尊貴者羣跟卑賤者羣底界限，

並不是一座翻不過的山；出身卑賤的人，也常常「十年寒窗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卑賤者羣也不見得沒有人寫文章。不過，無論怎樣出身卑賤的人，只要他一開始「十年寒窗」，他就已經脫掉了卑賤者羣底特色——勞力，參加生產。生活上他已經不屬於卑賤者羣而屬於尊貴者羣了。何況他因爲要「一舉成名」，必需先丟掉卑賤者羣底意識，抓住尊貴者羣底意識，纔有辦法。意識上，他又確乎是個尊貴者羣。當然，像現代因爲產業底發達，人類知識底進步，卑賤者羣，也有人能够寫文章，並且還保持着卑賤者羣底意識的事是有的；但在往古，例如完全的封建社會，卑賤者羣如果要寫文章，必需先變成尊貴者羣，「儒林外史」上有個裁縫做詩，雖說他沒有丟掉他底職業，但是他底意識，仍是尊貴者羣的。

讀尊貴者羣寫文章的時候，究竟願意用哪一個「者羣」的話寫，能够用哪一個「者羣」底話寫呢？卑賤者羣底話，他們是鄙視的，平常連說都不說，難道還願意用那種話寫文章麼？并且因爲他們底生活習慣隔膜，他們對於卑賤者羣底話也隔膜

了；就是想用那種話寫，這隔膜也使他們不能運用。那末，剩下來的還有甚麼話呢？只有尊貴者羣底話！也只有這種話，他們願意用，能夠用。有人說，寫文章的人，從古就有很多用通俗話的，胡適底「白話文學史」上就有不少的例子。豈不好像寫文章並不一定非用尊貴者羣底話不可麼？不過，我們要知道，卑賤者羣底話，如果有時被寫文章的人採用，那動機怕是好奇，態度常常是玩笑的，游戲的，像「儻約」甚麼的就是。並且，那也不過偶一爲之，平常還是用尊貴者羣底話寫；同時，也只是個人底事，全體還是用尊貴者羣底話寫。

還有，表現某一個「者羣」底生活，意識，只有用那個「者羣」自己底話，才能恰到好處，才能體貼，刻畫到「入微」的程度；另外的話，一定會牛頭不對馬嘴。不但寫文章的人底表現問題，讀文章的人底理解問題，也很要緊。寫給某一個「者羣」讀的文章，當然要用那讀的人所屬的「者羣」底話；要是不，讀的人一定不會了解，就算了解也不會透徹。寫文章的人既然屬於尊貴者羣，他必需表現卑賤者

羣底生活，意識，以及特別寫給卑賤者羣讀的理由，是不容易找到的。自然，在一種新舊交替的時代，這樣的事實也可以有；但作爲通常的情形，尤其是初有文章的時候，文章一定是表現尊貴者羣底生活，意識，以及寫給尊貴者羣讀的。這場合，我們怎能够說，寫文章的人，會不用尊貴者羣底話呢？

但是文章雖是用尊貴者羣底話寫的，却並非只要是尊貴者羣底話，都有寫進文章的資格。也不能照尊貴者羣底話底原樣一絲不改地寫進文章裏去。第一，在紙底出現以前，寫文章要用「竹」「帛」，那够多麼麻煩；同時，印刷術沒有發明的時候，文章要傳世，不能不靠人來鈔寫，又够多麼麻煩。加以這時候的文字，恐怕比話還要簡單，一定不夠用。那末，寫出來的文章，雖說是尊貴者羣底話也一定是簡之又簡，省之又省的話。第二尊貴者羣雖然又叫勞心者羣，其實許多人是連心也不勞的；有許多人雖然勞心，却不勞在寫文章上，因此，寫文章的事，在尊貴者羣中間，也並非人人會做；倒成爲一部份人底專門技能或職業。這樣一來，那些文章職

業家一定會盡力地研究怎樣把文章寫得簡短，怎樣在話中間採取最精采部份，怎樣使文章比原有的話，表現得還圓滿，還美麗。這樣，文章就一天天跟話隔得遠了。自然，由於工業技術底進步，紙底出現跟印刷術底發明，從前認為必要條件的省簡，慢慢變成不必要了；但是文章並沒有從職業家底手裏解放出來，依舊被他們把持操縱着。他們那舊有的習慣技巧，就妨害文章跟着話底發展前進。因此話跟文章，只要一天有兩個「者羣」底對立，一天有文章職業家存在，就永久沒有一致的趨勢。

雜談讀書作文和大衆語文學

葉聖陶

稜磨先生「文言的前途」一篇文章裏的話說得非常透切，他說：「在五四時代反對白話文和在今日提倡文言文的人是不相同的：前者決不容認白話，後者只要人能寫四書五經式的白話文，一定能夠容認。只因爲要寫白話的人寫四書五經式的文

章決不可能。於是仍只有提倡文言。他們也知道復興文言文並不可能，但他們以爲至少可以勉强人讀一點古書。讀一點古書做甚麼呢？至多像他們一樣，自己陷在沒落的退潮裏，同時給前進的船隻一點輕微的阻力罷了。這是實在的情形，可是他們決不肯相信。他們的生活決定他們的意識，從他們的意識出發，去處理教育上的問題，不能不得到這樣的結論，就是把古書的內容和形式一古腦兒裝到青年的頭腦裏去。他們以爲這樣做是最合理的，否則就對不起青年。我們不想做甚麼猜測，說他們別有用意，存着不好的心腸。但是，顯然的，他們沒有理會到人是常常跟着環境而有改變的，他們沒有理會到人的生活的改變從來沒有像現今這般的迅速和劇烈，他們更沒有理會到生活有了改變，而其他應當跟着一同改變的卻依頓着沒有改變，在個人方面是多麼大的不幸。遭到這種不幸的人的實例不必到遠處去找，只要看我們自己就是，雖然他們決不肯相信。

如果他們的願望實現了，這就是說，在教育上，眞個把古書的內容和形式一古

腦兒裝到青年的頭腦裏去了，結果怎樣呢？那是很容易想到的：大部分的青年不肯放鬆現實生活，對比下來，他們覺得現實生活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立刻把被裝進頭腦裏去的丟了出來，像丟掉一個不足顧惜的爛蘋果。少數青年呢，或者因爲特殊的關係，能夠寫幾篇像今年年初本市中學會考第一名所作的「禮義廉恥國之四維論」那樣的文章。丟了出來同根本不會裝進去差不了多少，自不用說。只有寫得出第一名的文章的人給與提倡者一種安慰，然而這種安慰太微弱了。所以提倡者的失望是必然的，失望的因子就包含在他們的意識裏邊。

現今的在校青年說不定眞會遇到這樣的一天。硬被人家「裝」這麼一下。只須看一些執着武器的人都在吶喊着「裝啊！裝啊！」而一班搖着鵝毛扇的謀士也從旁響應着「裝啊！裝啊」就約略可知道一點消息。青年遇到了這樣的一天，對於古書的道理當然無所領會，古文也一定寫不通。然而這並不是青年的重大的災難，至多使學校教育成爲空白的一頁罷了。他們離開了學校，或者說，他們丟開了學校的教

訓和課業，自會從現實生活當中建立他們的意識，寫通足以表現他們的意識的文章。寫通文章，途徑只在乎讀書，這本來是很可笑的話。寫通了文章，而只像鸚鵡一般說些甚麼，這尤其是沒有意義的事。必須根源於現實生活，文章才真能寫通，寫來才真有意義。青年只要認淸這一層，即使硬被人家「裝」這麼一下，也就沒有甚麼關係，好像我們的老祖母在我們耳朶旁邊念「多心經」「大悲咒」和我們沒有甚麼關係一樣。

最近幾位先生在「自由談」提出的「大衆語文學」，該是我們現實生活當中最切用的工具。胡愈之先生更給大衆語文學下了個內容形式都包括在內的規定。說這是表達大衆意識的文學，尤其使人容易辨認。除了執着武器的以及搖着鵝毛扇的，誰不是大衆裏的一個，誰不需要大衆語文學？被除外的少數人不滿意白話文，他們要回到文言，回到讀古書，依他們的道理講是不錯的。但是大衆也不滿白話文，他們覺得白話文太空泛了，單把「的了嗎呢」換去「之乎者也」毫無意義，文學必須

眞能表達大衆的意識，才配在社會中間盡交通情意的職分。自然，大衆語文學須由大衆的努力，才得建立起來，教育家，語言學家，文學家等等尤其要特別努力。這些「家」中間有搖着鵝毛扇的，他們當然無望，我們只有切望着不搖鵝毛扇的那一批。今天（廿二日）看見中華日報的「動向」欄登載耳耶先生的「話跟話底分家」，剖析語文的所以差異，是一篇精密通達的文章。像這樣的文章，在「大衆語文學」剛被提出的現在，我們希望各「家」多多寫作。

不要上當

司馬牴

要眞正能夠負擔起掃除復古運動的「文言文」的任務，就只有適應當前大衆的需要，批判地來糾正五四式的「白話文」，同時努力地來建設「大衆語」。這問題已經有着許多人提出，而且正在熱烈地展開討論。這是對的。同時我們不要忘記，「文言文」雖是與封建的驅尸，相依爲命的東西，但是這畢竟只是封建的復古運動

的一種，封建在這加速的崩潰時期、死命的掙扎中，牠不但想復活「文言文」，使前進着的時代多少發生一些阻礙；同時凡是可以傳播牠毒物的東西，都在大量地採用。別的暫且不說，比如大家所要守護着的「白話文」和正在展開討論着的「大衆語」，實際上，封建這東西早已在那裏運用着了。現在的封建究竟比五四時代聰明，你以爲牠好像只是頑固地在那裏復興「文言文」反對「白話文」和「大衆語」嗎，其實牠却在同時不聲不響地穿着「白話文」和「大衆語」的花衣跑到大衆中播毒去了。而且是已經學會了帝國主義的方法在那裏進行着。「事實勝於雄辯」，舉一點例子在下面再說。先說帝國主義的吧。宗教是帝國主義奴隸殖民地的大衆的最好武器。聽見前輩說過，在滿清時代，教士們到中國來傳教，大都在腦後拖着一根長長的辮子。我們不要以爲他們是在學中國的文化，其實在那時拖辮子却是接近大衆的最好形式。

至於我們每天常常在街頭巷尾以及電車中，所看見的拉人，散傳單，散小冊子

的大都是中國的少女和老太婆之類，這當然更是進一步地接近大衆最好的形式。這都不是關於文學方面的事，且不管牠。說到繪畫和文字方面，從前我們小孩子的時候，所看見的耶蘇救人的圖畫裏的人物，都是洋人，這究竟發生不到多大的效力，現在有許多地方的畫圖，却已經改成中國人了。耶蘇也變成了穿長袍大褂的耶蘇。這也不管牠。關於文字，新舊約全書（聖經）和贊美詩則確確實實是用非常通俗的「白話文」譯成的。有些地方甚至於是用土話方言譯成。藏文還沒有翻譯過一本漢文的書，可是我却確確實實地看見一本非常完善的藏文的聖經譯本。不但流行，而且已經普遍。康藏雖然自己有着喇嘛教，可是基督教也有着相當的勢力。回文的譯本不說了，據說沒有文字的猓猓地方，基督教徒早已經學會他們的話打進去了。在廣東有幾個地方，據幾個朋友告訴我，他們在家鄉的時候，曾經讀過用羅馬字母拚成土話的聖經。據說讀羅馬字的聖經並不難，只消兩天學會字母的拚法，就可以讀聖經了。帝國主義究竟比封建聰明，他們老早就不但用着很通俗的「白話文，」而且

已經用着大家所說的「大衆話」以及方言土話，以及羅馬字等等跑到大衆裏面去了！至於封建的欺騙麻醉，「文言文」自然是和牠相始終的重要工具之一，可是「白話文」和「大衆話」他們也在細心研究並且運用着的。張恨水之流的小說不消說。陳大悲最近不是用他所編的「觀音戲」在無線電播音麼。記得申報的廣告上大概這麼寫着：「非常曲折的情節，非常通俗的白話」。至於許多彈詞和小調之類，簡直是充滿着土話方言，許多連環圖畫上的說明，土話方言也是非常之多。各省有各省的大同小異的彈詞和小調，各種不同的土話方言也在運用着。大衆容易懂，大衆也就愛看。這是誰都明白的事。

說起播音，使我想起封建的工具之一的佛教。無線電不是現代藝術中最新形式之一種麼？然而在這瘋狂的復古運動聲中，每天在街頭，你可以在每家店舖的門簷上聽出橐橐橐的木魚聲以及瘋狂的黃牛似的叫聲。這關於形式與內容的問題，現在也不談牠。佛教的最容易麻醉人的所謂「六字眞言」：「唵嘛叭咪呢」，漢文的「

南無阿彌陀佛」則却是早在一般婆婆大娘的口中根深蒂固了。從前佛教出的經書，大家只能呆頭呆腦地照字唸字，可是現在他們新出一些刋物，裏面有詩歌，戲劇，小說之類，都在運用着「白話文」和「大衆語」了。究竟已經是否在各地採用着土語方言，我們還無從致察；但在這瘋狂的「時輪金剛法會」之後，相信會有的。

總之，在這日本及其他帝國主義快要完全亡中國的時候，爲了消磨民衆的反抗心，基督教和佛教之瘋狂，自然是意料中的事情。「文言文」就是在這基督教和佛教瘋狂的突擊中同時出現的，是同一復古運動的發動。因此我們不能輕視牠。不要單單看見牠的頑固和必然的沒落，還要看到牠不聲不響地在「白話文」和「大衆語」方面的運用，因而所發生的惡毒的影響。大家不要上牠的當。

至於「白話文」應該怎樣的糾正，「大衆語」應該怎樣的建設，「方言土話」是否就應該懷疑，「羅馬字」是否可以採用，這幾點，相信這許多熱心的作者一定有許多具體而且很好的意見。我所還想說的，打算在另外一篇文章裏再說。

開快車時候的一個備忘錄

耳耶

一，引言　「文言文，白話文，大衆語」這問題發展得眞快，簡直不容許我從從容容地寫出我對於這問題的好些意見。假如我還慢條斯理地寫，不知甚麼時候，才能跟現在所提出的論點聯結起來。加以天熱，事多，人懶，筆笨，不但一天寫不出兩篇，甚至兩天寫一篇還很吃力。我底進行太慢了，我應當開快車，撇去許多暫時可以擱下或留幾天的文章。但是一方面怕自己忘了，一方面又怕跳得太遠，讀者摸不清線索，先來一個備忘錄。

二，文言文　文言文是跟封建制度相終始的。起於封建制度底繁榮，衰於封建制度底衰落，壽終正寢於封建殘餘的肅清。這裏有幾點解釋：第一，建封勢力雖也用話寫了文章來麻醉人，封建制度裏面，也會孕育「白話文」底萌芽，但是主要的

還是文言文。第二，封建殘餘一天不死，總要掙扎一天，因此，就會給「文言文」辯護一天。第三，現在的封建勢力，像某先生所說，已經只會住洋樓，坐汽車，吃大菜，跳探戈舞，滿口「yes」「no」的了。他們攻擊「白話文」，已經不像林紓那樣老實地說它是「引車賣漿者流」底話了。

三，白話文　「白話文」生長於封建社會，發揚於民主政治抬頭時代。在歷史上，「第三等人」（不是第三種人）底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它盡過不小的反封建任務。但是因為「第三等人」反封建底虎頭蛇尾，有始無終，一轉眼，反跟封建勢力結合了，所以「白話文」正跟它爸爸一樣，搬了許多文言的東西進去，成為一種「新文言」。但，雖然這樣，它究竟已經不是純粹的文言了。

四，文白爭執底本質　「文言文」跟「白話文」的爭執底本質，用我杜撰的話說，是個「者乎」的問題。例如：「此生或彼生」，不用說是章士釗律師底「兩個桃子殺死三個讀書人」底重複，雖省事，却曖昧，非看上下文不能懂得意思。既

需看上下文，其實一個「他或他」就可代替，比起來更省事。大衆有了複雜準確的話，硬要大衆說簡單迷糊的話：甚至大衆有了簡單準確的話，硬要大衆說複雜迷糊的話。可見「省事」只是一隻羊頭，賣的却是「迷糊」的狗肉。

五，文白爭執底意義　現在提出文言文跟白話文來討論，是很有意義：因爲在文化領域現在還需要反封建的民權運動。不過新的反文言文運動，不是單獨反對文言文就可了事。現在提倡文言文，是和其它許多復古開倒車的事聯合一氣，計畫地向新勢力的大進攻。反對文言文，必需同時反對整個讀經尊孔，逃禪佞佛的整個復古運動。

六，大衆話底建立問題底提出　大衆語這名詞，是在文章應該用話寫這前題下提出來的，是因爲白話文，並不徹底是話，夾雜着許多中國跟外國的文言，爲大衆看不懂聽不懂，寫不出，纔提出來的。是在「白話文」不能表出大衆底意識，生活，或不是表達大衆底意識，生活的最好的工具的這情形之下提出來的。

七，大衆話跟文章內容　因此，大衆話底提出，同時就是提出了用大衆話寫的文章底內容。如果不是要大衆自己寫，不是爲大衆寫，不是寫大衆，換句話說，不是代表大衆的意識，大衆話這名詞不必提出。封建勢力或帝國主義的傳敎士們已經在用大衆容易懂的話寫文章去欺騙大衆，但是那不是大衆話。理由：它不是代表大衆的意識的。至少，不是大衆底大衆話，只是尊貴者羣底所謂大衆話。

八，大衆話跟白話文　大衆話不是在白話文之外另外建立一種完全新的寫文章的話。因此，大衆話不能完全拋棄，或反對白話文。大衆話是白話文中的「話」的一部份底發展，使它更明確，豐富，充實，活潑；同時也是白話文中的「文」的部份底澈底肅清。

九，大衆話跟土話　現在並非已經有一種大衆在說着的大衆話存在。雖然長江黃河流域，有比較普通的話，也不過是比較有作爲大衆話底基礎的資格，並非已經就是大衆話了。這普通話底語彙很少，表現力非常不充分，它需要大衆來充實

，但是廣大的大衆說的還是土話，懂得最深的也還是土話，如果把土話否定了就是斷絕了充實普通話，使普通話成爲大衆話的一種根源。只有提倡土話，掘發土話中的寶藏，纔容易提高大衆底文化水準，纔容易養成大衆底寫作，纔容易使普通話更豐富，也就容易建立起大衆話來。對於土話的態度，應該跟對文學遺產的態度一樣：批評地接受，合理地揚棄。更應該向蘇聯提倡各民族底話跟文學的史實學習。

十，建立大衆話是個實踐問題　大衆話不存在於文人們底腦子裏，不存在於書房，亭子間或前樓。因此，建立大衆話，是個實踐問題。要向大衆學習，要提高大衆底文化水準；可是，幷不是要辦一個或一個以上的「大衆話傳習所」，叫大衆來受訓練。建立大衆話，應該嚴厲地糾正一部份文人學者們底波格達諾甫傾向。

十一，建立大衆話應該避除樂觀的放任主義色彩，有些人以爲文言文底沒落是必然的，頂多，也只發生一點點「輕微的阻力」。同樣，大衆話底形成，也是必然

的吧，這說法，自然是對歷史的發展法則，看得淸楚極了；不過，很容易被誤解爲可以忽視或放任。要知道文言文雖必然會沒落，但要是沒有人給它送葬，它不會自已爬到墳坑裏去。大衆話雖然會形成，但要是沒有人推動，也不會從空掉下來，即使來，也不知甚麼時候。樂觀的放任主義會取消了當前的工作。

編校後記

本集所收五十五篇論文，十餘萬文字，是從中央日報，申報自由談，中華日報動向以及其他雜誌刊物上面採集來的，算是給關心文，白之爭和建設大衆話問題的人們開了一篇總賬。

不過在這人事繁忙的時代，要一個讀者從頭至尾的讀完十餘萬字，大概是很少可能而且即使可能也是很少興味，很不經濟的事，因此，就把全部的文章分成四類，讀者要看關于文言的文章，就可以向文言類裏去找，其他依此，雜論裏所收的是泛論的文章；這樣的辦法，讀者諒表贊同能？然而編者並不十分自信，希望讀者賜教。

本集發排之後，又收得了許多非常重要的文章，現正預備出版續集。

編者自己本來也想寫兩篇文章，但編完本集之後，覺得各家的話已經說得面面

俱到，自己沒有什麼特出的意見可寫，就擱筆了，不過有一點，各家雖也約略說及，但沒有正式的具體的提出，現在我乘寫編校後記的機會，在這里提出了：

我以爲大衆話應該分兩種方式來寫：一種是用純粹的各地的方言土語——廣州已有人試辦過一種方言報，成績很好；各地也有民間小書局出版的土話小書銷行很廣。第二種是用最淺近最通俗的白話，中間儘量採入已有普遍性的方言俗諺。——這一種方式的大衆話是隨便那一個地方的大衆都可以看懂，只要他們略爲識些字。

大衆話不能離開方言土話以及各種生產部門所有的術語，前者是農民及小市民大衆所說的，後者是工人大衆所說的；離開了工農以及小市民大衆的話，而能另外創造一種大衆話麼？

也許有人恐怕方言土語以及專門術語太偏僻了，一地方的大衆固能了解，但不能普遍地爲全國大衆所了解，這種顧慮是多餘的；因爲現代的交通日便，社交日繁

，各地的方言土語以及專門術語日漸有由地方性而向普遍化　趨勢，例如「像煞有價事」一句俗語，本來只屬于江南人的，現在，已漸被多數非江南人所了解。所以，用第一種方式寫成大衆話，不但當地的大衆可以了解，亦能使各地的大衆互相了解，不但不會陷大衆話于地方的小範圍以內，而且有使牠擴展而普遍化的可能。

二十三年八月十五日于民衆書局